雪泥鴻爪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在香港之歷史

張小蘭　編輯　　廖綺華　翻譯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目錄

序言 1

第一部分——簡史
時代的巨變：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在香港

第一章：在香港的傳教使命 5

第二章：新的嘗試 11

第三章：離開中國 21

第四章：擴張 26

第五章：六十年代，對時代的回應 36

第六章：大口環兒童骨科療養院 47

第七章：在新界的傳教工作 57

第八章：整體環境 66

第九章：教育 83

第十章：結束——新的開始 102

第二部分——訪問
服務・友情・追憶

1. 我已完成了一圈高隆龐會傳教之旅了！
李潔靈修女 117

2. 因肺病與高隆龐會修女結緣
恩保德神父 127

3. 律敦治療養院員工緬懷舊事
Eileen、Lisi 及 Teresa 130

4. 回憶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的兩位天使
阮嘉毅醫生 153

5. 梁式芝書院天主教徒舊生的記憶點滴
勞敏詩女士 160

6. 高隆龐女修會生死教育的夥伴
謝建泉醫生 165

7. 修道生活，我尊重的一種生活模式
趙若萍女士 173

8. 區貴雅修女念茲在茲的香港戒毒會
香港戒毒會 179

附錄一：《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第三章 11 節——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 184

附錄二：〈華人護士皈依者加入傳教女修會，很高興來到愛爾蘭〉 209

附錄三：在香港服務的修女名單 212

序言

《雪泥鴻爪：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在香港之歷史》的出版，不得不提到 2023 年底同樣是我們中心出版的《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因為高隆龐女修會除了醫院的醫護服務，亦曾營運過兩間診所。在診所歷史研究過程中，我們接觸過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歷史委員會成員阮嘉毅醫生和高隆龐女修會，並獲修會贈予一本簡史 *A Time of Transition: Columban Sisters in Hong Kong*。這一本不到八十頁的小書以英文撰寫，只限私人流通。換言之，若非與修會認識的人，未必會有機會看到；而即使有這本書，若不懂英語，也得物無所用。在交流中，阮醫生提出將簡史翻譯成中文，讓更多華人認識修會的貢獻。我們感謝在阮醫生的推動之下，修會同意了翻譯計畫，並交由我們中心負責。這也就是現在本書的第一部分〈巨變的時代：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在香港〉。我們有幸得到廖綺華女士的相助，為我們翻譯。廖女士除了是熱心教友，又與高隆龐會修女熟稔，她本身更是護士出身，退休前擔任醫院管理局九龍中醫院聯網護理總經理及伊利沙伯醫院護理總經理，對於書中涉及修女們在香港長達四十年且最為重要的醫療服務，用字遣詞更為精確。

至於本書的第二部分，在《診所歷史》成書之際，我們得知高隆龐女修會於 2024 年慶祝一百周年，故決定擴大出版計畫，

邀請一些與修會相關的人士和團體接受訪問，從另一視覺對簡史中提及的人事物有更立體的認識。在此，我們要感謝高隆龐會李潔靈修女（Sr. Mary Greaney）、阮嘉毅醫生、（已故）恩保德神父（Fr. Giovanni Giampetro, PIME）、香港戒毒會、勞敏詩女士、趙若萍女士、謝建泉醫生，以及律敦治療養院三位前員工 Eileen, Lisi 和 Teresa。恩保德神父的訪問來自診所歷史研究沒有採用的部分。恩神父在受訪後不久去世，我們決定把他作為病人與高隆龐修女相識的內容刊登。我們感謝諸位受訪者及「天行足跡」、Tksteven 和 Prosperity Horizons 等攝影者的珍貴照片。

本書另有三篇附錄：〈附錄一〉是《診所歷史》中高隆龐女修會的一節，目的是作為簡史的補遺，更完整地呈現修會的歷史。〈附錄二〉是一篇舊新聞的撮譯。早期的修女幾乎全都是愛爾蘭籍，華人修女寥寥無幾，我們希望通過它使讀者對她們有所了解。處理這本書比較的大挑戰是人物的名稱，原因是部分修女的名字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修會沒有她們中文名字的檔案紀錄，多年沒再說中文的修女也忘了自己的中文姓名。例如，黎碧潔修女（Sr. Fintan Ryan）早期的中文名為「賴修女」；律敦治療養院前員工口中的護士長 Sr. Martin Herbert，亦稱 Sr. Maureen Herbert。這與教會在梵二大公會議前的習慣有關，新入修會者多改用教名，這習俗在梵二後有所改變，修女們可用回原名。由於人物眾多，故此〈附錄三〉整理了曾在港服務的修女的姓名，配上照片方便識別，使這本書除了對修會一百周年有紀

念意義，亦希望對其他從事香港醫療史的研究者提供方便；當然，書中的錯漏自是我們的責任。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於 1948 年來港。從受訪者口中知道，她們是一群風華正茂的修女，在肺癆病死亡率最高、人人聞之色變的時代，甘冒自身健康風險救治無數香港市民，甚至帶領非教會開辦的律敦治療養院成為世界級胸肺專科醫院和醫學教研重地。這是一個傳奇，本該值得有更多歷史書寫，修女們留下的卻只是一本薄薄的簡史。如今修女們韶華老去，更多早已離世，修會最終甚至決定於 2015 年與港人同行六十七載後畫上句點。我們非常感謝高隆龐女修會同意及支持出版計畫，以及得到與她們在醫療工作上關係最為密切的「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贊助經費，讓我們可以正如書名《雪泥鴻爪》之意，追蹤修女們的足跡，為她們在華語世界添補多一頁歷史，不至煙沒，並且可以免費派發讓更多華人了解修女們曾經為香港社會甚至世界醫學界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副主任　林榮鈞

編輯　張小蘭

2024 年 12 月

第一部分——簡史

時代的巨變：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在香港

紀寶儀修女編著

廖綺華　譯

第一章：在香港的傳教使命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Saint Columban, SCC）在香港發展傳教使命的故事，要放在中國二十世紀上葉動盪的政治大背景之下，方能更好地理解。她們在香港的使命一樣是在中國人當中傳福音，而修會的召叫是在香港的難民中間回應他們有巨大需要的一環。這是一個充滿極大信德和望德的故事，也是一個非凡努力的故事，展現了修女們如何在面對挑戰時，忠於修會的神恩，將天國福音傳揚給她們被派遣去服務的人。

中國當時有四億人口，是世界第三大國。1911年，北京腐敗和過時的滿清王朝被推翻，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建立民主共和國所激發的希望，卻因他於 1925 年去世而破滅。接著的那些年間，國家動盪不安，國共鬥爭，軍閥與土匪也相互爭鬥，混亂成了當時的秩序，土匪佔據了鄉村地區，毫不留情地進行搶劫和焚燒，就在這種情況下，第一批高隆龐會的修女在1926年11月15日抵達了漢陽。武漢包含長江的三座城市：漢口，漢陽和武昌，那裡曾是 1911 年辛亥革命的中心。聖高隆龐傳教會的神父當時正是在這裡傳教，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也在這裡建立了她們在中國的第一個據點。第一批修女包括首任總會長瑪利．芬巴爾．

柯林斯姆姆[1]（Mother Mary Finbarr Collins），瑪利．塞奧芬．福瓊修女（Sr. Mary Theophane Fortune），艾格妮絲．格里芬修女（Sr. Agnes Griffin），菲洛梅娜．伍茲修女（Sr. Philomena Woods），萊利亞．克里登修女（Sr. Lelia Creedon）及博德．莫洛尼姆姆（Mother Patrick Moloney）[2]。

圖：首批六位到中國的高隆龐會修女與男修會的神父合照

[1] 部分女修會稱她們的總會長或會院長上為 Mother，以示尊敬，早年華人稱這些長上為「姆姆」。

[2] 博德．莫洛尼姆姆，本名方濟．莫洛尼（Frances Moloney），被視為修會的聯合始創人。

1926年，當她們從愛爾蘭抵達時，很快便發現自己被捲入了發生在身邊的事件。在那年，敵對行動非常激烈，修女們被迫暫時離開漢陽，乘船沿著長江到了上海。一年後，當她們回到漢陽時，情況看起來比較光明，她們便開始計畫建立當時很需要的派藥所和教授天主教要理的設施。

1929年，中國再次爆發對立派系之間的敵對行動，包括漢陽在內的武漢城市都受到影響。對於修女們來說，這是一段忙碌而焦慮的時期，她們既要照顧派藥所，也要照顧臥病在家的病人。

同年，第二批高隆龐會修女抵達漢陽。她們熬過華中地區七十年來最寒冷的冬天。高爾文主教（Bishop Edward J. Galvin）期望能有修女在鄉間服務的希望，現在似乎可以實現了。

1931年，華中地區發生了一次極具破壞性的洪災。修女們向成千上萬的無家可歸者和病人敞開大門。她們要求更多人手，更多修女來協助。到了 1933 年，更多的修女抵達，她們便在江西南昌建立第二個據點。1938年，修女們應要求，在上海為俄羅斯僑民子弟開設了一所學校。同時間，中日戰爭爆發，對漢陽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修女們被迫在那裡應付戰爭的傷患者，她們因此要面對戰爭帶來的所有人間疾苦，第一批修女在華中地區的福音傳播工作就是在戰亂、洪水和疫情這樣的背景下進行。

從 1939 至 1945 年，西方國家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普通平民無法出行，這意味著沒有更多的傳教士可前往遠東地區。

時任總會長瑪利．博德．莫洛尼姆姆利用這幾年讓年輕修女接受更多的教育，為日後的傳教工作做準備。在大戰結束之時，修女們已成為老師、護士、醫生，又或擁有其他不同技能，準備好到遠東地區工作。她知道在中國和菲律賓的修女經歷了戰爭年代的困乏之後需要休息，替換她們便成了首要任務。

圖：2024 年 4 月 13 日在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慶祝一百周年紀念所展示的舊雜誌，顯示高隆龐女修會乃愛爾蘭首個傳教女修會

1946 年，修會戰後第一屆全體大會在愛爾蘭卡希拉孔（Cahiracon）母院舉行。瑪利．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Mother Mary Vianney Shackelton）被選為新一屆的總會長。

1947 年，她於戰後首次出訪遠東地區，探訪在中國和菲律賓的修女。

當時在政治上，中國仍處於動盪之中，總會長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預料，所有外國人最後都要離開中國，只是時間的問題，傳教士也不例外。

當她於 1947 年底抵達香港時，她沉思究竟天主為在中國的修女們準備了什麼。她知道她們全部都會在不久的將來被驅逐。天主在對她們說甚麼呢？當她住進了堅道嘉諾撒會會院，正在打開行李箱時，一位修女敲她的門，告訴她耶穌會士蔡伯德神父（Fr. Patrick Joy）致電給她，緊急地想見她一面。

第二天早上，她從蔡伯德神父口中知道，香港迫切需要由修女們管理一間醫治肺結核的醫院。醫務衛生署署長請求當時在香港的愛爾蘭耶穌會會長蔡神父協助，找一群合資格的醫護修女在這片殖民地上接手這項工作。在會面中，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立刻看到天主大能的手。她對蔡神父的邀請表示興趣，但她知道她必需返回愛爾蘭，並在做出任何決定之前諮詢修會的總議會。

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和總議會當時有兩個要考慮的問題，為香港一所醫院提供能由修女擔任護士、醫生和其他有適當技能的人，既可以符合修會的使命工作，又能同時謀生，這似乎是天主為她們正面對的兩個問題給出了答案。維安尼姆姆承認，當時修會正面臨財務困難，因此，提供一個合乎她們神恩的使徒

工作，並有一些報酬，這似乎是天主給她的答案。此外，在愛爾蘭的修女亦已準備好即時被派遣。維安尼姆姆後來承認，她曾經有很多個晚上輾轉反側夜夜無眠，因她擔心年輕的修女被委派去香港服務那些窮困的肺結核病人後也會染上肺病。

第二章：新的嘗試

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在 1941 至 1945 年日本佔領期間遭受了很大的苦難。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人從中國大陸越過邊境進入並圍攻香港，只花了四天便佔領了整個城市。當英國的防禦在日本的進攻下崩潰時，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不投降命令被置若罔聞。英軍損失約 2,000 人，其中 1,300 人重傷；至少 4,000 名平民被殺，幾乎全是中國人，另有 9,000 多名英國、印度和加拿大士兵被俘。1941 年 3 月，香港有 140 萬居民。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時，這一數字已降至 60 萬。

與此同時，國共內戰一直持續，直至共產黨於 1949 年取得政權。毛澤東認為香港是通往外部世界的有用窗口，而在香港的英國人不會是威脅。此外，香港對中國的貿易、航運、外匯和銀行業務非常有用。然而，當時正值中國革命最艱難的時期，湧入香港的難民與日俱增。1945 年的 60 萬人口，到 1950 年共產黨封鎖香港邊界時，已增至將近 200 萬。

成千上萬的難民完全赤貧，他們需要食物和飲用水維持生命。香港面臨著要照顧大量難民的艱鉅任務。這些難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拋下內地所有生意去面對未知將來的商人、銀行家、傳教士、平民百姓，也有地蹠流民。當時肺結核在難民中

成為流行病，是最需要關注的健康問題。這裡正是天主召叫高隆龐會修女的地方，她們的回應是立刻而徹底的。

圖：律敦治醫院歷史廊展示律敦治先生及醫院的歷史照片

在日本佔領期間，灣仔皇家海軍醫院除了遭到搶劫和轟炸，還遭受了嚴重的結構性破壞。戰爭結束後，海軍決定最好在另一個地點建造一間新醫院，而不是花很多錢修繕一所破爛的醫院。此外，灣仔不再是高尚住宅區，舊海軍醫院已被人口稠密的貧民區所包圍。1947年，這座仍稱為舊海軍醫院的破舊建築，被移交給香港防癆會，後來又移交給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以修復這座嚴重受損的建築，並使其成為醫治肺結核病的醫院。帕西族著名公民律敦治先生（Mr. J H Ruttonjee）的女兒蒂美（Tehmi）在戰爭期間因肺結核病去世，他為此慷慨捐贈了 80 萬港元，因此

醫院被命名為「律敦治療養院」。高隆龐會修女在修復和翻新舊建築方面面對著艱鉅的任務。這座老建築已嚴重失修，狀況令人吃驚，因為日本人在佔領期間將其用作總部。

圖：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的百周紀念卡上標示香港的修會於 1948 年成立

1948 年的春天，曾致美修女（Sr. Dolorosa Ryan）和加大利納．拉布萊．墨菲修女（Sr. Catherine Laboure Murphy）離開了修會在漢陽的醫院。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任命這兩位資深修女到香港開始傳教工作。同時，她指派當時在漢陽工作的護士修女瑪利．馬丁．赫伯特（Sr. Mary Martin Herbert，本名莫琳．赫伯特 Maureen Herbert）和迪尚塔爾．戴利（Sr. de Chantal Daly，本名芳濟．戴利 Frances Daly）到香港的新醫院工作，在到新醫院任職之前，她們先前往倫敦布朗普頓醫院（Brompton Hospital）學習結核病的護理。

她們來到這間未來的律敦治療養院的第一天，曾致美修女寫道：「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往訪舊海軍醫院的那一天，感覺是相當

納悶的一天，因為我的第一印象是灰色陰沉的走廊、死氣沈沈的大病房和日本人設置的古怪水泥浴室，這讓我非常沮喪。但加大利納．拉布萊．墨菲修女卻沒有那麼喪氣，她立即充滿了計畫和聰明的想法。不久之後，為了方便準備，我們獲准搬進那裡，把醫院作為我們的基地。就在那時，我們第一次與海軍『擦肩而過』。每天早上，當我們外出參與彌撒時，一個退伍的年輕華人海軍會替我們擦洗房間和沖洗走廊，但他並不是我們的員工。順帶一提，他（到 1985 年時）仍然和我們在一起。」她繼續說：「我們 1948 年來到時的香港與現在的香港（1985 年）有很大的差別。香港從日佔時期的癱瘓狀態慢慢恢復過來了。那時人們生活在貧困中，衣食方面都很差，一直在為口奔馳。」

我們的預算很緊張，限制了我們購買醫院設備等物資。為了尋找更便宜的價格，我們東奔西跑，磨損了很多鞋履。護士長加大利納．拉布萊．墨菲修女似乎具有神奇的魔力，用當今流行的話來說，她「完全投入」，竟能夠用她那充滿口音的中文吸引到那些小心眼的業主，最後使他們心甘情願地成為她的幫手。醫院為貧人服務的事實也觸動了一些比較幸運者的心，讓他們大解善囊。後來療養院的大贊助人是香港賽馬會。

醫院未來的員工包括修女和一些平信徒，她們於 1948 年抵達香港，因此到了 1949 年 2 月，醫院已準備好投入使用。這些來服務的人的生活經驗和能力都很有趣；伯爾納德．康諾利修女

（Sr. Bernadette Connolly）是 1948 年 4 月第一個乘飛機抵達的人，她直接從菲律賓來，她曾在那裡度過了戰爭歲月，並經歷過各種貧困。她是一名護士，在 1939 年被派往菲律賓之前曾在漢陽醫院工作多年。

上海的學校即將關閉，那裡的修女正準備離開中國。那些修女為香港的新醫院貢獻了自己的技能。麥巴西修女（Sr. M. Basil McBrearty）和阿納斯塔西亞．奧康奈修女（Sr. Anastasia O Connor）是最早從上海來的，兩人都被分配到律敦治療養院工作。麥巴西修女是放射技師，技術精湛且富有創造力。奧康奈修女接手了醫院總辦公室的管理工作。則濟利亞．德萊尼修女（Sr. M. Cecilia Delany）和伯爾納德．貝爾克里修女（Sr. M. Benedicta Berkery）也被臨時指派在醫院工作並做出了很多貢獻，直到德萊尼修女去了菲律賓，貝爾克里修女去了美國，繼續她們的傳教旅程。

其他來自上海的修女包括：瑪加利大．瑪利．米尼（Margaret Mary Meany）、貞德．奧多諾萬（Joan O’Donovan）、貞德．貢布里勒（Joan Gumbrielle）、克里斯汀．辛諾特（Criostin Sinnott）、奧沙里亞．麥克利戈特（Eucharia McElligott）和安吉拉．馬爾（Angela Meagher）；她們路經香港時，都有提供協助，只有米尼修女和馬爾修女在香港逗留了相當長的時間。

1949 年 1 月 17 日，五位修女從愛爾蘭搭乘「廣州號」抵達。其中有即將成為醫院院長的區貴雅修女（Sr. M Aquinas Monahan）[3]，還有馬丁．赫伯特修女、迪尚塔爾修女、芳濟．博吉亞．麥馬洪修女（Sr. Francis Borgia McMahon）和杰拉德．斯隆修女（Sr. Gerard Sloane），她們都是護士。三位平信徒——瑪利．祁利福醫生（Dr. Mary Clifford），護士瑪利．德懷爾（Mary Dwyer）和嘉勒．梅森（Clare Mason）在頭兩年參與了工作人員的行列。加辣．法倫修女（Sr. M. Clare Farren）也是護士，早些時候從緬甸抵達。加大利納．拉布萊．墨菲修女是護士長，藥劑師曾致美修女是當時修會團體的院長。

1 月 18 日修女們在律敦治先生的請求下在新界開設了一間派藥所，他懇求修女們為生力啤酒廠及周邊地區缺乏醫療服務的工人開辦一間簡單的診所。伯爾納德．康諾利修女和加辣．法倫修女被任命在那裡服務。事實證明，該中心是律敦治療養院的修女的綠洲，她們喜歡在休息日去那裡。軍隊神師、耶穌會士，尤其是他們的年輕修士，也喜歡到那裡喝茶。1949 年 2 月 1 日是值得紀念的一天，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到律敦治修女的小聖堂舉行彌撒並留下了耶穌聖體。多年來，隨著新來的修女加入工作人員的行列，主教那天向修女們傳達的信息經常被

[3] 區貴雅修女又稱亞規納、區桂蘭。其在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的墓碑，刻上的中文名字為區貴雅，故以此名為準。

重述。他告訴修女們，她們是在天主的特殊安排下才來到這裡的，在她們的工作中，可能無法以平常的方式向非基督宗教或沒有信仰的人傳福音，但她們必須透過她們的溫柔、仁慈和同情心，使人們在她們身上看見基督，向他人展示「福音在行動」，從而將人們帶到上主面前。「凡是你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她們的工作是為窮人和弱勢群體服務，這是一場帶有冒險的跨宗教信仰行動。在與窮人和垂死者的關係中，修女們覺得她們會特別強調聆聽、學習、分享以及她們的無力和不安全感。這是為了她們進入耶穌的使命，以特殊的方式參與基督的逾越奧蹟。愛是跟隨基督的標記。後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她們回顧過去，發現自己一直在按照梵二會議的建議去做。

恩主教是一位模範主教，過著非常神貧的生活。後來，他對修女們只和那些沒有人想要的窮人和邊緣人在一起表示非常高興。當他向修女們展示一塊新祭台石時，他告訴她們石頭上的聖觸是屬於聖人辛普利修斯（Saint Simplicius）和莫德斯塔（Saint Modesta）的，並補充說：「以這兩位聖人的名字作為你們的座右銘『簡單而謙虛』。」

律敦治療養院於 1949 年 2 月 24 日正式啟用。彌撒由蔡伯德神父主持，為工作的成功獻祭。下午 4 時 30 分，總督葛量洪爵士（Alexander Grantham）抵達，由董事會成員及律敦治家族

接待。多年後，曾致美修女寫道：「對我們來說，開幕儀式是一場考驗。我們被要求從附近的宿舍列隊走上來，由董事會主席介紹給總督。一位旁觀者說，這就像一個舊世界的場景。然後我們回到各自的部門，隨時為客人解答他們想問的任何問題。」接下來的日子裡，不同修會的修女們也紛紛來到療養院參觀。1949年，醫院全面啟用，收治的病人擠滿了病房，修女們逐漸熟悉有關將緊急病人轉介至其他醫院的程序，也設立了門診部。她們與政府胸肺科診所合作轉介適合的患者入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肺結核在香港肆虐，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1949 年，香港殖民地有超過 7,000 份結核病報告，2,600 人死於肺結核，肺結核呈流行病，發病率最高的是在兒童和年輕人中間。腦膜炎當時很流行，許多患有粟粒結核病的嬰兒死於這種疾病，當時沒有抗結核藥物；建議的唯一治療方法是有營養的飲食、臥床休息和隔離感染者。卡介苗接種過了兩年才有。鏈黴素是唯一可以殺死桿菌的藥物，但除了在中國邊境沒收的藥物外，在香港是買不到鏈黴素。根據醫務署的命令，它只能用於治療患有腦膜炎或粟粒結核病的兒童，其他住院病人的治療效果並不理想。

1950年，從世界各地來了更多修女，她們在隨後幾年為律敦治療養院提供了很好的服務，其中有來自漢陽的鄧敏修女（Sr. M. Damien Rooney）和瑪利．莫羅尼修女（Sr. Mary

Moroney）。鄧敏修女曾在漢陽醫院擔任護士，為香港的這個新計畫做出了許多貢獻。同樣，瑪利．莫羅尼修女在華中地區工作多年，現在在藥房工作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鄧敏修女回憶起自己對患肺結核的恐懼，以及所有工作人員在值班時都戴著口罩，她說：「值夜班是一件苦差事，每位修女通常要輪班一個月甚至兩個月。我們沒有空調，醫院旁邊工務司署的喧鬧聲讓她們在白天無法入睡。」她繼續說：「1950 年代，在邊境被封鎖之前，一百五十萬難民獲准離開中國大陸，英國向他們敞開香港的大門，山坡上佈滿了棚屋，人們只有少量的用品，但他們有自由，許多工作人員本身就是難民。」

1950 年，紀寶儀修女（Sr. M. Gabriel O'Mahony）也來了，準備在瑪利．克利福德醫生任期結束時接替她。瑪莎．基南修女（Sr. Martha Keenan）是護士，她已經從愛爾蘭來了，麥修女（Sr. Frances Xavier Mapleback）也從菲律賓來到。隔年，來自愛爾蘭的護士伊娃．格特魯德．格里姆利修女（Sr. Eva Gertrude Grimley）、萬美蘭修女（Sr. Aidan Myrane）和醫生修女貝尼努斯．奧康納（Sr. M. Benignus O'Connor）也來了。麥巴西修女早就需要在戰爭結束後離開，放射技師修理雲修女（Sr. Leonie O’Sullivan (Margaret)）便來了接替她。

1952 年 5 月迎來了蘇梨韻修女（Sr. Barbara O’Sullivan），9 月迎來了毛修女（Sr. Una Moane）。賈斯汀．卡西迪修女

（Sr. M. Justin Cassidy）和易瑪利修女（Sr. Attracta Egan）於1953年來到這裡，她們都是熱心並隨時準備盡其所能提供幫助的護士。易瑪利修女從中國大陸到來，蘇梨韻、毛修女和賈斯汀．卡西迪修女則來自愛爾蘭。

圖：律敦治療養院 1952 年的全體醫護人員

這一年也是愛爾蘭全體大會年，香港的代表是曾致美修女和紀寶儀修女。紀修女於 9 月回港，而曾修女則留在愛爾蘭擔任總議會成員。韓莫惠姆姆（Mother M. Mercedes Murphy）被任命為律敦治會院的院長。她對人的慷慨款待不僅對成為難民的神父和修女的安慰，也對整天為窮人服務的修女們帶來了極大的鼓舞。然而，1952年令人感受至深的經歷是大批傳教士從中國大陸被逐出。

第三章：離開中國

高爾文主教於 1952 年 9 月 19 日抵達香港，*Far East*（遠東）雜誌記述了這位 70 歲主教痛苦的一天，也是其傳教生涯的頂峰：他被推過中國邊境進入香港，英勇地默默奉獻的傳教歲月，如今卻要與他牧養的羊群分離。

圖：此乃高隆龐會官方英文兩月刊，於 1917 年創刊，至今仍在發行，每年出版七期。圖為 2024 年 1-2 月號的封面（右）及 3-4 月號（左）有關高隆龐會修女初到中國情況的文章〈Go Ye Afar〉

高爾文主教與漢陽的修女熟稔。與其說他是聖高隆龐傳教會的聯合創始人，不如說他是一位卑微的傳教士主教，徒步行走於

漢陽的稻田間，從一個教區到另一個教區，極度勞累；但他意志堅定，充滿力量和堅定不移的慈愛和同情心。1931年漢陽發生毀滅性的洪水時，修女們記得有超過 5 萬名難民在主教家附近紮營。幾個月來，主教、修女和神父日以繼夜地照顧、飽養和庇護這一大批受難的民眾。

他是個無所畏懼、對天主的旨意充滿無限信心的人，他活出了《若蘇厄》第 1 章第 9 節中對他的考驗：「我不是吩咐了你，你應勇敢果斷嗎？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膽怯，因為你無論到那裡，上主你的天主必與你同在。」1952 年 9 月 19 日，他踏入香港時，紀寶儀修女這樣寫道：「加爾文主教昨晚抵達這裡，瘦弱、疲憊，看上去更像是個乞丐。但他身上散發著無比的尊嚴、禮貌和勝利的氣質，給每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信仰熱情的勝利，十字架的勝利。」

對於在律敦治服務的修女來說，主教的到來和他在香港休養期間多次探望她們，是很大的鼓舞。他與高隆龐會傅佐良（Fr. John McNamara）和穆爾斐（Fr. Malachy Murphy）兩位神父一起住在瑪利諾神父的赤柱會院。主教常來主持彌撒。他經常留下來吃午餐或晚餐，並且會第一個開始唱歌，充滿精力和感情地唱出所有傳統的愛爾蘭歌曲。主教每天到律敦治的病房探望萬美蘭修女，她抵達香港後不久就患上了肺結核，臥病在床。

同年 10 月，張國光（Fr. Jeremiah Pigott）和于樂山（Fr. Joe Kennedy）兩位神父被驅逐，從浙江湖州來到這裡。會院有一瓶香檳，是從事洋酒出入口業務的律敦治家族送的，修女們轉送給張神父，以表示歡迎。他和主教一起住在瑪利諾神父的會院。主教說：「這種高尚的感覺只有張神父才懂得欣賞——Jerry（張國光神父的暱稱）在加入聖高隆龐傳教會之前，就已經習慣了這些美好的事物！」

那年（1952年）的聖高隆龐慶日，高爾文主教為修女們舉行了彌撒，兩天後便離開香港和中國前往美國。他七十年中的四十年都獻給了這片土地，而這片土地現正從他的視野中消失。

1952 年 12 月，高隆龐會帕迪．奧康納神父（Fr. Paddy O’Connor）第一次到訪。他是記者神父，之後多次來訪。他非常積極地報道朝鮮、越南和遠東的戰事，讓修女們能從多方面了解到戰爭的實況。

從中國流亡來港的情況仍在持續。利伯高主教（Bishop Patrick Cleary）於 1952 年 12 月抵達香港；稍後，謝默斯．奧萊利（Fr. Seamus O’Reilly）和盧克．奧萊利（Fr. Luk O’Reilly）兩位神父也抵達。修理雲修女回憶，這幾個月對律敦治的修女來說，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也激發了她們的熱情。羅維綸神父（Fr. Paddy Ronan）、陸凱神父（Fr. Owen O’Kane）、干衛道神父（Fr. Jack Casey）和賴神父（Fr. Paddy

O’Reilly）一直留在香港，直到他們適合旅程為止。鄧敏修女回憶道：「我當時正在聖堂裡準備祭台，一位修女跑進來告訴我，上海監獄裡的四名年輕高隆龐會神父已經被釋放了。我們一直有為他們祈禱。他們正在關押中，並沒有被告知釋放的事。所以他們很困惑，以為自己是在去西伯利亞的路上。我記得歐文．奧凱恩神父很高，剃著光頭，穿著一件長長的中式大衣，手裡緊緊地抓住一個裝著幾個橘子的雞皮紙袋。他的腳踝和腳都因缺乏營養而嚴重腫脹。帕迪．羅南神父不停地抽煙，他的手顫抖得幾乎拿不住杯子。」她繼續說道：「留在我腦海中的一件事，是他們談論被囚禁時那些監獄獄長的友善，他們非常同情神父，經常為他們向上頭說話。神父們經歷了兩年的單獨監禁和黑暗。我們定期去聖保祿醫院探望他們。高隆龐會傅佐良神父無微不至地照顧他們，讓他們逐漸康復，回到現實生活中。」

莫克勤神父（Fr. Aedan McGrath）的釋放給仍在中國監獄中的傳教士帶來了很大的希望。莫神父的故事與中國聖母軍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戰後，黎培理總主教（Archbishop Antonio Riberi）成為教廷駐華代表。在此之前，他曾在非洲工作，在那裡他認識了愛爾蘭籍女傳道員埃德爾．奎因（Edel Quinn）和聖母軍的工作。看到聖母軍在非洲的工作，讓他深信不疑，覺得這正是中國教會福傳工作所需要的。他向高爾文主教請來莫克勤神父，任命他為聖母軍駐中國的全國特使。1951 年 5 月，莫克勤神父的足跡已遍及中國所有主要城市。但他們的工作在同年 6 月

被迫終止。莫克勤神父回到上海，在家裡等待被捕。後來他告訴我們，那些日子的焦慮比他在監獄裡承受的還要嚴重。他說當他被捕後，他就完全平靜了。聖母似乎已經掌管了一切。

黎培理總主教被驅逐出中國，莫克勤神父卻被單獨監禁了兩年零八個月，只能用手語溝通。1954 年 5 月他出獄後來到香港，我們所有與他接觸的人都從他講述自己的經歷中受益良多。

他於四十年代末在香港成立的聖母軍，多年來在香港的福傳工作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聖母軍的第一個支團正是那時候在律敦治開始的。

第四章：擴張

圖：律敦治療養院首任院長
區貴雅修女（任期 1950-1985）

1952 年 10 月，區貴雅修女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獎學金，前往卡迪夫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研究結核病一個學年。同年 6 月，兩名香港畢業的本地年輕醫生被錄取成為律敦治療養院職員。這標誌著開始有本地醫生正式受聘。從那一年起，律敦治療養院被認定為香港大學醫學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學醫院，在隨後的幾年裡，每位醫學生都會在這裡接受培訓，並有相當多的人後來成為療養院的員工。

1953年，賽馬會捐款給律敦治療養院興建一座新翼大樓，增加三個病房，可容納六十六名患者。1953 年 12 月，香港首個中央無菌供應部在療養院開幕，手術室於 1954 年投入使用，瑪莎．基南修女和蘇梨韻修女是這些部門的設計者。1954 年 3 月 20 日，香港大學外科學系高級講師許國強醫生在療養院進行了

第一例胸廓成形術，骨科高級講師侯信醫生（A R Hodgson，後來的侯信教授）進行了脊柱結核手術，第一次的脊椎手術是在1954 年 4 月 10 日進行。兩位外科醫生多年來為律敦治療養院的病人提供免費服務。

1954 年 6 月，賽馬會捐贈的護士宿舍落成。兩年後，律敦治先生進一步捐款，為病人建造了另一所療養院，預計可提供一百一十張病床，為康復的患者提供服務，好騰空一些急症病床為更多需要緊急護理的新患者使用。它被命名為傅麗儀療養院（Freni Memorial Convalescent Home），以紀念他當年死於癌症的次女傅麗儀（Freni）。

療養院的醫護人員包括院長區貴雅修女、還有輔助她的紀寶儀修女，以及香港大學的本地畢業生。第三位醫生貝尼努斯．奧康納修女也加入了工作人員行列，但由於健康原因不得不在兩年後返回愛爾蘭。因她的出色服務，當她離開時，人們都非常想念她。醫務人員很難招募，年輕的醫學畢業生認為結核病非常不受歡迎且具有限制性。因此，

圖：第二任院長紀寶儀修女（任期 1985-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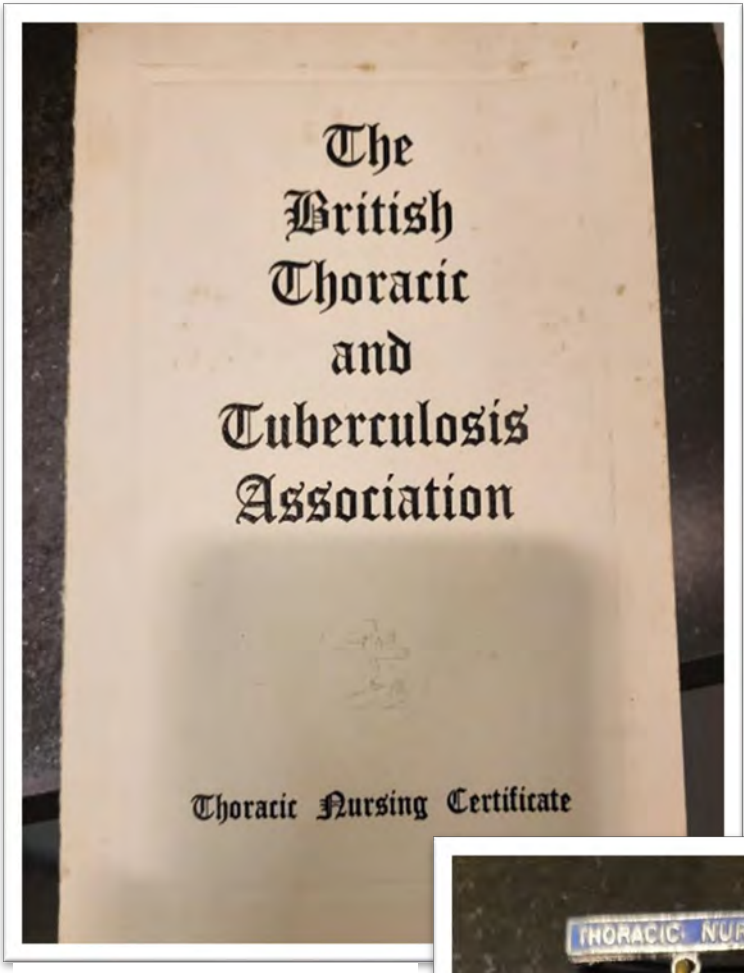
律敦治療養院是那些在其他醫院找不到合適職位的畢業生的選擇。他們許多人後來成為享負盛名的醫學顧問、外科和內科醫生，也成為醫院的忠實朋友。

1952年，香港大學麥花臣教授（A.J.S. MacFadzean）邀請區貴雅和紀寶儀兩位修女為香港大學的醫學本科生講課。在隨後的幾年裡，每位醫學畢業生都在律敦治療養院或瑪麗醫院接受她們的授課。

早年護士的招募一直是個問題，直到 1959 年律敦治設立護士訓練學校。五十年代的護理員工，包括有來自海外的註冊護士，即修女們及最初從愛爾蘭隨她們而來的專業護士。病房的大部分員工和護士助理來自香港和澳門，大多原都是難民。

修女的目標是為華人建立一所本地護士學校。迪尚塔爾修女為後來的護理學院奠定了基礎，此學院可頒授「英國結核病和胸肺部疾病協會」（The British Thoracic and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BTTA）的證書，其證書使畢業生能受聘成為結核病醫院的護士職員。

1954-55 年，醫院的修女出現了人事變動和調整。總會長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前來巡視，並告訴修女們計畫於 1955 年初在韓國建立一個新的基地。現任律敦治療養院的護士長瑪莎．基南修女被任命到韓國的新醫院。她原來的職位由迪尚塔爾修女接替。



「英國結核病和胸肺部疾病協會」（BTTA）的證書（上圖）及徽章（右圖）

加辣．法倫修女被任命到美國。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帶著修理雲修女前往韓國。鑑於即將在當地成立新會院，她們在那裡有很多事務要處理。修理雲修女在這次韓國之行中，運用了她作為攝影師的專業知識。隨後，她在陪同維安尼姆姆及後來的總會長瑪利．傑瑪．雪萊修女（Sr. M. Gemma Shelley）巡視各地會院時，都拍攝了關於她們到訪的各個國家的不同傳教活動的精彩片段。

1958年，當迪尚塔爾修女回家休假時，鄧敏修女接替了她，開始了長達十一年的護士長忙碌歲月。鄧敏修女看到了發展護理學校的很大需求，便任命沙娜雯修女（Sr. Ann Salmon）為護理導師，為第一批護士作準備，考取「英國結核病和胸肺部疾病證書」資格。

修會團體生活

沙娜雯修女和與她一起於 1954 年抵達的莫琳．拜恩修女（Sr. Maureen Byrne）回憶起早年的經歷：「律敦治的會院是1953年由賽馬會資助興建的，是一個避風港，可愛又涼爽，舖有鑲木地板。小聖堂位於地下，很熱，但環境令人感覺非常虔敬。我們的廚師李先生讓我們吃得很好，他從海軍來到我們這裡，工作非常出色。三十年後，他要求學習天主教教理，成為教友。加大利納．拉布萊修女是第一任護士長，專責修女們的健康，她堅持要有一流的飲食，以防止修女們在病房感染結核病！

那時我們有一張長長的餐桌，修女長上坐在最上方。我們在長長的修女會衣外面套上長袍去執勤，換掉頭套、脫掉硬布領巾是個煩人的過程。由於結核病，我們的會衣允許離地 5.5 英寸！在 1958 年的全體大會中，我們獲准換掉會衣，只穿工作袍。它看起來和會衣一樣，但很輕。

我們的一天從早上 6 點的彌撒開始，最初由方濟會神父舉行，其中一位是翟煦神父（Fr. Theobald Deitrich），他還為我們主持每月一次的會議，還有雷永明神父（Fr. Gabriele Allegra）他的列品聖人個案申請現正在進行中。此外，該團體的其他神父也會輪流替我們舉行彌撒。這個方濟會團體很特別，他們的工作是將《聖經》翻譯成中文。

住在馬路對面的耶穌會士於早上 7 點 15 分來舉行第二台彌撒。病房修女們早上 8 點就全部值班，其中一位修女早上 7 點就去值班，以接替夜間當值的修女。

語言學習包括主要由本地華人每周半天的私人教授。修會團體的活動室裡有各式各樣的閱讀材料，主要是修女們關閉上海和漢陽會院時帶來的書籍。韓莫惠姆姆是我們的長上，喜歡古典音樂，所以每當我們收到家裡寄來的現金禮物時，她便會買一系列精選的唱片。然而，我們的主要庫存是來自大學顧問蔡永業醫生、張光璧醫生和邱明才醫生。

我們的臥室很舒適，但很熱，除非有人在晚上把門開著（走廊對面的鄰居也同意這樣做，以產生對流）！我們的床墊估計是軍隊留下的，感覺就像稻草一樣，很受罪。它們每年都會被梳理一次，直到六十年代出現泡棉床墊為止。除了瞻禮日，我們都安靜地用餐，晚上一起娛樂一小時，以及有定期的退省和避靜。我們的靈修主要由耶穌會負責，但我們也有其他『路經』香港的人，例如加爾默羅會馬爾谷．霍蘭神父（Fr. Mark Horan O.D.C.），時不時還有瑪利諾會的神父。」

病人事工

當修會接受為律敦治療養院提供人手時，她們的理解是，這不會是教會旗下的天主教醫院，而是作為一間跨宗教信仰的醫院，其主要目的是治療和護理結核病患者，其中大多數是難民。因此，恩理覺主教講有關透過她們的生活見證傳播福音的話語，非常有吸引力，亦成為她們傳播福音的方式。

修女們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許多外部牧職。聖母軍、天主教護士會和天主教醫生會，以及難民診所，都是她們積極參與的工作。她們都是醫生會和護士會的創會成員。

1953 年的年鑑寫道：「5 月 24 日，天主教護士會在律敦治舉行了成立大會，馬丁修女、迪尚塔爾修女和聖若瑟堂的宗座外方傳教修會顏思回神父（Fr. Andrew Granelli）是主要推手。第二天，三位修女參加了在公教進行社舉行的聖母軍會議，

幾天後，紀寶儀修女被選為天主教醫生會第一任秘書。」修女們下班後也會安排去各個難民營照顧病人。她們也會前往大口環痲風病收容所照顧病人的靈性需要。

1952 和 53 年，兩位年輕女子——佩吉．福克納（Peggy Falkner）和陳玉如（Fanny Chan）拜訪了律敦治的修女，並加入了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成為後來的——瑪利．馬爾谷修女（Sr. Mary Mark）和陳玉如修女（Sr. Mary Thomas）。瑪利．馬爾谷修女被派往美國的修院工作，陳修女則因擔任華裔護士的導師而在律敦治和香港聞名；她又因其廚藝和對護士和醫生的熱情款待而出名。後來畢業成為醫生的醫科學生常提到學生時代上課時陳修女煮的粥。他們對粥的記憶似乎比對講座的記憶更好！

麥修女是律敦治當時的修會先驅之一，不僅高隆龐修女們記得她，她在香港期間幫助過的許多難民也記得她。她是 1922 年進入卡希拉孔母院的第一批年輕女性之一。1926年發願後，她曾在愛爾蘭、中國大陸和美國服務。1936年，她被選為副總會長；擔任該職位十年後，她再次出使東方，在菲律賓馬拉西基工作，直到 1950 年被派往香港。在律敦治，她的職責包括管理聖堂的聖器和負責縫紉室。但她最大的快樂就是為上門尋求協助的窮人服務。她最懂得如何幫助他們過上好的生活，很多人在她的幫助下完成學業，後來她又為他們找到工作。

首任醫院秘書瑪利．阿納斯塔西亞．奧康納修女（Sr. Mary Anastasia O’Connor）於 1948 年 12 月從上海抵達。她參加了醫院的開幕典禮，並在律敦治任職，直到 1957 年返回愛爾蘭。她回憶起在香港的日子是多麼的快樂。律敦治是一個收治結核病患者的地方，並免費為他們提供一流的專業治療。她在為窮人服務時找到了極大的心靈平靜。醫院的收症室是她其中一項職務，直到 1958 年由麥德明修女（Sr. M. Philippe McDermott）接替。

圖：護士團隊在療養院正門合照，展示於律敦治醫院歷史廊

五十年代末，醫學的發展使修女們需要有更深入的學習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1955 年，經總會長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巡視後，

馬丁．赫伯特修女回到都柏林學習，以獲得護士學校導師的資格。加大利納．莉莉絲修女（Sr. Catherine Lillis）於 1957 年抵達香港。她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護士，在律敦治留逗了三年，負責護理結核病患者，然後被派往韓國。

1957 年，紀寶儀修女獲得了獎學金，使她能夠在英國學習以取得愛丁堡會員（Edinburgh Membership）資格。1958 年，她返回香港，在律敦治擔任顧問醫生。區貴雅修女隨後也準備在 1958 年前往英國進行類似的學習。

1958 年下半年，嚴美納修女（Sr. Roberta Remillard）從菲律賓抵達，接受脊椎手術。律敦治當時已是進行此類手術頗有聲譽的醫院。嚴修女在手術後繼續留在律敦治工作了二十五年，她的專長主要是兒科，但她也從事行政管理和手術室工作。

六十年代初期，賈斯汀．卡西迪修女和沙娜雯修女被派往愛丁堡學習骨科護理，目的是讓兩位修女在骨科護理方面掌握更多技能。這不僅為律敦治，也為侯信教授規劃的新療養院提供更多骨科護理技能；這所療養院是為脊椎手術後在康復中的兒童及脊髓灰質炎的患者而成立。脊髓灰質炎使許多兒童需要骨骼和關節手術。這個夢想很快就在大口環成為現實。

第五章：六十年代，對時代的回應

第一部分

「從 1960 年到 1970 年，香港的人口增長了……差不多 100 萬人……全港總人口上升至大約 400 萬。大多數新移民是在 60 年代初抵達此地的。……不少新來者餓腸轆轆，急於找工作，而香港剛興辦的大型工業，正好提供大量非技術性職位。

大量難民到來，滿足了人力的需求，使香港能在 60 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中心之一。在那十年的頭五年裡，工廠的數目幾乎翻了番，工人的數目則是原來的三倍，超過 60 萬人。到了 60 年代末，香港已是首屈一指的紡織品出口地……但是，大多數工人的境況仍然像狄更斯筆下的一樣，工作時間永遠是那麼長……本來已捉襟見肘的社會服務，加上每日漫長的工作時間和惡劣的生活環境，產生了一種挫敗和疏離的情緒。在 1967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社會動盪不安……那時政府認識到難民將在此安家落户，並且需要政府的幫助。」[4]

[4] 摘自白莎莉（Sally Blyth）及胡德品（Ian Wotherspoon）著：*Hong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56-59；中譯本：《說吧，香港》，頁 52-54。

到了六十年代，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公共衛生計畫，包括卡介苗等防疫注射和兒童保健服務，以滿足不斷擴大的年輕人口的需求。儘管竭盡全力應對，所有診所和醫院仍然人滿為患。在一些公立醫院，病人經常要共用病床。此時，傳染病（以結核病為主）以及骨科結核病和兒童脊髓灰質炎後的急性和長期護理成為高隆龐女修會涉足的主要領域。

律敦治療養院的修女聯同政府胸肺科診所與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合作，研究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使用治療肺結核的藥物治療方案。這項研究不僅有利於香港的病人，也有利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結核病患者。這些研究發表的許多文獻對全世界結核病的治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香港的結核病報告在六十年代大幅下降。五十年代中期，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 10 萬人口中有 700 人被通報；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這一數字已降至每 10 萬人中只有 300 人。這種下降趨勢在七十年代持續，直到八十年代。

隨著學齡兒童人數急劇增加，提供基礎小學教育仍然是政府和志願機構面臨的挑戰。儘管許多志願機構做出了努力，但許多兒童很少或根本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這些情況就是徐誠斌主教敦促高隆龐女修會時任總會長加大利納．赫爾利修女（Sr. Catherine Hurley）考慮派遣修女到香港從事教育工作的原因。

除了大規模移民外，六十年代的香港還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颱風、嚴重的乾旱、霍亂、銀行倒閉和暴動等等。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蔓延至香港。隨著一系列炸彈襲擊，暴動升級，一些商人和其他人選擇離開香港。從很多方面來說，1967年的暴動是戰後對香港影響最深遠的事件。然而，律敦治療養院忙於照顧病人和垂死者，以至於躲過了一劫。也許這些暴動參與者太害怕感染結核病，所以他們沒有打擾律敦治療養院。

圖：律敦治療養院的成人病房

律敦治這些年的生活最能表達在勒梅夫人（Mrs. Lemay）的記錄當中。她是一位英國護士，在五十年代中期受僱於律敦治療養院之前，曾在皇家海軍工作過。約三十年後退休時，她寫下自己在律敦治療養院的經歷：「我非常喜歡這份工作。這是非常值得和滿足的，我非常喜歡修女們，她們都很有幽默感，我非常喜

歡她們。醫院的工作很細緻，病人大多病得很重，就是因他們病得這樣嚴重，我真想知道他們在入院之前是如何能走動處理日常事務。醫院成立初期，資金很少，床頭櫃等家具都是用普通的黃楊木製成，漆成白色。醫療設備非常匱乏，血壓計等都是從一個病房借到另一個病房。床墊內滿是木屑，事實上，修女們自己也是在這些床墊上睡了很多年，從來沒有抱怨。我們在供水方面也遇到許多問題，因為香港此時完全依賴集水區的雨水，如果夏季乾旱，就會嚴重缺水。這使得傳染病醫院的工作變得非常困難，但沒有人抱怨。二十四年後，在我的記憶中，律敦治是個各職系員工合作無間的地方。律敦治是一個非常快樂的地方。」[5]

儘管六十年代出現許多政治和其他危機，傳教士的工作仍在繼續。根據與「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簽訂的合同，高隆龐女修會將接管大口環兒童療養院的營運。該療養院在高隆龐修女的護理管理下發展成為一家全功能的兒童骨科醫院，而外科和醫療技術則從香港大學瑪麗醫院骨科部門借調。

修女們的另一個外展活動是 1966 年在新界靠近中國大陸邊境的地區打鼓嶺成立新基地。打鼓嶺是一個鄉村地帶，很貼近人民，也靠近大陸，這也許更像修女們一直在內地所做的工作。

[5] 1996 年致紀寶儀修女的信。勒梅夫人在律敦治工作了十七年。

第二部分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於 1962 年 10 月 11 日在羅馬開幕。當天下午 6 點，香港、九龍所有天主教堂的鐘聲響起，以紀念會議揭幕。當時香港教區的運作主要由意大利神父擔任，這使得羅馬與香港的關係非常密切。香港主教當然是大公會議的參與者。梵蒂岡大公會議標誌著教會內部新的希望和改變的開始，它為傳教熱情帶來了精神上的很大自由。

1963 年 2 月，一群高隆龐修女搭乘「S.S. 亞洲號」前往各個傳教目的地，途中路經香港。這使修院的修女人數達到二十九人。她們包括從美國來的德克蘭．奧迪婭（M. Declan O'Dea）、伊梅爾達．克勞利（Imelda Crowley）、羅斯．迪寧（Rose Dineen），以及安妮．福利（Eithne Foley）等修女，全都是前往韓國；阿納斯塔西亞．奧康奈修女正返回菲律賓執行新任務，黎碧潔修女（Sr. M. Fintan Ryan）[6] 在等待緬甸簽證期間被臨時派駐香港。在等待期間，她在律敦治修讀了「英國結核病和胸肺部疾病證書」。她最終沒有去緬甸，而是留在香港服務。曾在律敦治工作的貝尼努斯．奧康納修女被調派到韓國，在同年稍後時間也到了香港。同年，紀寶儀修女前往倫敦哈默史密斯醫院（Hammersmith Hospital）進修，為期六個月。高隆龐會的神父在往返傳教地區路經香港時，都經常是我們的訪客。

[6] 譯按：根據《天主教手冊》，黎碧潔修女早年曾稱為賴修女。

瑪利．史蒂芬．曼尼恩姆姆（Mother Mary Stephen Mannion）當時是律敦治會院的會長，她的待客之道非常出色。

1963年是香港歷史上嚴重的乾旱之年。對病人和修女們來說，這意味著在經歷香港歷史上最熱的夏天的一年裡，用水要受到嚴格的限制。每個人的用水都受到嚴格配給，廣播裡的口號是「節約用水——現在不是虛榮的時候——髒襯衫是榮譽的標誌！」

那年 9 月，有水源探測者在修院的地底發現了水源。這是上天的恩賜，我們每天可以提取數千加侖的水，它為醫院在處理結核病等傳染病時解決了許多問題。

1963 年 11 月，修女會接待了前往韓國建立第一個修會基地的澳洲「藍色修女」[7]，這標誌著兩個修會友誼的開始，並在韓國蓬勃發展。

區貴雅修女於 1963 年 11 月前往尼泊爾參加了一次醫學會議，這是她珍惜和喜歡的活動。她喜歡飛往各地，結識各種各樣的人，並利用這個機會將結核病管理方面的新知識，帶到財政匱乏和沒有設施的國家。

由於營養改善和難民有更好的生活方式，現在律敦治療養院收治的病人，病情已沒有那麼嚴重。香港的生活正在改變，

[7] 譯按：Blue Nuns，正式名稱為 Little Company of Mary，因修女會衣為藍色而得名。

有更有效的抗結核藥物可以使用，也有更多人可以接受手術，患者雖然仍需要住院治療，但病情已有所改善。毛修女在復健病房和傅麗儀療養院創辦了各種事工，她還為符合條件且身體情況允許的患者開辦英語課程。1963年下半年，毛修女和李淑倩修女開始了一項對仍在接受抗結核藥物治療的患者進行家訪的計畫。許多修女護士也利用下班時間參與其中。

1964年，史蒂芬．曼尼恩姆姆和區貴雅修女參加修會的全體大會。史蒂芬姆姆為香港傳教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除了利用她的家務天賦為修女們提供餐飲服務，又在律敦治會院和傅麗儀療養院的花園進行修輯外，她還著手為大口環療養院做好準備，以便修女們在她出發參加全體大會之前遷入。她於 1965 年被派往菲律賓。曾致美修女於 1964 年被任命為律敦治會院的院長。

1964 年 10 月，聖高隆龐傳教會的另一位會祖若望．布洛威克神父（Fr. John Blowick）與威廉．基霍神父（Fr. William Kehoe）抵達。布洛威克神父感到身體不適，區貴雅修女把她的辦公室改成為私人病房，給他入住。在他逗留的三個星期裡，他大部分時間都臥床休息。他的日常需求非常簡單，他的幽默感也使他成為一個非常好的病人。

區貴雅修女與兩位神父一起飛往馬尼拉。她在一個結核病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然後去吉隆坡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會議。

1964 年 11 月，區貴雅修女因其在香港結核病領域的工作而被授予「菲利普金章」（Sir Robert Philip Gold Medal）。英國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British Chest and Heart Association）在 1965 年 6 月出版的《健康》（*Health*）出版物中這樣描述她：

> 「如果有人仍然認為傳教修女是遠離塵世和遠離世俗事務，那麼與區貴雅醫生（她在香港的許多同事這樣稱呼她）的短暫相處，很快就會消除這種想法。
>
> 胸肺科的會議如果沒有她就會很不一樣。該獎章每隔數年便頒發給英聯邦結核病防治運動中的傑出人物。1965 年 3 月，瑪麗娜公主(Princess Marina)向專程從香港飛來的區貴雅修女頒發了菲利普勳章。她的同情心、技能、耐心和她的奉獻精神令人讚嘆不已，並讓我們所有認識她的人都因她的榜樣和幫助，生命更加豐富。
>
> 她曾多次代表香港結核病協會出席國際會議，例如出席 1955 年在倫敦舉行的英聯邦會議。她還代表該協會參加在新德里舉行的第七屆國際胸肺科疾病會議，及在同年出席在加德滿都舉行的尼泊爾結核病協會成立就職典禮。最近她參觀了馬德拉斯的結核病研究中心。」[8]

[8] 摘自《健康》小冊子，NAPTA 出版物，1965 年。

1964年，華人護士學校成立，提供助理護士的培訓，由陳玉如修女擔任導師。此前，護士學生是在葛量洪醫院接受培訓。

曾致美修女因中文出色而著稱。當她第一次到達中國時，在江西學習了中文，並意識到對傳教士來說把本地話說好是多麼的重要。因此她熱心幫助其他修女學習中文。1965 年 11 月，她讓黎碧潔修女和潘秀珠修女（Sr. Margaret O’Brien）入讀由比利時修女在九龍創辦的語言學校。潘修女繼續上課學習了兩年，黎修女則因為病房需要她，不得不將學習時間縮短到一年。

1965 年，國際公教學生運動（PAX ROMANA）在中環「公教進行社」舉辦了關於梵蒂岡大公會議文件的學習。紀寶儀修女被邀請就第六章關於修會的內容發表演講。當天主教護士會在赤柱靜修院進行周末避靜時，護理人員也獲得了參與的機會，當中五名護士在其中一次避靜後接受了洗禮。律敦治療養院每年都會為一般員工舉行周年避靜。

1966 年 7 月，紀寶儀修女應邀到劍橋大學講授「香港的結核病」，期間出席布朗普頓醫院醫學研究委員會的骨科會議；在返港之前，她在哥本哈根代表香港分會出席美國胸腔科醫師學會的會議。她及時回來慶祝區貴雅修女的入會銀慶。就在這一周，馬修女（Sr. Mary Mortell）、白碧哲修女（Sr. Brigid Kingston）、杜瑪利修女（Sr. Mary Duane）和布雷達．努南修女（Sr. Breda Noonan）亦已抵達。杜瑪利修女和努南修女繼續

前往菲律賓執行她們的任務，而馬修女和白碧哲修女則開始學習中文。同年前來的另一位是維克多．瑞安修女（Sr. M. Victoire Ryan）。完成語言學習後，她開始在律敦治病房任職。

1966 年 11 月，蘇梨韻修女被指派接替沙娜雯修女在大口環擔任護士長。她和賈斯汀．卡西迪修女是這一新項目的先驅，這項目後來成為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骨科醫院。蘇修女在接下來的十年裡，為此項目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67 年 9 月，區貴雅修女在倫敦的會議上報告了結核病藥物的臨床研究，在回來的路上，她參加了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抗結核病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會議。

1968年，曾致美修女、鄧敏修女和潘秀珠修女前往愛爾蘭參加修會有關於更新的全體特別大會。同年，紀寶儀修女前往雪梨進修醫學，而馬丁．赫伯特修女在都柏林米斯醫院（Meath Hospital）擔任導師，同時參加了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舉行的「英國結核病和胸肺科疾病」周年大會。

圖：現今律敦治醫院近灣仔道的出入口（上）及皇后大道東正門出入口（右）

第六章：大口環兒童骨科療養院

大口環兒童療養院於 1956 年 10 月啟用。該院由志願組織「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資助和營運，頭十年由紅十字會提供營運資金。1964 年，高隆龐會修女開始在大口環工作。

在五十年代，急症醫院的病床非常寶貴，導致接受骨科手術的兒童必須提前出院的不理想狀況。侯信醫生身為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的成員及香港大學矯形外科講師，看到急需為在瑪麗醫院及律敦治療養院接受矯形外科手術的兒童提供療養病床。

此時，侯信醫生正在開創脊椎外科手術。他為結核病脊椎患者引入了根治性脊椎手術或從病人的前路進行手術。1956 年 11 月，他在律敦治進行了首例「前路脊椎融合術」。

由於侯信醫生與律敦治的高隆龐會修女有工作上的聯繫，加上大家公認律敦治療養院的高護理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術後護理，因此他希望修女們參與管理大口環兒童療養院的工作。

1960 年，侯信醫生正式向時任總會長瑪利．傑瑪．雪萊修女請求由修會接管該院。1961 年 1 月，賈斯汀．卡西迪修女被送往愛丁堡瑪格麗特．羅斯公主骨科醫院（Princess Margaret Rose Orthopaedic Hospital）學習骨科護理課程，當她回來後，

沙娜雯修女也去了修讀同樣的課程。完成愛丁堡的課程後，她又在倫敦學習了醫院管理課程。賈斯汀．卡西迪修女也在倫敦醫院完成了手術室培訓課程，然後在 1963 年回港。

1964 年 5 月 1 日，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與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簽訂合同，接手大口環灣兒童骨科療養院的運作。從律敦治療養院護士長鄧敏修女被借調過來兩個月，直到沙娜雯修女於 1964 年 7 月返回並接管大口環療養院的行政事務。賈斯汀．卡西迪修女則負責監督臨床護理。當時有五十張病床，但在接下來的六個月內又開設多了兩個病房，使病床總數達到一百張。

修女們住在大口環療養院的樓群內，屋內有一間小聖堂，由史蒂芬．曼尼恩姆姆負責裝潢。由於受過訓練的員工很少，也沒有駐院醫生，兩位修女非常忙碌。她們一直是律敦治會院的一份子，直到 1968 年 3 月，修理雲修女被任命為大口環會院的院長。

大口環療養院擴建

侯信醫生一直希望在大口環有一家設備齊全的專科醫院，他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不懈。1966 年，這家醫院的計畫已經制定好並獲得批准，他終於得償所願。它將額外提供一百張病床、門診部、手術室、化驗室、X 光部門、蒸汽洗衣房和廚房。新醫院於 1968 年 6 月啟用，當時名為「大口環兒童骨科醫院」。根德公爵夫人於 1970 年 2 月參觀了該醫院，並對那裡的兒童和專業工作特別感興趣。1970 年 12 月，醫院更名為「大口環根德公爵

夫人兒童醫院」。區貴雅修女和紀寶儀修女定期以顧問身份到該醫院巡房。

圖：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1967 年 1 月，蘇梨韻修女接替沙娜雯修女，後者被安排回律敦治療養院。黎碧潔修女則取代蘇修女在律敦治的手術室和中央無菌供應部的工作。

骨科醫院的新大樓於 1967 年 3 月動工。1964 年修女們首次接管大口環時，共有 50 名員工，到 1968 年，這個數字已上升到 130 人。侯信教授因其在脊椎外科方面的工作而享譽國際，他是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的主席和醫院的名譽院長。來自世界各地的骨科醫生來到大口環在他手下工作。隨著工作量的增加，對有更多修女前來協助的要求也隨之增加。

雷德姆塔．圖梅修女（Sr. Redempta Twomey）於 1969 年 1 月加入工作人員行列，衛安妮修女（Sr. M. Antonina Ryan ‘Nora’）也於翌年 1 月加入。王修女（Sr. Joan O’Connor）於 1975 年 1 月上任，接替當年 6 月應回籍假的衛安妮修女。馬修女於 1967 年 6 月加入工作人員行列，擔任大口環醫院秘書，於 1969 年 5 月退出，派遣到英格蘭/愛爾蘭進行宣傳工作。會院院長修理雲修女於1968年3月被任命為放射技師。1969年3月，蘇梨韻修女休假——包括三個月的假期和六個月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洛杉磯的專業進修。鄧敏修女在她缺席期間接替其護士長職務。

這些孩子

蘇梨韻修女對她第一次到大口環時，遇到的那些住院孩子有很多回憶。身為護士長，她每天兩次探訪每個孩子，知道每個孩子及其父母的名字。她回憶道：「孩子們都很棒。我仍然記得他們，有很多我仍然跟他們有聯絡。有一個叫馮仔的每天下午 5 點後便到我的辦公室，做著他自己的事情來陪我。他才三歲！他的父親對他很好，但他的母親拋棄了他，所以我認為我是做了一個母親的角色。他現在於加州『華納兄弟』當會計師，並定期給我寫信。」她繼續說：「還有另一個孩子，兩個月大就入院了，我工作時常常把她放在辦公桌的抽屜裡！我記得早上上班的時候，我對新大樓、人手問題等充滿了焦慮，便會去看看這些開心的

小傢伙，而他們會叫我一聲『護士長，早晨』，讓我感覺自己是如此渺小。」

此時的賈斯汀．卡西迪修女負責管理四個病房，她知道每個孩子的名字、各人的健康狀況及家庭背景。她總會在探病時間出現，與每位家長見面。她照顧孩子們的所有需要，並設法為他們所有人提供可愛的衣服。蘇梨韻修女回憶曾有一位來訪的兒科醫生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賈斯汀修女這樣的人：這裡有一百多個孩子，而她了解每個孩子的一切，不僅是他們的病史，還有他們的社會背景和家庭狀況。」

有一個骨骼脆弱的特殊孩子，名叫若瑟（Joseph），他住在賈斯汀．卡西迪修女的病房裡。他是個小聖人，他的手臂或腿經常在夜間骨折，但他從不抱怨。若瑟是從他母親得到真正的啟發：他的父親癱瘓了，另一個孩子則有智力障礙。他的母親來看他時，都是揹著這個智障孫子。她是個非常有信德的女人，若瑟也是。自從他的母親突然過世後，他和智障的妹妹獨自生活。但若瑟完全信賴天主，毫無懼怕。

颱風

早年在大口環，當時只有賈斯汀．卡西迪和沙娜雯兩位修女，後來蘇梨韻修女接手。她們在那裡有過許多與颱風、洪水、蛇和山泥傾瀉相關的經歷。

颱風期間，通訊中斷，病房內的人員必須疏散，有幾次還需要用直升機空投食物。賈斯汀．卡西迪修女穿著石膏靴，用石膏剪剪掉堵塞排水溝並引發淹水的長草。有一次，沙娜雯修女去會院檢查，遇到洪水從屋頂的平頂沿樓梯傾流而下，便前去查看原因。屋頂的門在大風中「砰」的一聲關上，她無法開門，只好在屋頂上等著，直至她被人發現失蹤！此時駐港的威爾斯軍團被指派來拯救她們。

蘇梨韻修女還記得有一次她們必須疏散五十名殘障兒童。她回憶道：「我們沒有一絲亮光，但由於洪水，我們不得不關掉電源。正在接受『牽引治療』的孩子很害怕，生怕他們會被留在那裡。」

泥漿隨著洪水湧入病房，一名威爾斯軍團的軍官說：「這裡應該被稱為『泥灣』，而不是『沙灣』！」[9] 當潮水退去、洪水消退時，真正的功夫才開始。修女和職員開始清理地板，把孩子們送回病房。當然，她們很享受暴風雨過後的興奮！

難民

沙娜雯修女記得難民家庭乘船來到香港，在大口環附近登陸。在早期，有個家庭被帶到修院住了一星期，直到為該家庭找到幫助。

[9] 譯按：大口環的英文地名為 Sandy Bay，該區亦稱沙灣。

賈斯汀．卡西迪修女記得，住在大口環附近山坡棚屋裡的難民家庭在颱風期間被沖入大海。她回憶起六十年代初，當時有一些難民父母拒絕讓他們的孩子接受手術。她特別談到患有先天性髖關節問題而需要接受手術的孩子。對於這些病例，卡西迪修女購買了一個「愛丁堡框架模型」，在過去還沒有手術治療之前，此框架模型的治療效果非常好。她的哥哥彌額爾．卡西迪神父（Fr. Michael Cassidy）幫助她從愛丁堡瑪格麗特．羅斯公主骨科醫院拿到這個模型。許多孩子都在這些框架模型上治療而得到痊癒。

賈斯汀．卡西迪修女與大口環的工作人員和病人有著長久的友誼。從一開始，每逢休息日，她都會在長洲或南丫島，或前往安置區探望那些已出院卻難以回來覆診的孩子。

每到聖誕節或農曆新年，許多以前的病人仍然會回來探望修女們。有些人已經結了婚，有些已有了工作或掌握了一些技能，所有人都高興地記得修女們和大口環醫院為他們所做的一切。

各種骨科和矯形外科的新技術都是在大口環醫院開創的。若望．奧布萊恩醫生（Dr. John O’Brien）等人在醫院裡進行了各種關於脊椎外科手術的研究。這些孩子經常由國際上最好的骨科醫生進行手術。這是骨科手術的先驅時代。

大口環醫院也是一個可以在靈修上和學術上得到滿足的好地方。像耶穌會戴邁樂神父（Fr. Anthony De Mello, SJ）、道明會

押田成人神父（Fr. Vincent Shigeto Oshida, OP），以及許多其他人來香港舉辦工作坊和退省。跨宗教交流的機會受到鼓舞，並且有很好的自我成長機會，以及為華籍和歐籍員工做牧職的機會。外展牧職包括與青少年團體合作，以及對已經出院的兒童進行家訪。

衛安妮修女於 1969 年抵達香港，她在倫敦皇家國家骨科醫院（Royal National Orthopaedic Hospital）專攻骨科護理。她先在大口環當護士，後來擔任病房護士長，直到 1975 年。衛安妮修女回憶起在大口環接受治療的病人類別，包括小兒麻痺後遺症、腿部畸形需要專業的物理治療和護理，先天畸形、骨髓炎和結核病患者、從瑪麗醫院轉來的創傷病患及所有需要專業護理的個案，年齡從嬰兒到年輕成人。他們出院後，由社工轉介進行復健治療，後續跟進得十分仔細。

潘秀珠修女於 1970 年加入大口環醫院放射診斷部工作。學習了兩年粵語後，她於 1967 至 1970 年在律敦治療養院放射診斷部門工作，之後回國參加修會的全體大會。返港後，她被任命為大口環的放射技師及大口環會院院長，接替修理雲修女，後者被調往律敦治，當那裡的會院院長，並在那裡擔任放射技師。

在大口環的牧職——修會生活

修女們每天都在修會會院裡參與彌撒，她們的神父是一位慈幼會士。耶穌會士也有幫忙。耶穌會駱顯慈神父（Michael

McLaughlin, SJ）每月進行一次講座。在這些年，修會舉行了許多慶祝活動——蘇梨韻修女和賈斯汀．卡西迪修女的銀禧紀念、雷德姆塔．圖梅修女發永願是其中的亮點。修會的聚會很受歡迎，律敦治和粉嶺的修女也來這裡一起慶祝特殊的日子、放鬆身心，享受著美妙的音樂。

潘秀珠修女在評論大口環的整體使徒工作時說：「大口環的信仰傳教生活充滿了巨大的奉獻精神。修女們的高度專業和投身精神，承擔了很多責任，並且主動性很強，因為那個時期沒有駐院醫生，對她們來說，通過這項服務見證福音充滿著滿足感。」

1972 年 8 月，蘇梨韻修女代表大口環醫院出席在雪梨舉行的國際復健會議，並擔任了護理環節的主持。

王修女是於 1973 年抵港，學習中文後，於 1975 年開始在大口環工作。王修女曾在愛丁堡瑪格麗特．羅斯公主醫院和倫敦皇家國家骨科醫院接受骨科培訓。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的需求正在改變。結核病和小兒麻痺等疾病已得到控制，為治療這些疾病而設立的醫院需要進行檢討。那時，本地的護理學校和醫學院也有很大的進步和發展。本地訓練的護士已可以勝任修女的工作。當時「本地化」的問題被提及，政府醫院的高級護理職位也由本地護士擔任。修女們問道：「我們是否應該轉往其他有更大需求的地方？」腦性麻痺兒童

就是其中之一，王修女經過進一步培訓後，進入了這一領域，並成為香港和中國「引導式教育」[10]的先驅之一。

在大口環醫院的這些年裡，修女們與工作人員一起為許多殘疾兒童的康復、教育和安置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即使二十年後的今天，蘇梨韻修女和其他大口環的修女仍每年都為大口環的所有朋友舉辦聖誕聯歡會，其中許多人坐輪椅前來，開心地分享今天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怎麼樣的經歷。

1977年，修會總會決定將修女們從大口環撤出。潘秀珠修女已經意識到，對她來說，是時候繼續前進，接受進一步的培訓，為能在牧民層面上的工作做好準備。衛安妮修女當時在愛爾蘭也在進修，回來後在明愛醫院服務了多年，並幫助建立新的部門。經過一段時間努力學習新知識後，蘇梨韻修女回到律敦治的病房工作。賈斯汀．卡西迪修女也在律敦治工作至1988年。

[10] 譯按：引導式教育是一套針對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及有特殊需要人士而設計、揉合了教育及治療與的全人康復系統。

第七章：在新界的傳教工作

新界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它是 1897 年根據《北京條約》租借給英國的最後一部分中國領土。1860年，九龍割讓給英國，而香港島則於 1842 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給了英國。

新界毗鄰大陸邊境的部分是這片殖民地中最不發達的地區。道路仍然是泥路，電燈和自來水尚未完全供應，住房幾乎不存在，人們住在他們從內地出來後自己搭建的棚屋裡。大多數人都是新來的移民，他們每天都在種菜，並將農產品出售給粉嶺和上水附近的菜市場。

粉嶺附近的本堂神父是宗座外方傳教會賴法禹神父（Fr. Ambrogio Poletti, PIME），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些人的困境。他們沒有診所，沒有醫院，沒有給幼童的托兒所，沒有學校。如果有人需要緊急醫療護理，毗鄰大陸邊境的打鼓嶺幾乎沒有交通可送他們往醫院。

許多男人已經移民到英國做餐館工人，把妻兒留下。他們會定期短暫休假回來探望家人。

這些 2 至 6 歲的孩子白天陪著在田裡工作的母親。當婦女照料菜田時，嬰兒通常都是揹在母親的背後。賴法禹神父為她們

憂心，尤其為這許多懷了孕但沒有產前護理、沒有分娩設施的年輕母親擔心。

他計畫為幼童建造一間托兒所，並希望為這些母親建立一間小型婦產診所，以及為該地區的普通民眾成立一間日間診所。他尋找一個可以管理這三種服務的修女團體。他認為日間診所是最迫切，也是最實際方式去接觸民眾，他成功地在毗鄰大陸邊境的打鼓嶺獲得一塊土地。他在這塊土地建立了一間小診所，並希望能吸引人贊助這項事工和經營其他計畫。賴法禹神父與明愛總裁、宗座外方傳教會士力理得神父（Fr. Francesco Lerda, PIME）談論這個項目，一切便自那時開始發生。

賴法禹神父找到律敦治療養院的高隆龐會修女，向她們提出了自己的計畫。她們決定派幾位修女到打鼓嶺。天主教福利會（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同意建造產科病房、托兒所和員工宿舍。天主教福利會項目主任馬寶蓮（Pauline McGuire）和修女們監督了整個建造過程。在施工期間，福利會派出流動診所，由高隆龐會修女組成，通常是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每星期六從律敦治前來看診。

1966 年 10 月，新成立的會院成員包括麥德明姆姆、易瑪利修女和瑪加利大．蒂爾尼修女（Sr. Margaret Tierney），她們在聖若瑟明愛診所居住。賴法禹神父對聖若瑟的熱愛，確保了診所

以這位聖人的名字命名。香港明愛成為贊助團體並承擔財務責任。修女們在那裡工作，只有微薄的津貼。

圖：診所現已改為安老院，左後方單層的幼稚園則仍在運作

修女們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在周圍的人群中結識了很多朋友，而這些人慷慨地為她們提供新鮮蔬菜，上水的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和喇沙會的修士成為了她們堅定的支持者。其中，已故的菲力士修士（Brother Felix Sheehan, FSC）因其一貫的幽默感令大家都特別記得他。還有是來自上水附近「可愛忠實之家」的兩位英國女士溫蒂．布萊克默（Wendy Blackmur）和瓦萊里．科尼貝爾（Valerie Conibear），她們在那裡照顧嚴重弱智的兒童。她們都是虔誠的五旬節教派信徒，並且相信非常徹底的福音生活。修女們很樂意幫助這些孩子，當溫蒂和瓦萊里想在晚上

放鬆休息時，修女們經常替她們值班。那是在梵二後的幾年裡，人們對合一主義和對話充滿熱情。有時，菲力士修士、聖保祿女修會的盧瑪利修女（Mother Miriam Estelle da Luz, SPC）和高隆龐會的修女會與溫蒂和瓦萊里聚在一起祈禱。

打鼓嶺的日間診所為該區提供了急需的服務，修女們幾乎24小時待命。每逢星期六，區貴雅修女或紀寶儀修女會從律敦治療養院來看比較複雜的個案，許多患者被診斷有嚴重醫療問題或需要做手術時，便會被轉介至九龍和香港的專科診所。後來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啟用，病人就被轉介到那裡。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時任院長蔡永業教授對打鼓嶺的診所非常感興趣，退休後，每個月到診所一次提供免費服務。黎碧潔修女和鄧敏修女此時在診所工作，她們和蔡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托兒所也十分成功。這是一項非常需要的服務，大家很欣賞托兒所為他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孩子們茁壯成長，到六歲從幼兒園畢業，便升讀小學。

然而，產科病房卻有個問題。香港護士管理局和醫務衛生署同意那裡的產科病房只可接收可由助產士接生的正常分娩個案。任何在懷孕期間發現有併發症的產婦都會被轉介到上水產科中心。然而，很多時候，瑪加利大．蒂爾尼修女會在深夜被叫去為那些正在分娩的婦女接生，那些婦女是她從未見過且沒有做過產前檢查的。在這些早期的日子，蒂爾尼修女的工作做得很好。

她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但當她在 1968 年離開打鼓嶺時，產科病房如果沒有醫生，顯然無法再運作。1968年，白碧哲修女接替了蒂爾尼修女。蒂爾尼修女曾請假一段時間來辨別她的聖召，她最終成為開羅加爾默羅女修會的成員。

白碧哲修女 24 小時待命，也兼顧日間診所。這樣的產科設施越來越明顯對產婦來說是危險的。最就近的醫生或急診中心都在上水，晚上很難叫到救護車。麥德明姆姆經常要開車送產婦到上水，並祈求自己能及時在嬰兒出生前或產婦的併發症得到處理前抵達。

產科病房最終於 1969 年關閉。賴法禹神父非常傷心，無法接受這個決定。這是他的夢想，但時代在變，他未能理解打鼓嶺的產科已經走到了盡頭。

1970年，白碧哲修女回到律敦治，診所和托兒所的工作由瓦萊麗．海特頓修女（Sr. M. Valery Hetherton）接替，後者於 1970 至 1974 年成為打鼓嶺會院院長。麥德明姆姆返回愛爾蘭，接替她的是擔任總務長多年的高隆龐．甘迺迪修女（Sr. M. Columban Kennedy）。當時的會院有：瓦萊麗．海特頓修女（會院院長兼診所護士）、高隆龐．甘迺迪修女（商務兼會計）和易瑪利修女。易瑪利修女一直留在這個會院，直到 1986 年退休後返回愛爾蘭馬格拉莫爾（Magheramore）母院 [11]。她以註冊

[11] 修會母院於 1957 年由卡希拉孔（Cahiracon）遷至馬格拉莫爾至今。

護士的身分加入修會，1931年發願後被分配到中國，在漢陽和南昌服務，直到 1939 年被派往菲律賓。她在菲律賓度過了戰爭歲月，戰後回到中國。1953年，她被派往律敦治及傅麗儀療養院服務，直到 1966 年被調派到粉嶺。

圖：鄧敏修女（右）與多數是客家人的村民接觸

鄧敏修女回憶易瑪利修女 1966 年到來時的情景：「當時她已經 70 多歲了，留在粉嶺很多年。她幫忙做家務、到診所看病，閒時到田裡走走，所有農民、男女居民都認識她。她款待我們的訪客，帶他們散步，遙看大陸的邊境。當然，她也是一位熱心的祈禱者。她的五十周年紀念對高隆龐會的所有人來說，都是極大的喜悅。博德．亨利．克羅寧主教（Bishop Patrick Henry Cronin）從菲律賓遠道而來為她慶祝。柯德華神父（Fr. Ned Kelly）也與克羅寧主教一起主持了感恩彌撒。」

麥德明修女是打鼓嶺會院的第一任院長，周圍的人都叫她「姆姆」，她喜歡孩子，又會說粵語，因此在那裡結識了許多朋友。多年後，修女們遇到來自打鼓嶺的人，他們都記得麥德明「姆姆」。她很慈祥，且能在每個人身上看到上主。

1971 年，柯德華神父被任命到香港擔任修會在緬甸的總務，並負責評估高隆龐會在香港華人中間工作的可行性。他是香港出版的 *Columban Intercom*（高隆龐會通訊）的第一位編輯。直到 1974 年為止，他大部分時間都與打鼓嶺的修女們住在一起，並每天為她們做彌撒。他擅長拉手風琴，晚上為會院帶來很多歡樂。他演奏一首又一首曲子，一天下來可持續半個小時或更長時間。

1972 至 1978 年，何維珍修女（Sr. Nora Mary O’Driscoll）被分配到打鼓嶺擔任診所護士，並在初期先學習語言。游德肋撒修女在律敦治學習粵語一段時間後，於 1974 年來到打鼓嶺。她在打鼓嶺度過了十一年，為附近的學生教英文。她經常隨時有超過五十名學生來上課，包括郵差和警察在內的成年人都會參加她的夜間課程。她帶領許多人歸向主。至於蘇艷美修女在加入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之前，在打鼓嶺的托兒所工作了六年。在此期間，她住在修女的宿舍裡，並參與修女們的日課祈禱。

白碧哲修女於 1974 年回到打鼓嶺擔任院長。1976 年，她調往律敦治會院擔任院長，由黎碧潔修女（任期：1976-1982）接替。習慣了在律敦治一間很有系統的醫院工作，黎碧潔修女發現

這項新工作充滿挑戰。她慢慢開始喜歡上那些純樸的農民，他們許多人說的是客家話，而不是廣東話。黎碧潔修女和其他修女獲得警方的特別許可，可以在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封閉地區探訪民眾。她經常家訪任何有困難的人。

梅開五神父（Fr. Edward McElroy）定期過來開彌撒。在一次特殊情況下，他於黎明時分在紅花嶺舉行彌撒，紅花嶺是一座可俯瞰中國大陸的小山丘。彌撒以國語進行，許多其他會院的修女也來參加。他們想起了當時在中國監獄裡的游國傑神父，他是游德肋撒修女的弟弟。游神父在上海進鐸前兩個月首次被捕。他在監獄或勞改營裡度過了三十多年，為福音作見證。1982年，黎碧潔修女在粉嶺聖堂慶祝她的銀禧紀念，共有三十多名修女和嘉賓出席。

圖：從紅花嶺山頂可遠眺深圳。「天行足跡」攝

由於距離中國大陸如此之近，打鼓嶺會院的修女非常了解大陸人民的苦難。許多人穿過邊境的鐵絲網偷渡來港——一名男子在途中遭到鯊魚襲擊，腳被咬掉。如果修女們在周圍發現成捆的破爛衣服，她們就知道有人越過了邊境逃跑。警方一直在尋找非法移民，一旦發現就會立即遣返大陸。

1981 至 1984 年間，麥潔妮修女（Sr. Maureen McGinley）擔任這座明愛中心的主任，負責幼兒園和診所的運作。她探望老人和病弱的人，經常將病人送往專科診所。隨著附近診所和醫院的數量增加，很明顯不再需要這類型的診所了。經過評估當地的需要後，明愛得出結論，打鼓嶺最需要的是安老院舍。

最後幾年在打鼓嶺工作的修女有鄧敏修女、白碧哲修女和游德肋撒修女。她們最終於 1986 年復活節後的星期一搬出。1986 年 3 月，總會在沙田牛皮沙新村 9 號購買了一套房屋，成為了香港的區會院。

第八章：整體環境

在七八十年代，香港取得了非凡的進步。在經濟上，政府足夠富裕，可以開始改善住房、教育和衛生。到了八十年代末，香港已擺脫第三世界貧窮，成為亞洲四個出口經濟體之一。香港現在是個社會奇蹟，人口從 1945 年的 50 萬增加到 1995 年的 650 萬。在打鼓嶺診所和托兒所所在的新界區，已經發生了幾乎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新界農民在五六十年代逐漸放棄種植稻米，到英國尋找更有利可圖的工作。從泰國和中國大陸購買大米比在新界的稻田裡花時間種植水稻更容易。稻田現在被用來存放大型貨櫃，有助於建造世界上最繁忙的香港貨運港。

醫學的進步亦產生了更多綜合醫院和更多大學和專上學院的需求。政府正在努力滿足健康和教育的需求。傳染病不再是香港的主要殺手。事實上，大多數結核病患者現在可以在門診部接受治療。

自 1950 年以來，律敦治療養院為解決結核病這一傳染病問題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結核病是三十年來香港主要死亡原因之一。高隆龐會修女的承諾和技能，與政府部門和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合作，促進了六十年代結核病新藥的重大研究計畫。這項

研究使香港成為結核病治療和管理的先驅。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的華萊士．福克斯教授（Wallace Fox）發現，律敦治工作人員的紀律和熱情非常適合進行這項研究，該研究有助於降低香港的結核病發病率。

許多研究項目不僅包括結核病患者，還包括脊椎結核患者。律敦治療養院成為第一個認真治療結核性腦膜炎的醫療單位。這是一種可怕的疾病，律敦治的醫療單位被公認為是控制這種疾病的主要參與者。紀寶儀修女主動治療這種嚴重的結核病，並邀請神經外科醫生在需要神經外科干預的兒童身上參與治療。嚴美納修女和其他修女以及病房工作人員幫助這些患者進行術後管理和持續護理，取得了出色的效果。當時，七十年代初期，兒童病房裡有二十名或更多的兒童正在接受這種疾病的治療。

教會和修會此時正處於瞬息萬變的一刻，派駐香港的修女是其中的一份子。在香港，徐誠斌主教召開了教區會議，以回應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帶來的挑戰。他在迎接教區會議的牧函中說：「在這麼短的一個時期中，發生了這麼多變化，在歷史中是罕見的。因此，身為得救標誌的教會，其呈現於世人面前的面目，今日明日，當與昨天不同；教會要把天主父透過基督所顯示的愛，向世人宣示。」

許多修女積極參與教區會議，並成為各個研究大公會議文件委員會的成員。修理雲修女是修會生活小組的成員，蘇梨韻修女

是社會工作小組的成員，而許多修女參加了有關彌撒及聖事、合一運動、教會、其他宗教等的各種會議。

1973年，莫琳．拜恩修女接替修理雲修女擔任律敦治會院的院長。莫琳．拜恩患有青光眼，她的視力下降至無法再在醫院工作。多年來，她在醫院的護理和管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深受病患和工作人員的愛戴。她每周的休息日都用來參加公立醫院護士的聖母軍會議。聖母軍組織了一個雙支團（twin presidium），使無法參加上午會議的護士也可參加晚上在公教進行社舉行的會議。瑪利．馬丁．赫伯特修女後來接手負責這個支團。多年來，聖母軍的工作一直是修女們的首要牧職。早在1949年，陳玉如修女就加入了香港的第一個支團，之後她成為高隆龐傳教女修會的修女。她認識莫克勤神父，是莫神父在香港成立第一個聖母軍支團。其他參與聖母軍的人包括修理雲修女、莫琳．拜恩修女、馬丁．赫伯特修女、維克多．瑞安修女、狄麗瑾修女（Sr. Rita Deegan）、蘇梨韻修女、白碧哲修女、衛愛蓮修女（Sr. Mary Anthony Ryan）、羅志娜修女（Sr. Lucina Lillis）、胡雅麗修女（Sr. Nuala Raleigh）和李潔靈修女（Sr. Mary Greaney）。李潔靈修女從 1972 年抵達香港起就一直參與聖母軍工作。1972年，她在主教座堂舉行的年度聖母軍檢閱儀式上發表演講，隨後收到了聖母軍創始人杜輝（Frank Duff）的來信，說她創造了歷史，成為首位在主教座堂舉行的聖母軍檢閱典禮講道的修女。李潔靈修女是杜輝要好的朋友，她收到了他的

許多來信，鼓勵她和香港的聖母軍團員要多了解他們對中國及在中國福傳使命中的重要性。

一些因參與聖母軍而在中國監獄服刑二三十年的聖母軍團員獲釋後來到香港，莫克勤神父和修女們在律敦治跟他們有許多非常感人和有趣的聚會，分享他們在信仰上的見證。李潔靈修女仍有參與聖母軍活動，並擔任區團神師超過二十五年，她與華人神父及本地和菲律賓籍的聖母軍團員緊密合作。律敦治療養院本身在五十至八十年代有兩個聖母軍支團（一個英語和一個中文支團），支團的成員來自律敦治療養院的職員。

1975 年，莫琳．拜恩修女在主教座堂安排了修會的金禧慶典，並在明愛餐廳提供茶點。主持彌撒及講道的是該堂區的曾慶文神父。禮儀後，他與修女們的許多神父朋友、聖母軍團員和律敦治以前的病人一起用膳。當晚，律敦治的修女團體受邀出席香港華仁書院耶穌會團體舉辦的晚宴。

在七十年代，修女們參加了律敦治及其他地方舉辦的祈禱聚會。應一些主要修會長上的要求，他們在律敦治成立了一個團體，定期舉行聚會，成員包括神父、修女和平信徒。團體中的許多神父常提到在教會動盪的時期，這個團體對他們的靈性生活非常重要。

律敦治也接待了「促進更美好世界運動」（Movement for a Better World），並舉辦它的會議，有幾位修女也參加了這個

運動。區貴雅修女也參加了「國際職業婦女福利互助會」（Soroptomist）的活動，她們有時也會在律敦治療養院開會。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修女們的一個重要牧職是參與聖若瑟堂新的教理講授計畫。瑪利．傑瑪．雪萊修女是第一個前來幫助的人。她離開後，麥潔妮修女與賴詠恩修女（Sr. Anne Ryan）和潘秀珠修女一起繼續這項牧職，為該堂區服務逾十七年。

瑪利．傑瑪．雪萊修女是於七十年代初被派往香港；此前她擔任總會長十二年，再前往羅馬修讀靈修課程。她在香港擔任多種不同牧職。她是護士的心理輔導師，在護士學校教授英語和心理學，又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私人補習。當加爾默羅會的修女聽說傑瑪．雪萊修女在羅馬的課程，以及她認識一些傑出的靈修學者，亦即苦難會巴爾納伯．埃亨神父（Fr. Barnabas Ahern, CP）、莫利納里（Molinari）、大衛．斯坦利（David Stanley）等人時，她們請來傑瑪．雪萊修女給她們講課；她們即將在夏威夷建立新會院。在時任總會長加大利納．赫爾利修女的同意下，傑瑪．雪萊修女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陪伴第一批加爾默羅會修女，幫助她們適應新環境。當傑瑪．雪萊修女完成協助加爾默羅會的職務後，她被調派到智利。

當大口環醫院的職務在七十年代結束時，其他的大門正在打開。徐誠斌主教非常希望修女們能夠在教區的明愛醫院提供服務。沙娜雯修女成為了那裡的護士長，衛安妮修女、胡雅麗

修女、羅志娜修女和馬丁．赫伯特修女都在明愛醫院工作了多年。香港明愛總裁力理得神父因沙娜雯修女的經驗，請她幫助明愛醫院與其他公立醫院接軌，並為轉做政府資助醫院做好準備。

當沙娜雯修女擔任明愛醫院護士長之前，羅志娜修女早已在那裡從事與殘疾人相關的工作。這就是羅志娜修女在香港的使命。她幫助在香港建立殘障人士之家（扶康會）。王修女也開始在明愛醫院為痙攣兒童進行「引導式教育」。胡雅麗修女和馬丁．赫伯特修女受聘為明愛護士學校的導師，而衛安妮修女在醫院的急症室和骨科部門的護理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當時律敦治會院裡，有些修女已準備到秀茂坪的學校，而有些是剛抵達準備到藍塘道的學校，另外也有來自大口環和律敦治團體的修女。這裡也有些「年輕」修女，像賴秀玉修女（Sr. Divina Lua）正準備發永願，賴詠恩修女還在暫願階段。這段時期還有從緬甸來的若望．雅各伯．侯爾主教（Bishop John James Howe）和科利爾神父（Fr. Collier），科利爾神父必須在律敦治療養院住院一周或更長時間才能恢復出行。1978 年 1 月 1 日，被分配到秀茂坪的修女離開律敦治會院，搬進她們的新家。擔任先鋒的有校長杜瑪利修女、會院院長樂易安修女（Sr. Isobel Loughrey）、雷修女（Sr. Patricia Quigley）、謝德華修女（Sr. Ursula Scullane）和賴秀玉修女。後因人手調整關係，謝德華

修女被調往藍塘道學校，而白秋霞修女（Sr. Patricia Byrne）被調派到秀茂坪學校。

1978 年 8 月 24 日，被分配到藍塘道學校的修女們搬到那裡並成立了會院。第一批修女是校長高詩蘭修女（Sr. Sheila Crowe）、馬修女、衛愛蓮修女和謝德華修女。在秀茂坪學校開辦之前，樂易安修女、白秋霞修女和衛愛蓮修女已經在藍塘道的瑪利諾學校任教。

香港成為修會的一個會區

1979 年 9 月 29 日，修會的香港區會正式成立。穆嘉田神父（Fr. Richard MCarthy, S.J.）在律敦治為這個特別的日子主持彌撒。白碧哲修女被任命為區會長，鄧敏修女和馬修女擔任她的議員。1979 年 11 月，嚴美納修女被任命為律敦治會院的院長，該會院包括了藍塘道的團體。1979 年 12 月 1 日，區會院在藍塘道成立。白碧哲修女繼續在傅麗儀療養院兼職，直到 1980 年開始籌備修會第 81 屆全體代表大會的工作。區會院的修女現在舉行了她們的第一次區會議，其目的是評估區會的工作為全體大會作準備。

多年來，駐於香港的梅開五神父一直忙於與中國及高隆龐會神父過往在那裡的傳教點接觸。柯德華神父也同樣參與其中，但駐紮在台灣。1980 年 11 月，梅開五神父病重，於瑪麗醫院接受大手術後不治身亡，柯德華神父隨後接手梅開五神父對中國的工作，他對後來建立「國際教學教育課程協會」（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AITECE）及派遣教師到內地大學任教至為重要。

1980 年代

我們現在已進入律敦治工作的最後幾年，但還有很多這些年來建立的重要職務有待處理，其一是於 1956 年 8 月啟用的傅麗儀療養院，它是由高隆龐會修女為結核病患者提供護理至 1988 年律敦治療養院移交為止，與律敦治療養院共同運作至 1991 年關閉，目的是將其改建為護理安老院。

2001 年傅麗儀護理安老院開幕時，宣傳冊指出，在 1956 至 1991 年間，約有 11,000 名患者在那裡接受過治療，高隆龐會修女在這些年的大部分時間提供了熟練的護理及監督其運作。

被轉移到傅麗儀療養院的病人較多是病情不再嚴重或已不太具傳染性的患者。他們可以自己舖床，在花園裡幫忙。患者多數有能力參與一些可為他們未來發展新技能的活動。

多年來在傅麗儀療養院工作的修女包括易瑪利修女、賈斯汀．卡西迪修女、毛修女、萬美蘭修女、瑪加利大．蒂爾尼修女、瓦萊麗．海特頓修女、狄麗瑾修女、白碧哲修女、李潔靈修女等人。史蒂芬．曼尼恩姆姆出了很多力將周圍的環境改造成一個景觀花園，綠樹成蔭，有魚池，花床和盆栽。

律敦治的門診部是另一個在使徒工作上很重要的地方。患者出院後，在正常情況下會被送往政府胸肺科診所繼續治療和跟進；其他病患，例如患有結核腦膜炎、脊椎結核和關節疾病以及氣喘病，肺衰竭，糖尿病或其他併發症的患者，都是在律敦治的門診部跟進。這些患者需要個別的關注；護士需要確保他們定期返回門診部接受藥物治療。這個部門的主管修女當然是團隊的領導人，對於確保整個過程的順利運作至關重要。多年來，萬美蘭修女以高效率的方法擔任這一角色。她認識每一位病人，並追蹤每一位病人，就好像沒有其他人比他們重要。護士和醫生都訓練有素去處理那些患有特殊併發症的病人。區貴雅修女和紀寶儀修女都會為這些病人服務。

吸毒者是另一個受特殊關注的群體。區貴雅修女對幫助這個群體特別關心，並擔任了「香港戒毒會」的主席。在八十年代參與協助戒毒者的包括狄麗瑾修女、麥潔妮修女、賈斯汀．卡西迪修女、何維珍修女、施穎雅修女（Sr. Sylvia Sherwood）、胡雅麗修女和賴詠恩修女。病房修女對於院內的氣氛和運作順暢上有著獨特的影響。她們學習本地話，並隨時待命，不僅是對患者，對訪客和護士們，她們都可以隨時提供協助和服務。

自 1975 年開始，律敦治療養院的未來便成為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關注的問題。當時醫務衛生署署長蔡永業醫生特別邀請了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的華萊士．福克斯教授與約翰．

蓋耶特．斯丁教授（J.G. Scadding）從倫敦布朗普頓醫院來港檢討香港結核病的治療和控制，並就未來規劃提供建議。

他們的建議很簡單：結核病不再是像以往一樣需要大量病床的疾病。院方現在可以減少病床，並由現有的政府門診處理病症的方式繼續運作。由於律敦治療養院的舊大樓已殘舊不堪，便建議用新醫院取代它，其中將包括更多的普通科和外科設施。

1979 年，療養院董事會決定，新律敦治醫院應擴大醫療範圍，為民眾服務。新醫院的建設是一座擁有 650 張病床的綜合醫院，於 1986 年動工，1990 年竣工；計畫設有普通科及外科病房、老人病房、療養床位，為香港市民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防癆會向修女們明確表示，希望她們能夠管理這家醫院，但天主另有安排。

李淑倩修女曾在律敦治擔任醫院行政工作二十四年。李修女在愛爾蘭發初願後，於 1960 年返回香港，她的行政工作包括培訓不同崗位的本地員工。當他們有更好的工作要離開，她繼續培訓及幫助其他人，其中許多是難民。李修女承認，律敦治當時的經濟情況很糟糕，舊建築的維修是個問題。大雨經常湧進陽台，在早期，尤其是颱風期間，病人要在床上打傘！

她與員工相處的經驗和所遇到的問題都是獨一無二的。她講述了她有時不得不解僱吸毒的員工的故事。有一天，她發現沒有晚餐，負責的廚師在廚房裡睡著了，因他吸食了過量的海洛英。

八十年代初，李修女決定是時候培訓本地華人，為新醫院的管理工作做好準備。1984 年，她離開香港返回愛爾蘭馬格拉莫爾母院。

1985 年，三位修女去世。修理雲修女 1 月份在都柏林聖雲先醫院去世，她曾在大口環和律敦治擔任放射技師，也曾在這兩個地方的會院擔任過院長。

麥德明修女有癌症病史，在愛爾蘭接受治療多年。病情控制後，她決定返回律敦治，但康復了幾年又復發。麥德明修女不僅於五六十年代在律敦治療養院擔任秘書，也曾在打鼓嶺服務多年，熱愛那裡的傳教工作。她在 1985 年 6 月於律敦治逝世。

區貴雅修女是第三位在 1985 年去世的修女，那年 8 月她發現自己患有晚期癌症。她從瑪麗醫院轉往律敦治醫院接受臨終照護，於同年 11 月逝世。作為醫院團隊的領袖，她的去世為律敦治的修女們帶來了極大的震盪。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然而，這也讓其他修女更容易繼續前行。區貴雅修女參與了將療養院改建為綜合醫院的決策，但她從未將自己視為這間新醫院的一份子。然而，她確實認為一些負責護理的修女能在新醫院的病房中看到自己的事工，但事實並非如此。

向區貴雅修女致敬

只有到了這個階段，談論區貴雅修女是最合適的，她四十年來一直領導著香港的修女和員工團隊去服務律敦治療養院。也許現在也是時候請與她密切合作的人談談她對香港醫學的貢獻了。

圖：麥德明（左起墓碑一）及區貴雅（墓碑三）兩位修女是少數葬於香港的高隆龐會修女

彌額爾．漢弗萊斯醫生（Dr. Michael Humpheries）曾在倫敦華萊士．福克斯教授領導下的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工作，於 1984 年來到香港，在律敦治療養院擔任醫生，直至 1988 年被任命為顧問醫生兼醫務總監。他現在是上海羅氏制藥的醫療總監。

他在 1996 年出版的 *Ruttonjee Sanatorium Life and Times*（律敦治療養院的生活與光陰）一書中寫道：

> 「高隆龐會修女是在已故區貴雅修女（OBE，FRCP）的領導下服務，她擔任律敦治療養院的院長近四十年……她原定是要在中國工作，但在 1949 年毛澤東驅逐了所有傳教士，她被改派往律敦治療養院，對於我們這些有幸認識區貴雅修女的人來說，她的行政和臨床技巧、無限的精力和幽默感就是傳奇，無需多言。
>
> 在國際上，她因其清晰的教學以及將知識應用於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的智慧而受到追捧。她的特殊研究興趣是抗藥性和再治療以及抗結核藥物的不良反應。區貴雅修女也出版了有關結核病治療與控制、卡介苗接種的刊物，並與香港大學達安輝教授（Professor David Todd）共同為牛津醫學教科書撰稿。
>
> 她經常獲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抗結核聯盟的邀請，參加亞洲和非洲的醫生培訓計畫。1960 年，在英格蘭伊斯特本舉行的世界哮喘醫療大會開幕典禮上，區貴雅修女是英聯邦獎章的得主。瑪麗娜公主將羅伯特．菲利普章獎授予她，以表彰她在英聯邦結核病領域的傑出工作。1978 年，香港大學授予她社會科學博士學位。1980 年，她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以表彰她在

> 香港抗擊結核病方面的傑出貢獻，並於 1985 年夏天獲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接見。區修女的名氣相當大，儘管她會見了英女皇和多位世界領導人，但她仍然保持謙虛。有一次，她的辦公桌上收到了一封由郵局送來的信，只寫著「Sister Aquinas, China」（區貴雅修女，中國）。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邀請療養院的所有員工來探望她，跟她告別，我們都和她的病人一起，排成一隊到她在療養院的房間向她告別。這是她傑出個性的典型表現。」[12]

不過，也許對這位偉大女傳教士的最大敬意是由她會院的一位同道的總結，她說：「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從未聽過區貴雅修女貶損過他人。」

面向未來

1987 年 3 月，時任區會長潘秀珠修女安排了一次聚會，幫助修會就修女們是否應該參與新醫院或完全退出律敦治做決定。高隆龐會彌額爾．麥奎爾神父（Fr. Michael McGuire）受邀主持這次聚會。隨著會議的進展，很明顯，修女會在來年逐步退出律敦治的時機已經成熟，同時也確保能提供合適的替代者。

---

[12] Michael Humphries, *Ruttonjee Santorium: Life and Times* (Hong Kong: Michael Humphries, 1996), p.37-38.

一段時間以來，區貴雅修女和李潔靈修女一直在考慮獲得「英國結核病和胸肺部疾病證書」資格的護理人員在新醫院的未來。未來的醫院管理層可能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些護士，因為儘管他們專門從事胸肺疾病護理工作，但他們沒有接受完整的註冊護士培訓。

在諮詢香港護士管理局後，李潔靈修女安排這些護士到香港各綜合醫院累積經驗。這些進一步的經驗無疑讓他們能夠適應綜合醫院的環境，而他們的主要專業知識將對醫院的胸肺科有貢獻。在區貴雅修女生病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她和李潔靈修女和賈斯汀．卡西迪修女曾在各委員會工作，為新醫院的人員配備、規劃和採購設備提供建議。

在律敦治修女們的工作中，有許多方面是必須在近年處理的，當時修女們已經意識到舊醫院將被拆除。這產生了重大的迴響。它對護士、醫生和醫院職工普遍產生了令人不安的影響。他們擔心繼續受僱於這家宏偉的新綜合醫院工作的不確定性，以及失去由修女擔任部門主管對他們的影響。

律敦治一直致力於肺結核的治療和吸毒者的康復。許多人康復後離開醫院，有些是戒除了毒癮。但也有很多人出院後要去戒毒中心，從毒禍中掙扎。香港戒毒會在石鼓洲島設有中心，因地理位置偏遠，可以防止販毒和走私。區貴雅修女誠懇地拜訪了島上的醫生以支持和鼓勵這項努力。律敦治的修女和員工非常了解

這些病人的困境。李潔靈修女回憶起自己在區貴雅修女去世前不久詢問過她，有什麼可以為她做，區修女回答說：「請關注香港戒毒會」。她最後關心的是那些與毒癮鬥爭的患者的福祉。

修女們現在必須要把注意力轉向更實際的問題。她們從律敦治撤出的日期已定；目標是在 1988 年底前完全撤離。最後撤出的修女包括：會院院長狄麗瑾修女、紀寶儀修女、李潔靈修女，嚴美納修女、賈斯汀．卡西迪修女、胡雅麗修女、何維珍修女，曾致美修女和麥修女。

事實上，在舊會院被拆除之前，麥修女已搬到藍塘道。曾致美修女加入沙田會院，嚴美納修女也搬往藍塘道，李潔靈修女和紀寶儀修女回國渡假，回來後被分配到沙田會院。

圖：曾在律敦治療養院及大口環兒童骨科醫院服務的李潔靈修女

大部分病房修女在 1988 年 7 月前已離開，只剩李潔靈修女和紀寶儀修女在1988年底前交出她們的職位。1988 年 10 月，已準備好擔任護士長職位並獲得董事會認可的護士郭南希

接任護士長。紀寶儀修女的前助手彌額爾．漢弗萊斯醫生在1988年12月於紀寶儀修女離開後成為院長。

最後，修女們都意識到，「作為一個傳教團體，我們與基督同行，分享祂的使命，甚至給予自己的生命。與基督一起，我們面臨不安全感，包括在召叫中放下一切，繼續前進，而且總是以不確定的方式前行……這要求我們以開放的態度做出選擇、承擔風險並生活在不確定性中。（全體大會聲明——1987、1999）

第九章：教育

到了七十年代，高隆龐會修女在許多方面拓展了她們的牧職，並使職務多元化。律敦治的會院自始至終都是中途停留的地方，供途經香港或來自菲律賓及韓國修院的修女們根據需要作短暫或長期的停留。不過，在七十年代，這裡接待並暫時安置了被派遣到這裡從事教育工作的修女，她們先是派來為梁式芝書院工作，後來又調派至瑪利曼中學。

七十年代初，時任總會長加大利納．赫爾利修女與香港主教徐誠斌主教聯繫，討論派遣修女到香港從事教育工作的可能性。

加大利納．赫爾利修女在 1972 年 1 月 13 日給徐主教的信中寫道：「我於去年 5 月拜訪您時，曾向您提到，如果我們有能力的話，我們願意參與香港的教育工作。

現在我們認為可以在 1972 年 9 月派三四位修女到香港開始語言學習，以期在 1973 或 1974 年進入教育工作的領域。我們願與本地教會當局合作，並且希望從事最需要的範疇。我必須補充一點，身為高隆龐會修女，我們認為能夠在中國人中拓展我們的工作是真正的榮幸，因為在中國傳教是我們五十年前成立的動力。」

徐主教回覆：「我們很高興從您 1 月 13 日的來信中得知，您將派修女到香港參與教育使徒工作。目前我們正在與香港政府

就一所位於安置區的津貼女子中學的計畫進行磋商，我們願意將其交託給您們的修會。」1972 年 2 月，教區總務長寫道：「我們的主教希望給您們的地點位於九龍秀茂坪，該項目很緊急。」

當時，秀茂坪是個人口稠密的安置區，人口超過 14 萬，都是來自內地、講粵語的難民。該校將是這個人口稠密地區的第一所女子中學。

圖：梁式芝書院，攝於 2015 年。
維基百科用戶 Prosperity Horizons（CC BY-SA 4.0 許可）

1973 年 1 月，被任命為校監兼校長的杜瑪利修女解釋道：「該計畫的資金籌集方式最終獲得批准：政府出資 80%，辦學團體出資 20%。原計畫是一所文法學校，但在新的教育政策實施後，

我們學校的性質變成了一所女子工業中學，政府背後的想法是希望引進一定數量的工業中學，讓家長有更多的選擇，而秀茂坪這個貧困的安置區被認為是設立這類學校的一個好地點。初時家長們都反對學校叫工業中學，因他們覺得這是職業學校。他們重視提供文科和理科的傳統文法學校教育，中國人不欣賞技術和職業科目。」

她續說：「我們有幸從建築師黃澤生先生那裡得知，當年慶祝 70 歲大壽的岳父決定捐出高達 100 萬元的善款用於教育項目。這筆捐款最終為港幣 180 萬，以梁銶琚先生及其兄弟的名義捐贈，希望學校以梁式芝命名，以紀念他們的父親。由於中東的石油問題對香港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學校延到 1976 年 6 月才開始興建。梁銶琚先生對這所學校非常感興趣，他參觀工地，並關心工程的進度，更提出願意支付費用添置額外的設施，改善校舍。」

1973年，樂易安修女、雷修女和賴秀玉修女被派往香港從事教育使徒工作。謝德華，白秋霞和衛愛蓮三位修女稍後也被派到那裡。當杜瑪利修女和其他修女在等待開展工作時，她們學習語言並在律敦治生活。1974年，杜瑪利修女學習語言後，在耶穌會辦的香港華仁書院任教。

1975 年 7 月 25 日，胡振中接受祝聖為香港教區主教。幾天後，副主教、宗座外方傳教會艾巧智神父（Fr Secondo Einaudi, PIME）致電律敦治會院的院長，請求派遣一位修女為新主教

處理即時的秘書工作。杜瑪利修女被指派執行這項任務。她會見主教和艾巧智神父後，同意接受一份她認為是非常臨時的工作。然而，在主教的要求下，杜修女繼續擔任他的兼職秘書，直到建築工程開始。隨後，雷修女代替她，再繼由馬修女接替。最終，蘇梨韻修女於 1981 年 7 月 1 日被任命為全職秘書。她一直把自己奉獻給這份教區職務，直至胡主教（後來的胡樞機）於 2002 年 9 月去世為止。

樂易安修女在等待梁式芝書院啟用期間，有兩年時間（1975-77）在藍塘道與瑪利諾修女一起教書。謝德華修女和賴秀玉修女利用這段時間在香港大學攻讀了教育研究生證書。雷修女在香港仔的明愛學校任教。

梁式芝書院原計畫於 1977 年 9 月開課，但由於校舍尚未完工，前三個月的課程是在附近藍田住宅區一所小學借用教室來上課。修女們每天從律敦治往返。教職員包括校長兼校監杜瑪利修女、樂易安修女、雷修女、謝德華修女、賴秀玉修女和 6 名本地教師。此外，還包括一名書記、校工和兩名清潔工人。入學人數為 260 名中一女生，其中 23 名是天主教徒。

1978 年 1 月 1 日，修女們搬進了新家。謝德華修女向我們生動地描述了她們的第一天：「1977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我們的大部分書籍和家庭用品從律敦治由貨車和汽車運到秀茂坪。1978 年 1 月 1 日星期日，我們收拾了最後的物件，主要放在塑膠袋內，

白碧哲修女、馬修女、白秋霞修女帶同行李，乘坐一輛飛雅特轎車於下午 1 時 30 分離開，樂易安修女和賴秀玉修女乘坐一輛福斯轎車跟在後面，而區貴雅修女、馬丁修女和杜瑪利修女和雷修女則搭乘公車前去。

我們到達秀茂坪，在宿舍各處尋找工人修理地板、喉管、牆紙等。堂區神父送來了一大個花瓶的劍蘭和玫瑰，為我們帶來驚喜。我們走到六樓的一間教室，睡床就放在那裡。我們燒開水，裝滿熱水瓶，並晾曬一些床墊和毯子。然後，我們坐在一張木床邊享用茶、無花果卷和糖果。我們發現有三間臥室適合居住，便把三張床和兩張額外的床墊搬進去。我們有媒氣爐，但沒有媒氣。我們一起做晚禱，然後吃晚飯，晚餐有茶和從律敦治帶來的火雞三明治。我們在窗戶掛上一些床單作為窗簾，便去睡覺。天氣越來越冷，所以棉胎、套頭毛衣和開襟羊毛衫都要出動了。

大家都沒有睡好，因為又嘈又冷。早上 6 點 45 分，我們在廚房做晨禱，然後前往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參與彌撒。那天是公眾假期，天氣非常寒冷。參與彌撒的人很少。堂區神父盧樂民（Fr. Raymond Joel Nobiletti, MM）為我們祈禱並熱情的歡迎我們。彌撒後我們回家吃早餐，然後工人們就來了。我們把個人物品放回塑膠袋，放進儲物室。這個過程持續了好幾天。曾致美修女和我們的司機多明我（Dominic）每天都從律敦治送來我們的晚餐。」

過了一些時日，從事非教育職務的修女們被分配到這個會院。潘秀珠修女在觀塘耶穌復活堂區做牧靈工作。她是第一位在香港從事此類牧職的高隆龐會修女。觀塘是一個有很多不同工業和很多工人的地區。在接下來的四年裡，她負責主日學，並做了許多家訪、聖經分享活動等。

艾比．奧沙利文修女（Sr. Abbie O'Sullivan）於 1978 年 9 月 27 日從愛爾蘭來到這裡，在新亞書院學習語言，並加入了秀茂坪會院。完成語言學習後，她被分配到藍塘道的中學任教。

1978 年 11 月，雷修女返抵愛爾蘭。杜瑪利修女寫道：「她是我們第一位音樂老師，對秀茂坪的彌撒禮儀和宗教教育有很大的貢獻。她還幫助設立了辦公室，培訓了辦公室的員工，她以獨特的領導方式去激勵和幫助清潔員工——她把清潔員工視為同工，經常與他們一起工作，從而培養了員工的奉獻精神，使他們會為提供乾淨的校舍而感到自豪，而他們和我們也常常為此感到驕傲。一些參訪者，包括教育司署的官員，經常對學校環境的清潔程度給予很好的評價。雷修女的領導模式讓清潔員工覺得這也是『他們的』學校，他們對此感到非常自豪。」

從一開始，學校政策的一部分就是強調優秀中文的重要性，因為香港的教育體系中，英語課程往往較受重視。為了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我們購買了許多中國樂器，並聘請了老師來教導女孩們如何演奏不同的樂器。這催生了非常成功

的中樂團，還有教授中國古典舞，又非常重視中文詩歌朗誦和中式戲劇。

1980 年

學校定於 1980 年 3 月正式開幕，杜瑪利修女回憶道：「正式開幕前的幾個月，大家都非常忙碌。學生在老師的幫助下，準備了很多展示項目。那一年，春天潮濕多霧的天氣顯得格外壓抑。香港 2 月至 3 月初的大部分時間都籠罩在濃霧中，濕度高達 90%-100%，所有瓷磚牆壁和地板都在「哭泣」，學生的展品都因受潮而掉落。大家非常興奮地期待著正式開幕，但現在我們不知道這個地方會不會看起來很糟糕。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斷祈禱，深信天主的仁慈。3 月 6 日早上 10 時，我們在禮堂舉行了感恩彌撒。外面黑雲密佈，把我們籠罩在黑暗中……雷電交加、傾盆大雨隨之而來。我們的堂區神父江潤坤神父是個身材矮小但非常樂觀的人，他為我們主持彌撒。他用溫暖而燦爛的笑容向我們問好，說：「雨是天主賜福的標誌。」在那一刻，我們只可以祈求並接受任何的祝福！當我們從彌撒出來時，天邊出現了一縷陽光。其中一位非天主教徒老師興奮地說：「修女，天主聽到了我們的祈禱。」很快，霧氣又再降臨，我們的情緒也跟著下降。第二天早上，我們還籠罩在薄霧之中……就這樣吧！我們必須盡量做到最好。但在上午 9 時左右，霧突然消散，燦爛的陽光溫暖了我們並曬乾了一切。這就是

我們所期盼和禱告的……奇蹟！學校看起來棒極了，彩旗再次在微風中飄揚。

1980 年 3 月 7 日，這所取名為梁式芝書院的學校由教育署副署長許瑜先生（C.H. Haye）正式揭幕，由香港教區胡振中主教祝聖，並由管治委員會成員、喇沙會彭亨利修士（Brother Henry Pang, FSC）致歡迎辭。

許瑜先生在演講中提到了校訓「主為我佑」，並接著指出：「教育和生活一樣，信仰是很重要的。在存在主義的世界中，人有一種漫無目的的傾向：除了追求快樂和滿足自我，什麼都沒有。存在主義者並不尋求生命的意義，並透過宣稱生命只是一個無望的謎題來將生命的無望合理化。不同信仰的人對生命的態度是如此不同！雖然生命是一個奧祕，但它是有目的的。這是一間天主教學校，我相信無論學生的信仰是什麼，她都有很多恩賜。生命是一份恩賜，應該用一顆對賜予者感恩的心來享受它，即使我們對這位賜予者有很多不同稱謂。」

胡主教隨後為這棟學校祝聖。杜瑪利修女向許多使這一天成為可能的人道謝。她憶述：「當晚，梁銶琚先生在禮堂設中式宴會，向教職員和嘉賓致謝，並表達他對學校正式開幕的喜悅和興奮。他仍然對學校的種種事務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特別是女同學們的成就。他經常招待教職員和學生參加茶會或自助午餐，他的慷慨和仁慈是他的標誌，他的女兒王梁潔華夫人（我們的建築師

王澤生先生的妻子）在梁銶琚先生臥病後，亦表現出同樣的體貼和慷慨的精神。」

耶穌會魏志立神父（Fr. Harold Naylor, SJ）為同一場合寄來了一封讓大家非常安心和開心的信。他寫道：「我參觀過這間充滿色彩的學校，就像女生們希望的彩虹；我看到和聽到女生們展現出她們活潑的創造力和不斷增長的才華和美麗，這當然就是教育的意義所在。

我很高興看到她們的英語能力這麼高，但教育不只是英語。我個人希望你們能特別重視中文的學習。學生在情感、表達和行動上必須是真正的中國人，儘管他們在經濟生活中也必須使用英語。總之，我相信梁式芝書院將會成為真正的傳教士，致力發展本地華人教會，培養真正的華人學生。」

白秋霞修女寫道：「這一天一開始就很潮濕，但下午陽光照射時卻很明媚燦爛。下午 3 時左右，嘉賓陸續抵達，現場洋溢著歡樂的氣氛。當主禮嘉賓梁銶琚先生、胡主教和許瑜先生抵達後，我們在禮堂外獻給梁先生父親的牌匾前集合。梁先生揭開了牌匾的蓋紗，胡主教也正式祝聖了學校。之後嘉賓來到學校操場，享用梁銶琚先生特別為大家準備的茶點。隨後，學生們表演舞蹈、詩歌和歌曲。不僅所有嘉賓，還包括全體 750 名學生也一起盡歡。

梁銶琚先生邀請他的朋友、全校教職員和修女們在學校禮堂共進晚宴，為這愉快的一天畫下圓滿的句號。告別嘉賓後，我們分享了由樂易安修女親手做的蛋糕，喝著茶，回憶當天的節目。

修會團體

1980 年 8 月，秀茂坪這個年輕團體在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傑奎琳．布朗丁斯修女（Sr. Jacqueline Blondins, MIC）的帶領下，進行了為期兩天的研討會。這是為準備全體大會所作的使徒職務評估。同年 9 月，學校再開學，賴秀玉修女代理校監一職，白秋霞修女代理校長，直到 1980 年 10 月杜瑪利修女從愛爾蘭休假回港。然而，在 1982 年，她不得不返回愛爾蘭照顧生病的母親。在她缺席期間，謝德華修女擔任了校監兼校長。

從 1983 年起，衛愛蓮修女和一群平信徒教師負責大部分的宗教課。衛修女在梁式芝書院教授宗教和英語課達 12 年之久。在早期，所有學生都修讀宗教課作為課程的一部分，每周兩節課。天主教徒每周一放學後有額外的課堂，並借此組成了天主教同學會。她們有機會透過祈禱和反思來學習和參與彌撒禮儀。學校也為有興趣的人提供慕道班，參加了慕道班的同學會被轉介到自己的區堂接受洗禮。多年來，學校一直強調社區服務——它已成為教育的一部分，中學六年級和七年級的學生在這一領域發揮了領導作用。梁式芝書院提供良好的社區服務，每年數次被用作堂區中心、警察瞭望台、公開考試中心和供學生溫習的自修室，每天開放直至晚上九點。

蘇碧玲修女（Sr. Tomasa Saberon）和郭麗嘉修女（Sr. Gloria Santos）在八十年代初從菲律賓派往香港。兩人加入秀茂坪會院團體兩年，期間學習中文。1982 年，她們在秀茂坪會院團體發永願。蘇碧玲修女開始對跟學生和香港的菲律賓移民分享《聖經》感興趣。杜修女（Sr. Grace de Leon）於 1980 年 10 月從菲律賓抵港，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習語文期間，被分配到打鼓嶺會院。1981 年 11 月，她在藍塘道瑪利曼區會院發永願。

藍塘道和瑪利曼中學（1978-1998）

在七十年代，瑪利諾修女發現自己的人手非常緊張，決定退出位於藍塘道和大坑道的學校。1976 至 77 年間，她們接觸加大利納．赫爾利修女，詢問高隆龐女修會是否有興趣接管她們的學校。此時，高隆龐女修會正在秀茂坪開辦她們的第一所學校。

總會長加大利納．赫爾利修女諮詢了她的議會，聽取了建議，並諮詢了香港地區的修女。修女們認為，此時開辦第二所學校肯定有優勢，因為會有更多的修女參與教育職務，如果有些修女想要改變，第二所學校可以是選項。但也有人心存疑慮，這是一所「上流階層」的學校，並不完全為了窮人和弱勢群體。但整體來說，她們還是贊成我們接手該中學。

1977 年 5 月，赫爾利修女通知香港的修女，總會決定在未來兩年內接手藍塘道的學校。藍塘道開始的歲月與在秀茂坪從零開始興建學校的實際情況大不相同。該學校已經是一所老牌的

中英文學校，各班級正在運作，師資到位，有多年的經驗。高詩蘭修女在 1978 年寫道：「瑪利諾修女離開時，這裡整潔有序，井井有條。她們將頂層給我們作為居所，所有的家具和廚房設備都交給了我們。我們只用一部小汽車把用品從律敦治搬來。」

圖：1957 年建築中的香港瑪利諾書院 [13]

瑪利諾會賴安納修女（又稱賴嘉露，Sr. Ann Carol Brielmaier, MM）繼續擔任第一年的校長，高詩蘭修女擔任

[13] 編按：瑪利曼中學前身由瑪利諾女修會營辦，於 1921 年創校，其時稱為聖神學校，位於港島羅便臣道，1930 年遷往堅道，直至戰時關閉，於 1948 年重開，更名為瑪利諾學校。為容納更多學生於 1957 年搬至跑馬地現址，包括中小學部。小學部於 1961 年遷往大坑道。圖片來源：Maryknoll Mission Archives: MSA/Images/China Region/Hong Kong/Box 3/Folder 10。

校監。高隆龐會修女亦在那裡定居下來。賴修女給高隆龐會的修女安排教學任務。瑪利諾會馬思平修女（Sr. Margaret Shepherd, MM）當年繼續在學校任教，而高隆龐會的馬修女當時仍擔任胡主教的兼職秘書。衛愛蓮修女和謝德華修女是全職教師，兩人以及馬修女都教授英語課和宗教課。第一年是高詩蘭修女的工作培訓年。她與賴安納修女一起參與學校的管理委員會、學校諮詢委員會及與教育司署的會議。1978年，賴安納修女離開後，她成為了校長。其他任教的修女包括艾比．奧沙利文修女，樂易安修女、杜修女和蘇碧玲修女。來自律敦治的毛修女於 1979 年 8 月加入藍塘道會院，並成為學校圖書館管理員。她也接受了向越南難民教英語的挑戰。有些修女只兼職教學，以便促進與學生的互動和參與她們的課外活動。

學校

1978年，白秋霞修女和來自香港華仁書院的愛爾蘭耶穌會士黎烈德神父（Fr. Dreck Reid, SJ）成為了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他們亦邀請了兩位舊生會的校友加入。高詩蘭修女和馬修女在藍塘道工作期間一直擔任管理委員會成員。高修女一直擔任校長，直到 1991 年 5 月交棒給黃何慧馨。

1982 年 10 月 1 日，潘秀珠修女、馬修女和白秋霞修女接任區會成員，同年 12 月，白碧哲修女離開前往芝加哥重發聖願。

1983 年 9 月，學校名稱由香港瑪利諾書院（Maryknoll Sisters School）更名為瑪利曼中學（Marymount Secondary School）。校徽的英文縮寫 MSS 保持不變。這對於瑪利諾修女非常忠誠的學生來說意義重大。

圖：瑪利曼學校，攝於 2010 年，辦學團體於 1997 年已改為基督生活團。
By Tksteven - Own work,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1081893>

禧年

1985 年 9 月 29 日，區會慶祝了修會的鑽禧紀念日，並在藍塘道會院慶祝麥修女的鑽慶。麥修女是這個修會先鋒中最後尚存的成員，當律敦治的修女開始搬離醫院並從事新的職務時，她被分配到這個會院。她一直住在藍塘道會院，直到 1988 年 6 月 28 日

去世。她去世前已收拾行裝，準備回愛爾蘭安度餘年；然而，她當天準備參與彌撒前，悄然離世了。大家都覺得天主俯聽了她希望在香港長眠的最後願望。

大坑道瑪利諾學校（小學）

在修女們同意接手中學後不久，瑪利諾修女再提出接手附近小學部的請求。這個請求最初被拒絕了。總會和瑪利諾修女之間的磋商仍在繼續，1980 年 8 月 4 日，白碧哲修女通知修女們，高隆龐會已同意接手成為辦學團體。她本人於 1980 年 9 月至 1982 年 9 月擔任第一任校監。教職員包括校長 1 名、教師 26 名和輔助人員 6 名。

會議

1986 年 9 月舉行了關於香港高隆龐會修女教育使徒工作的諮詢。九位具有教育經驗的修女與區會團隊三名成員出席了本次會議。聖高隆龐會彌額爾．麥奎爾神父擔任協調員。

謝德華修女表示，她在香港任教的頭五年，對自己的教育職務感到非常滿足，而之後關於學校的整個問題都提升到總會去討論。她覺得不斷的提問，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她們在學校的使命感，但卻讓她們關注到香港政治局勢的現實，以及香港即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秀茂坪會院的修女們反映說：許多修女已準備了進入新的事工。

梁式芝書院和藍塘道學校的未來是根據現有人手，以及香港於 1997 年回歸的情況來考慮。每所學校的狀況都考慮到，包括學生人數、學生的家庭背景，以及高隆龐會修女為窮人和未接受福音者服務的優先選項。當必須在梁式芝書院和瑪利曼中學之間投票做出選擇時，明確的答案是保留梁式芝書院。

區會團隊經過商議後，得出的結論是，在對學校的承諾中，需要不斷發展平信徒，為 1997 年做準備。負責行政的修女需要培養平信徒領袖來接手行政職務，特別是校長的職務。更換校監將需要更長的時間，管理委員會也一樣。

從這時起，高詩蘭修女開始準備將瑪利曼學校移交給平信徒教員。這涉及到甄選和培訓合適的平信徒工作人員。黃何慧馨是其中一位似乎具有領導能力的老師。她對學校及其未來作出很大的承諾，她很高興能承擔校長的職責。1989 年，高詩蘭修女和馬修女是學校僅存的兩位修女。

1992 年 9 月，黃何慧馨就任校長，高詩蘭修女在北京學習普通話一段時間後，回到那裡一所大學教授英語。居於屯門的謝德華修女現為瑪利曼中學校監，於同 1992 年 11 月搬回藍塘道會院。

1992 年 12 月，區會團隊決定將藍塘道會院的地方移交給學校，以緩解學校對額外空間的需求。12 月 21 日，銅鑼灣新會院成立，謝德華修女和麥潔妮修女搬到那裡。12 月底，馬修女和嚴美納修女從藍塘道搬到沙田會院。

1993年復活節，藍塘道會院完全清空，開始翻修改成教室。

移交瑪利曼學校

找合適的機構作為瑪利曼學校的辦學團體很困難。1994年，由高詩蘭、潘秀珠、李潔靈和杜瑪利四位修女組成的委員會開始認真地為學校尋找辦學團體。修女的目標是與平信徒合作；平信徒現在要對教會的生活和使命承擔更多的責任。李潔靈修女與基督生活團作初步接觸，並就他們成為瑪利曼學校辦學團體的可能性展開對話。

1995年8月，賴詠恩修女自區會撰文，描述了當時該地區的人員流動和過渡過程。她寫道：「轉型和變革在這裡找到了歸宿，隨著我們的使命有了新的形態，等待也有了新的意義。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時代正在消失，我們過去在這裡存在的形態也在消失。那些參與我們早期回應人民需求的人，正準備告別這個幾十年來一直是她們家園的地方。紀寶儀修女將於本月返回愛爾蘭，嚴美納修女將告別她為患病窮人提供近半個世紀服務的香港前往美國。李潔靈修女已被任命前往愛爾蘭馬格拉莫爾安養院服務，之後她希望返回香港。目前，我們正在移交三所學校的辦學權。這個過程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當時從事教育工作的修女開始轉到其他職務了。這時候內地的大學需要外籍教師，一些修女認為這是回應當地需求的一種方式。

梁式芝書院的未來看起來比較直接。修女一旦退出服務，這所學校便是教區的責任。當修女們決定交出學校時，她們接觸充分了解情況的胡樞機。1995 年 5 月，樞機寫信給賴詠恩修女：「從牧民的角度來看，我們決定教區將接管梁式芝書院。當然，這還是處於初步階段。」

賴詠恩修女在 1995 年 6 月 18 日給區會的信中寫道：「高詩蘭修女（現為學校委員會成員，被任命負責與區會團隊處理移交事宜）已與教區教育事務代表李永援修女（Sr. Marie Remedios, FDCC）會面，概述了在未來數月我們將有許多行政管理事務要處理。我和杜瑪利修女將於 6 月 20 日與教區總務長康建璋神父會面，討論梁式芝書院修女宿舍的未來。白秋霞修女將於 8 月接替杜瑪利修女擔任校監。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是一個放手、繼續前進的時刻，對於多年來與梁式芝書院有著密切聯繫的修女們來說，更是如此。」

一年後的 1996 年 5 月 23 日，簽約儀式在梁式芝書院舉行。52 名教師中有 48 名與教區簽訂了新合約，其餘 4 人有些正在休假，有些計畫終止與學校的現有合約。

儀式包括歡迎即將上任的校監關慧賢，以及送別即將離任的校監白秋霞修女。杜瑪利已經將校長一職交給了沃為源先生，他是一位忠誠、有效率且經驗豐富的老師。資深職員的奉獻精神和忠誠度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把學生的利益和學校的未來都放在心上。

1998 年 6 月 8 日，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將瑪利曼中小學的辦學權移交給基督生活團。產權轉讓文件由麥潔妮修女和蘇艷美修女簽署。同時，曾在瑪利曼學校工作的修女們已轉移投入到中國內地和修會其他地方的職務。

第十章：結束——新的開始

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地位可以追溯到 1842 年，當時根據《南京條約》將其永久割讓給英國。1860 年，九龍半島在《北京條約》中同樣被割讓了，而 1898 年，英國獲得了新界這塊更大的土地的 99 年租約。

1997 年的問題始於英國與中國談判續租新界的問題，中國政府重申要收回對香港整個領土的主權。1982 至 83 年間，中英就香港的未來開始正式談判，中國政府認為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概念是最佳的解決方案，雙方在北京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兩國政府的代表分別是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中國總理趙紫陽。

《聯合聲明》規定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英國將香港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聲明》的基本方針政策規定於《基本法》內，寫入了中國國家法律。

此時（1988 年）高隆龐會修女面臨的重大現實是，到 1997 年，香港將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教會面臨的是它在《基本法》之下享有多大自主程度的問題。後者事實上表明天主教會擁有高度自治權。香港教會此時向內地提供了各種交流和援助，包括發展社會服務、應神學院和修院的要求教授神學和哲學、推動和更新禮儀改革等。

1988年對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來說是重要的一年。律敦治療養院已經結束，故而可以讓一些修女從事其他發展中的職務。翌年在中國發生的「六四事件」引發了嚴重的震盪。

紀愛恩修女（Sr. Ann Gray）在 1989 年 7 月 10 日寫道，提及她和樂易安、賴詠恩修女前一次寫信分享了她們的感受，也意識到了新的責任和關心的角色。她指出，這次無疑是中國悠久歷史上最悲傷的日子之一。

「這時候生活在香港是一個恩寵時刻，我們嘗試與人們同行，但並不容易，因為許多人想知道天主是否已經拋棄了他們。我和周圍的人都問過很多次：……為什麼要發生這種事？……如果他們中有人接受了基督信仰的洗禮，我知道他們實現了我一生中的偉大願望——實踐基督的話：『你們應當這樣行，為紀念我』。因祂的身體被破碎，他的血被傾流，使我們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政治事件發生後，香港許多中階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士都離開了香港。1984年《聯合聲明》後，每年離開香港的人數約在兩萬左右，到 1990 年，離港的人數上升至六萬二千人。

然而，傳教士對事情的看法卻不一樣。他們把重點放在1997年回歸前的剩餘時間上。修女們更意識到自己可以在牧職領域做更多的事情來培養平信徒領袖，也就是準備把學校交託給平信徒校長和教職員。高隆龐會修女希望到 1997 年，她們的兩所學校

都能由平信徒管理，並希望高隆龐精神在已有準備充分的教職員帶領下仍然蓬勃發展。

柴灣

八十年代中期，我們在柴灣徙置區建立了一個會院團體作為試點。白秋霞修女、賴詠恩修女和郭麗嘉修女被分配到那裡與窮人一起生活。賴詠恩修女繼續在律敦治療養院工作，郭麗嘉修女在梁式芝書院任教，白秋霞修女則在柴灣擔任堂區牧民工作。當原來的三位修女離開後，衛愛蓮修女和紀愛恩修女便加入維持這個團體——衛愛蓮修女在梁式芝書院任教，而紀愛恩修女則參與柴灣堂區工作。1992 年，柴灣會院解散，住所單位賣掉。

新事工

1986年，當律敦治療養院的工作開始結束時，在那裡工作的修女們考慮了其他需求和其他服務的可能性。到八十年代，癌症已成為香港的頭號殺手。由於過去幾十年，人口快速增長導致現有醫院設施嚴重擠迫，大多數癌症患者死於人滿為患的公立醫院，被隔離在病房的一角，沒有空間供親屬探望或停留。照顧這些病人的醫生和護士常常和他們的親屬一樣因無法應付垂死病人的需要而感到沮喪。所以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來緩解這種情況，這就是香港善終服務的開展。李潔靈修女和紀寶儀修女非常積極地參與發展今天已成為全香港性的善終服務計畫。

李潔靈修女是當時律敦治療養院的（1986年），而賴詠恩修女則在倫敦皇家馬斯登醫院（Royal Marsden Hospital）完成了腫瘤科課程，剛從英國回來，她們便在律敦治組建了一支善終服務團隊，希望隨著疾病的進展和患者症狀的加重，有人陪伴患者，有人有時間傾聽，以同理心回應當時醫院裡越來越多的末期患者。此時，曾在聖母醫院接受善終護理培訓的護士鍾淑子感受召叫，要為垂死的病人做些事情。

1985年6月，伊利沙白醫院臨床腫瘤科謝建泉醫生充分意識到這些患者的困境——其中許多病人是經他照顧的，他組織了第一次跨宗教團體會議，該會議促成了香港善終服務會的成立，成員包括李潔靈修女、紀寶儀修女，鍾淑子等。

善終服務會的總部設在律敦治療養院的一間小辦公室，由鍾淑子和另一位也接受過善終服務培訓的護士黎秀瞻負責打理。兩位護士都加入了律敦治的善終服務團隊，並參與募款活動和癌症晚期患者的家居護理。籌款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但來自「凱瑟克基金」及其傑出領導人之一葛露蓮（Caroline Courtauld）為這個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葛露蓮亦成為善終服務最大的捐助者、推動者和朋友。

1988年底，善終家居護理計畫啟動，李潔靈修女和黎秀瞻擔任全職護士，紀寶儀修女擔任兼職醫生，服務遍及港九新界。善終家居護理服務為人認識後，醫生就開始轉介病人，但隨著時間

的推移，病人明顯需要一所善終服務醫院，因此開始了現在的白普理寧養中心，於 1992 年正式啟用。

在白普理寧養中心任職的護士都接受過善終護理培訓。如果患者要平靜而有尊嚴地死去，疼痛和症狀控制對於良好的生活品質至關重要。這些是護理的重要概念，因此在善終服務的教學中，相信當生命無法增加日子時，就要增加日子的質素。此類服務包括和解、治癒過去的創傷及在需要時使家庭團聚。這種全人照顧是善終服務的本質，受過專業培訓的護士、輔導員、牧靈工作者和志工都為病人提供全人護理。

當時在職培訓成為當務之急，來自海外善終服務的醫生和護士專家對香港護士和醫生的培訓做出了重大貢獻，其中包括來自都柏林哈羅德十字郊區聖母臨終關懷醫院的彌額爾．卡尼醫生（Dr. Michael Kearney），他一直以自己的經驗與大家分享感人經歷。

生活在社會邊緣

1990 年 6 月，當時的總會長瑪利．加爾文修女（Sr. Marie Galvin）致信給會眾，內容包括對所有工作領域的建議。其中一項建議是邀請修女們特別思考在各自工作領域中婦女的需求，並設想一個能夠以某種方式滿足實際需求的合作計畫。她希望這樣的計畫能夠由一小群修女開展，最好與平信徒合作，以先知般的

行動，從而在實踐中為基督作見證。如果實現的話，就需要安排一些修女來參與這項合作計畫。

香港的修女做了研究發現，從事性工作的女性被社會可悲地忽視，這成為進一步關注的焦點。紀愛恩修女自願參加了這個計畫。她的啟迪來自聖高隆龐傳教會會祖若望．布洛威克神父的信念，即所有人都有權利知道天主愛他們。

在香港，她發現沒有人想認識從事性工作的女性或與她們接觸。她們被認為是最低等的人。一個團隊成立了，成員包括紀愛恩修女、年輕的美國婦女梅蘭妮．奧爾罕特（Melanie Orhant）和瑪利諾會文安理修女（Sr. Helene O'Sullivan, MM）。她們開始時什麼都沒有，沒有錢，沒有場地，沒有工作人員，也沒有此類事工的經驗。漸漸地，當人們知道她們的目的時，有志願機構為她們提供了免租場地和補助金。

由於這些婦女生活在社會的邊緣，我們的目標是在她們掙扎求存中陪伴她們，尊重她們，接受她們本來的樣子，從而與她們分享天主存在於她們中間的感覺。可悲的是，許多婦女被迫賣淫。來自泰國、菲律賓、孟加拉和斯里蘭卡農村地區的年輕女性及其家人很容易被有組織的招募人員訛稱可提供國外工作機會所吸引。大家意識到，這些陷入賣淫奴役的婦女需要一個庇護所，讓她們可以在返回自己家園之前暫時停留。這座避難所為婦女們提供輔導和情緒方面的支援，以幫助她們恢復尊嚴和自我價值。

自九十年代初以來，該組織由紀愛恩修女領導下的一個小團體發起，現已發展壯大，擁有 6 名全職成員、1 名醫護人員、1 名文書助理以及 30 名義工。

香港愛滋病毒/愛滋病服務計畫的發展

1990年初，香港《南華早報》發表了一封簡短的信，邀請社區內有興趣關注受愛滋病毒/愛滋病影響的人參與會議。第一次會議有七十多人參加。包括麥潔妮修女在內的二十人，他們自願聚集在一起，聽取一位本地專門研究愛滋病毒的醫生和一位曾在美國從事愛滋病毒/愛滋病工作的護士講解有關情況。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那些人成立了服務小組，繼續學習，並在義工家中設立了電話輔助熱線，這是「關懷愛滋」服務小組的開始。

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懷愛滋」的成員越來越意識到醫院在照顧患有這種疾病的人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愛滋病病人的家庭感到孤立，他們對這種疾病感到恐懼，害怕被別人知道，對這疾病的可能傳播方式也不大清楚。

透過家訪，護士能夠照顧病人、支持他們的家人，並教育他們有關感染的風險。這也為他們提供了許多機會來做公眾教育，讓大眾了解這種疾病的性質和可能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了解這些患者的需求以及所承受的痛苦。

在工作過程中，可以聽到許多關於無辜年輕人透過受污染的血液製品感染這種疾病令人心碎的故事。其中一個故事是兩名處於疾病晚期的 11 歲男孩的困境。麥潔妮修女在他們的家中照顧和護理他們，支持他們及其家人，深深地愛著他們。

該小組研究了一年，發現私家醫院和公立醫院都不願意接收已確診的愛滋病患者，所以他們決定唯一的辦法就是建立自己的設施。這些家庭願意並且渴望提供協助。幸運的是，政府提供了一座狀況良好的殖民時代舊房屋，稱為「瞭望台」，將其改造成愛滋病療養院。據麥潔妮修女說：「有很多人來幫忙翻修這大樓。有些人是因愛滋病而失去親人，有些是對愛滋病患者所遭受的歧視感到不滿的人，還有一些是關心有需要者的一般善心人士，他們提供了法律事務、建築設計等專業知識，購買醫療設備、床舖等。他們粉刷牆壁，幫助打理花園，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斷向香港所有感染愛滋病毒的人傳達這樣的信息：他們是被關心的。第一個接受服務的愛滋病人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工作者。他從未被疾病擊垮。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裡，完全失明，直到真正快要死亡的時候，才來到「瞭望台」。那時候，他已經無法欣賞和享受這個地方的美麗了，但他得到了所有工作人員的關愛，並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周裡享受瞭望台的平靜。瞭望台確實成為了許多需要愛、同情與和平安的人的燈塔。」

圖：大埔「瞭望台」2009 年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天行足跡」攝

由於多種原因，這個住宅設施被淘汰了，現在九龍的一個中心繼續提供家居護理服務。超過 100 名病人正在接受服務，其中包括越來越多的婦女和嬰兒。

特別事工

九十年代，在香港服務的修女，她們的主要職務包括不同形式的牧靈關懷：堂區工作、臨終關懷、監獄探訪、關心陷入困境的年輕人、探訪精神病院的婦女、夜間街頭的流鶯、有身心障礙的人士、愛滋病患者、教育（香港/內地）、為香港和內地搭建橋樑，以及宗教對話等等。

九十年代，蘇艷美修女在屯門堂區工作，這是高隆龐女修會在香港的最新發展；她是屯門堂區發起基層基督徒團體的領導者之一。屯門靠近中國大陸與香港的邊境，蘇修女的家人來自該地區。蘇修女是香港和內地教友之間的橋樑，她協助和陪同教友團體（包括老年人、家庭和青少年）訪問內地。結果，在 1997 年之前，許多人對在香港和在中國作為基督徒的意義有了更深的了解。

後來，當蘇修女回修會重發誓願時，賴詠恩修女和尹貞愛修女（Sr. Celina Yoon）來到屯門堂區工作。鄧敏、陳玉如和黎碧潔三位修女也在沙田堂區擔任醫院牧靈工作。這些修女為本地教會在新界區發展醫院牧靈的使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潘秀珠、樂易安和白秋霞三位修女也參與了香港其他地區的牧靈事工。

白碧哲修女與慈幼會青年外展團隊合作，設立設施，讓離家出走的青少年在參與犯罪、毒品、性和賣淫等三合會活動，和被警方抓獲之前，能及早勸他們離開犯罪的機會。

王修女曾接受過世界衛生組織贊助在香港進行的「引導式教育」訓練。身為世界衛生組織團隊的成員，她定期前往內地教授「引導式教育」課程並在當地建立設施。

羅志娜修女是扶康會的先驅工作人員之一，後來在九十年代轉往慈氏護養院為殘疾人士服務。當被要求定義她在那裡的使命時，她寫道：

我尋找我的主，我的主躲避我。

我尋找我的靈魂，但我看不見它，

我尋找我的姊妹和兄弟，

在他們身上，我卻三個都找到了。

Leonard Cheshire（萊昂納多・切希爾男爵）

早前，羅志娜修女曾在明愛醫院服務住院的殘障病人數年。萬美蘭修女跟隨聖神的光照，在離開律敦治後，在德蘭修女的仁愛之家為貧困者服務。來自中國江西南城的游德肋撒修女（暱親泰利）與因信仰在內地入獄數十年的弟弟游國傑神父仍保持聯絡，她偶爾會去看他。當被問及她在粉嶺及後來在秀茂坪和沙田教授英語輔導的工作時，她只是簡單地說：「我探訪窮人和獨居者，我讓自己成為向所有人傳播基督的愛的工具。當我教英語時，這讓我有機會跟人分享更深層的人生價值。我收獲的比我給予這些學生的更多，他們許多人都不是基督徒。」

胡雅麗修女在香港後期的歲月裡，成為了基督教聯合醫院的天主教牧靈工作者，做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會之間的橋樑。她特別關心這家醫院的智障兒童和末期病人。胡修女本能地將自己奉獻給這些牧職，並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家庭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中國

「國際教學教育課程協會」（AITECE）在香港成立，旨在幫助其他國家的基督徒協助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在教育、健康、社會和經濟福利領域。高隆龐會柯德華神父是創辦人之一，負責協助高隆龐會修女透過該協會進行中國教學計畫。

「國際教學教育課程協會」教師計畫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提供平台讓華人與非華人溝通、突破不信任和誤解。首批獲得該協會幫助申請往內地教學的修女包括何維珍修女、莫伊拉．道林修女（Sr. Moira Dowling）、高詩蘭修女和謝德華修女。

「國際教學教育課程協會」香港辦事處由柯德華神父和莫頌文神父（Fr. John MacGrath）領導，嚴美納修女負責秘書工作，而艾比．奧沙利文修女則負責編寫並向世界各地的高隆龐會發送有關中國的時事通訊 *WINDOWS*（窗戶）。奧沙利文修女後期在香港的中文學校任教。

柯德華神父有興趣在中國建立「國際教學教育課程協會」編織計畫。其目的是幫助修女團體和其他人實現自給自足。他邀請了在韓國建立此類計畫擁有豐富經驗的高隆龐會修女羅莎莉（Sr. Rosarii McTigue）參觀了武漢、南京和梅縣的不同中心，並為其發展提供建議。羅莎莉修女訪問這些中心對於與基督徒團體建立良好關係非常有用。

香港高隆龐修女的故事是一個時代巨大轉變的故事。五十多年來，逾五十位修女在這個不斷變化的時代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中國的動盪、梵蒂岡大公會議的挑戰、新時代使命的召喚，都在敦促高隆龐會修女透過更深刻的辨別，用新的形式去表達上主的神恩。她們人數雖少，但希望不減，今天繼續回應基督的召喚，以愛和慈悲向中國和香港人民伸出援手。

潘鬘（May Holdsworth）和葛露蓮在 2002 年出版的 *Foreign Devils –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鬼佬——香港的僑居者）一書中寫道：「即使結核病不再是香港的威脅，那些臨床先驅——高隆龐會修女的影響力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她們今天正向吸毒者、愛滋病患者、娼妓和垂死者伸出援手。這樣做，她們堅持了古老的傳教士傳統，即確定需要、啟動補救計畫、提高公眾意識、讓社會人士和政府機構參與其中，以及最終，把自己的痕跡抹去的一貫傳統。」

第二部分——訪問

服務・友情・追憶

我已完成了一圈高隆龐會傳教之旅了！

撰文：李潔靈修女（Sr. Mary Greaney, SCC）

翻譯：張小蘭

我出生於愛爾蘭西部一個農民家庭，是五個孩子中的老大。當我進入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時，我已經 29 歲了，所以我的聖召被稱為「晚期聖召」！

我是家鄉教區聖母軍的活動團員。我每周的聖母軍使徒外展工作是為「流浪兒童」（Traveller Children）準備初領聖體和領堅振。

「流浪家庭」（Traveller families）非常貧窮，無家可歸，居無定所。他們住在路邊的帆布小屋裡。我們中的兩名團員每周都會探訪他們，並教導他們的孩子。

正是在我做外展工作的時候，我第一次體驗到天主的召叫，讓我跟隨祂，成為傳教士。當耶穌召叫我們跟隨祂時，祂非常堅持，不會接受「不」作為對祂邀請的回應。所以，我祈禱、分辨了整整一年。然後，祂的召叫變得非常清晰。

高隆龐會神父的修院當時就在我們那一區，我知道他們是傳教士。我們過往都收到高隆龐會修女的雜誌，所以我也知道她們是一個傳教團體。這一切都使我成為高隆龐會修女的回應變得具體。1962年，我進入高隆龐女修會在威克洛的初學院。我們十七人當中，以我最為年長。

在我宣發初願後，我選擇成為護士，因為我一直對成為護士和照顧病人感興趣。我被送到倫敦學習護理。完成一般護理課程後，我被要求到倫敦市中心的布朗普頓醫院（Brompton Hospital）攻讀研究生課程，為我前來香港律敦治療養院的工作做好準備。

1971年7月，我抵達香港，第一次感受到炎熱和潮濕的文化衝擊。我們沒有空調或電風扇，晚上必須用蚊帳罩住我的床舖時——另一個巨大的挑戰！

結核病在香港很猖獗，當時律敦治療養院護士短缺，我便立即開始在病房工作。我被分配到兒童病房。我很驚訝地看到這麼多各個年齡層的病人，包括滿是孩子的病房。他們都來自低收入群體，非常貧困，主要來自社會邊緣。我們還有很多來自大陸的難民。我們非常幸運能夠獲得治療結核病的所有現代藥物。

我們的兩位高隆龐會修女醫生——區貴雅修女（Sr. Mary Aquinas Monahan, 1919-1985）和紀寶儀修女（Sr. Gabriel O'Mahony, 1921-2006）積極參與研究和藥物試驗，並與倫敦醫學研究委員會有聯繫。正是因為這一切，結核病在香港受到了控制。結核病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疾病，經常洗手非常重要。當時很少使用口罩，只有在特殊程序才配戴。透過多年來的工作和與患者的接觸，我們產生了對結核病的抗體，交叉感染很少，而良好的營養和良好的衛生環境是關鍵。

圖：李潔靈修女為了照顧好病人的需要，努力學習中文與他們溝通。

剛開始到律敦治工作時，我最大的挑戰是不懂廣東話。我覺得很沮喪，所以開始工作兩個月之後，我請了學習假去學中文。這對我的護理工作產生了很大的轉變！病人很欣賞我努力地用廣東話與他們溝通，並在我遇到困難時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當我用錯聲調時，他們有時會微笑，因為廣東話有九個聲調！

我與患者和員工的關係非常好。我們擁有一支優秀的員工團隊，具有高度的關懷、合作和團隊精神。

我仍然與我們原來的一些職員及我照顧過的一些病人家屬保持聯繫。我總是說：「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

當我來到律敦治時，療養院有十四位修女在工作。福傳是透過我們對窮人和邊緣人士，特別是慢性病患者的關懷和服務的生活見證來完成的。有時，當我照顧病情嚴重的病人時，我常常告訴他們，我會為他們祈禱。很多時候他們會指著我配戴的十字苦像說：

「那是耶穌」

他們這句話一直讓我感到驚訝。

我認識聖母軍的愛爾蘭創辦人杜輝（Frank Duff），我在香港時，他與我保持聯繫。他對香港聖母軍的興趣、支持和讚賞，十分令人鼓舞。

我們有兩個聖母軍支團，每周在律敦治聚會，一個是廣東話支團和一個是英文支團。

我是該英語支團及另一個在公教進行社的支團的神師。因此，我會參與他們每周的會議，以及他們的一些外展工作。這些參與為我的生命帶來了許多祝福，也為我開啟了許多新的視野。它也加深了我的個人信仰。七十年代，我們每周都會探訪啟德難民營的「越南船民」，這是人生的一個難忘經歷。

1985年，區貴雅修女去世。失去了她給我們律敦治團隊留下了很大的缺口。在離開律敦治之前，我已擔任護理總監八年。正是在這段時間裡，香港的結核病已基本受到控制。因此，政府醫務衛生署開始研究終止律敦治結核病服務的可能性。這座建築非常老舊。他們計畫把它拆卸，在原址建造一座新的大型綜合醫院，包括有治療結核病的病房。

正是在這個階段，我們高隆龐會的修女準備遷離律敦治療養院。不用說，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轉變時期。

作為高隆龐會傳教士，我們的座右銘是「常常回應最大的需求」，尤其是尚未完全滿足的需求。因此，紀寶儀修女和我做了一些研究，經過祈禱和分辨，探索在安寧護理和臨終關懷的需要方面做更多事情的可能性，成為了我們下一個傳教使命。癌症在香港非常普遍，儘管有兩家醫院設有安寧護理床位，但它們沒有家庭護理服務，也沒有為癌症末期患者提供獨立的臨終關懷服務。

因此，在 1986 年，當我還是律敦治的護理總監時，我在醫務總監紀寶儀修女的支持和幫助下，在律敦治內成立了安寧護理團隊。這個團隊是跨部門的，其目標是對晚期癌症患者進行整體的護理，非常重視疼痛和症狀控制，同時照顧患者的心理、社會和靈性需求。

安寧護理團隊由醫生 Mark、護士長 Amy、助理護士 Joyce、牧靈關懷的賴詠恩修女（Sr. Anne Ryan）及兼職物理治療師

Shella 組成。所有人本來都已經在療養院工作。在那段時間，紀寶儀修女和我也邀請了一群有興趣的專業人士加入我們的小組，討論並幫助我們採取下一步行動，希望使我們的夢想成為現實。這個團體形成了後來的「善寧會」的核心。

小組最初由紀修女、劉勝義神父（Fr. John Russell, S.J.）、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鼎新牧師、瑪利諾會丹尼爾．若瑟修女（Sr. Daniel Joseph Pardini, MM），後來改由瑪利諾會祁愛蘭修女（Sr. Helen Kenny, MM）取代；伊利沙伯醫院放射治療部顧問謝建泉醫生、義務工作發展局的基督徒劉悅鴻、安寧護理護士鍾淑子和我——李潔靈修女。

善寧會獲通過後，我們註冊為慈善組織。鍾淑子是一位非常敬業的安寧護理護士，剛從英國安寧護理學習歸來，她的夢想和希望是與香港的同僚分享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以制定整體的護理路向。

因此，我們向凱瑟克基金申請資金，僱用鍾淑子來推進我們的計畫。我們的申請獲得了批准。由於我們還沒有辦公地點，所以在律敦治騰空一個小房間作為鍾淑子的第一個辦公室。她非常熱情，為推廣我們的計畫及使我們的夢想成真做了很多工作。事實上，我們的計畫真正始於律敦治。

我們的座右銘是，當我們「無法增加生命的日子（量）時，就要提升餘下生命的質」。我們的計畫進展得如此之快，一直

讓我感到驚訝。我們於 1988 年成立家居護理團隊，當時只有兩名護士，即黎秀瞻和我自己；幾年後，我們的團隊已增加至十二名護士，涵蓋港島、九龍和新界。

1992 年，白普理寧養中心在沙田正式啟用，設有 26 張住院床位，實現了我們最初的夢想。鍾淑子成為首任護理總監，（原於律敦治療養院任職的）沈茂光醫生成為醫務總監。我們所有參與照顧病患的人，都接受過特殊的安寧護理和臨終關懷訓練。對於我們在家庭護理工作的人來說，得到白普理寧養中心的支持是一個巨大的祝福，這使我們的病人可以在至愛的陪伴下，在照護和安寧中結束他們的日子。我始終深深感謝天主和我們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好人，他們在不同方面幫助我們實現目標。

財務方面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我們面對的最大挑戰，但透過香港和英國一些慈善信託團體的慷慨捐贈，我們實現了最初的夢想——沒有他們，我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1995年，香港醫院管理局接管了白普理寧養中心的運營，這是一個額外的好處。因此，安寧護理和臨終關懷現在成為香港醫療保健系統的一部分，而白普理寧養中心在國際上得到認可。香港許多醫院如今都設有專門的安寧護理單位，包括律敦治醫院。

在律敦治工作了十七年，在臨終關懷方面工作了十八年後，我於 2006 年離開香港，返回愛爾蘭，休了一年假。那一年，我祈禱並辨別在我傳教旅程的最後階段，天主會召喚我去哪裡？

我知道愛爾蘭現在已經成為傳教區——一個與 1971 年截然不同的愛爾蘭!

我最後的一份召叫，是由我再次加入聖母軍開始，我認為這對我人生的這個階段已足矣。但天主卻另有想法!

我獲邀參與都柏林的華人團體，因為這裡有很多華人，其中一些來自香港，但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還有一批中國天主教神父在這裡學習。

經過研究及與部分人對話後，我對他們的反應感到驚訝。他們非常渴望在愛爾蘭，特別是在都柏林建立華人團體。在與天主教都柏林總教區接觸後，我獲得了許可和支持的保證，如果需要這種類型的外展活動，我可以考慮設立華人天主教專職服務。在與一些年輕華人神父和平信徒（其中許多是學生）對話後，他們很高興成為這個華人外展團體的一部分。

這清楚地提醒我，我們高隆龐會傳教士再次做出了回應，滿足了本地社區的需求，我很高興能與華人一起參與。

都柏林總教區的興趣和支持，遠遠超出了我的最大期望。唯一的規定是，我必須找一位華人神父當專職司鐸來照顧這個團體。經過一番商議，我很幸運地找到了一位在這裡完成學業並有興趣參與其中的華人神父，只要他在中國的主教批准其請求即可。安多尼神父（Fr. Anthony）得到了其主教的許可，便獲

正式任命為專職司鐸來照顧這個羽翼未豐的團體。華人天主教團體在這裡現在已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也很好地融入了都柏林總教區，並受到高度讚賞。

該項目在過去十五年裡取得了顯著的發展。我們最初只有一個小團體，現在已經發展到有數百人了！

圖：都柏林的華人天主教團體

許多人完成學業後留下來並在這裡結婚。現在看到社區裡有這麼多孩子，真是奇妙。對我來說，最令我感動的是，過去十五年來不少人表達成為天主教徒的願望，參加了我們的「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課程。

我們很幸運有一位非常投入和全心奉獻的專職司鐸，他努力不懈地接觸社區。他在本地交通便利的市中心教堂開華語彌撒，

而他的住宿和牧職的所有輔助設施都在教堂隔壁，全部由總教區提供！所以，華人在這裡真的找到了一個家，並且非常感恩這一切的祝福。天主真的回報了我們的努力。每年都有年輕華人受洗，華人團體為這裡的教會和教區帶來了新的生命。

我們的高隆龐會會祖布洛威克神父（Fr. John Blowick）早年曾提醒我們：「永遠記住，這是天主的化工，不是你的或我的。」

所以，兩年前，我終於退休回到我們修會在威克洛的母院，享受這個地方的美麗、和睦與安靜。回顧過去五十年的傳教歷程，我心中充滿感激。我感謝天主賜給我這麼多的祝福，也感謝那些優秀的中國人民和其他一路走來影響我的生命的人。你們是我的全部，經常銘記在我的思憶和祈禱中。如果不承認參與聖母軍是我一生的偉大禮物，我是無法擱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賦予生命的經歷！

我的人生已經完成一圈了！

我現在已回到了我開始高隆龐會傳教之旅的地方，我讚美天主在我所有傳教工作中的關愛和陪伴。

因肺病與高隆龐修女結緣

編按：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恩保德神父於 2023 年 6 月 11 日逝世。以下口述歷史乃恩神父於 2023 年 2 月 20 日接受本中心關於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研究計畫訪問的部分內容。訪問以粵語進行，由於內容提及他當年患上肺病而認識到律敦治醫院和聖高隆龐會的修女，本中心決定整理相關部分，納入本書。

受訪者：恩保德神父

（Fr.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1934-2023）

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肺病這一點我很熟悉，可以講講。肺癆是殺手病中的第一，每日都死人，好像小鳥那樣死。我試過有一次，那時候是我去鑽石山

之前，我踩著單車，忽然間我發覺右肺好像不能呼吸。[1] 我住進了一家教會醫院。醫生跟我說：「對不起，你右肺沒有了功能，X 光整個黑沉沉，恐怕你是第三期肺癆。請你離開香港，回去你的國家，可能會康復。」這個消息令我不捨得香港，但是病得很辛苦。在醫院裡，有一個下午我躺在床上，我記得一些修女拿着念珠祈禱，之後把念珠放在我身上，然後灑聖水，表示關心。有一位愛爾蘭修女，我不認識的，走近看着我，問：「你在這裡做什麼？」我回答：「醫生說我是第三期。」我當時不知道她叫做 Sister Gabriel[2]，我從沒見過她，原來她很出名。她是肺癆專家，Number One，在香港大學教書，她服務的醫院是律敦治醫院。她看着我說：「如果這個醫生是我的學生，一定不合格。」她給了我很多信心，為什麼呢？我解釋一下。修女說：「你跟我離開這兒，跟我。」我立刻通知醫院的修女：「我走啦！跟這個醫生。」她〔Sister Gabriel〕立刻帶我去律敦治，她已經安排了。

我到了律敦治，便進了手術室，一位醫生是專家，「摸吓，摸吓」便說：「你的肺沒有事。你的肺是穿了一個小孔，不是

[1] 恩保德神父 1958 年晉鐸，同年來港，1970-1974 年在鑽石山聖則濟利亞堂區擔任副本堂，此前在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1959-1968）及香港仔明愛社會服務中心（1969）服務。

[2] 紀寶儀修女（Sr. M. Gabriel O'Mahony）。更多她的生平事蹟，請參閱本書其他章節。

因為肺癆。」原來是這樣。「因為肺的周圍有很多氣，有氣〔壓迫〕令肺部不能擴張，現在我放一條喉管在〔有〕氣的地方，這部機〔儀器〕會把氣抽走。你不要動，肺部會慢慢漲起來，那個孔會自動癒合。」過了一段時間，病好了。沒有肺癆，之前那個醫生真的不合格。那時候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因為我和這位修女相熟了，第二年又再發生〔肺部不適〕，我立刻踩單車去找她。那時候她自己拿着工具〔為我治理〕，也治好了。然後她說：「你要時不時回來找我」，所以我很熟悉肺癆病。後來我知道修女團體是來自愛爾蘭，兩個修女是專家，其他幾個護士，都是一流的。她們有一個醫療團體，特別針對香港的肺癆病，沒有第二，她們是第一。因為其他地方沒有這麼多〔肺癆病人〕，很多藥廠送一些藥給修女，她知道哪一種藥值得使用。……這位修女晚上很晚她仍然為病人在照肺，她想很多方法來治療肺癆病人。

過了幾年，她跟我說：“Father, I put myself out of job.”（我搞到自己失業了）。她真的控制了肺癆。我很不開心，因為我認識很多醫生都是她的學生，香港應該要有一些表示，要感恩。我覺得這個修女控制了肺癆，後來的很多醫生都是她教導的。還有一次，她請我：「明天我有一個學生在這裡實習，〔病人〕的肺部和你一樣，你來看看〔我們是怎樣治療〕。」她讓我去看。

律敦治療養院員工緬懷舊事

編按：香港在二十世紀初期已面對持續增長的人口，但當時人們普遍貧窮，居住環境擠迫，營養欠佳，導致肺癆蔓延。五六十年代因大量難民的湧入，公共醫療不堪負荷，情況更為猖獗，是人們聞之色變的高死亡率病症。直至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醫藥進步，才真正把這個影響了香港幾十年的傳染病遏止。這成果不得不歸功於管理律敦治療養院的高隆龐會醫護修女及一眾員工的努力。本篇除了三位受訪者憶述與高隆龐會修女在工作中的互動，對修女們的印象，我們更可從她們的工作點滴中了解到結核病對病人的嚴重影響，以及作為醫護人員的辛勞。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本文僅以她們的英文名字標示。

受訪者：

護士長秘書 Eileen
負責醫院行政工作，在職年份：1957-1998

護士 Teresa
曾於消毒房及手術室服務，在職年份：1968-1986

護士 Lisi

曾於門診部服務，在職年份：1974-2017

訪問日期：2024 年 3 月 25 日

加入律敦治療養院的大家庭

Eileen：我和同學畢業後想找工作，便申請東華三院的護士課程。那時是暑假，院方因為考慮到學生可能會繼續升學，未必真的去讀，所以只讓我們登記，要我們 9 月份後再去。當時律敦治療養院也招人，我們便嘗試申請。入職後，我兩個同學再考東華三院，我就留在律敦治，因為這裡的上司好，工作也很好，沒想過要轉工。

我可說是新院[1]的「開荒牛」。我是在寫字樓工作，擔任護士長秘書，第一位服務的護士長是 Sr. de Chantal[2]。當時每個病房由一位修女負責，管理四五位護士。修女們來到香港後要立刻投入服務，沒有時間學習中文，護士長便帶着我去工作，幫助她翻譯傳話，但我也只是懂得一點點。那時候的工作壓力不會太大，因為有甚麼事都由護士長「頂住」，我只是按指示做。反而，我後來轉到其他行政部門工作，那時候壓力才大。

[1] 新院是指後來納入醫院管理局之下的社區醫院「律敦治醫院」。

[2] 梵二會議（1963-65 年）之前的修會多數會為新加入者另起新名，梵二之後大多已取消相關做法。Sr. de Chantal Daly（迪尚塔爾・戴利修女），本名為 Sr. Frances Daly（芳濟・戴利）。迪尚塔爾修女於 1932 年 18 歲加入高隆龐會，1942 年發初願，1946 年以護士身份到中國服務，其後在律敦治療養院服務十年，再到菲律賓工作二十年，直至 1970 年代末因身體虛弱回愛爾蘭休養，於 2013 年逝世。

Lisi：我則是「最後的太監」，即由律敦治護士學校培訓出來而最後一個離開律敦治醫院的護士。我中三畢業後想做護士，曾經投考聖母醫院護士課程，因為年紀太少，院方勸我繼續讀書。我中五畢業後，有同學已在律敦治做護士學生，她問我會否去律敦治工作，於是我便申請，並且被取錄了，當時是 1974 年。

因為 BTTA（The British Thoracic and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英國結核病和胸肺部疾病協會）初期取錄學生不限年紀，後期才有限制。我 17 歲便已入職，現在的制度是 18 歲才可以入讀。入職讀書，有宿舍和膳食提供。第一份薪水只有二十多港元，放在信封以現金發放。最初上班要買白鞋也要向媽媽要錢。

圖：嚴美納修女（Sr. Roberta Remillard）為畢業護士扣上 BTTA 徽章，左後方為華人導師羅姑娘，右後方為院長區貴雅修女

Lisi：律敦治招人沒有分文科或理科的，因為我們修讀的不是香港的課程，而是英國的，是屬於 BTTA 的專科，考試卷全是英文，並會送去英國批改的。如果你問我的英文程度怎麼樣，我會說「係唔得嘅」。入職面試見修女時需要用英文，修女很好，把話放慢來說，我講單字回答，修女也明白我的意思。

學習期間，我們的老師 Sr. Martin[3] 是用英文教的。有一次測驗成績不理想，她叫我去找她，當時我很害怕被責罵。但原來她是問我：「你成績為什麼這麼差？是不是同房的同學『嘈住』你，妨礙你讀書？」她很細心的。雖然我覺得她有點惡，但對我們很好，教學很有方法。

媽媽十分贊同我做護士，因為之前我姐姐生了一場大病，發高燒，進了廣華醫院。醫院的人讓姊姊躺在病床上，沒有穿衣服，只用毛巾蓋着，用風扇吹着她。當時我們不知道這是降溫，心裡想「為什麼會這樣？」可能是這個原因，媽媽覺得做護士會多一些知識，所以鼓勵我去做。

[3] Sr. Mary Martin（瑪利．馬丁修女），本名 Sr. Maureen Herbert（莫琳．赫伯特修女），律敦治的職員都稱呼她為 Sr. Martin。她原在漢陽任職護士，於 1949 年被調派至律敦治療養院，是 1953 年成立的天主教護士會重要推手，也曾是聖母軍「雙支團」的神師，雙支團是高隆龐修女首創，以方便輪值的醫療人員參加。她於 1955 年回愛爾蘭進修護士導師資格，回港後出任過律敦治療養院護士長和護士學校導師，以及明愛醫院護士學校導師。

Teresa：我是1968年入職，之前曾經去伊利沙伯醫院投考護士但失敗了。剛巧從親戚那裡知道律敦治招聘護士學生，我便投考，面試後獲取錄。伊利沙伯和律敦治兩者的考試差別很大。在伊利沙伯醫院面試時，好像電視劇一樣，會有很多面試人員問你：「為什麼要做護士？護士需要做什麼？」那時剛剛畢業，不知道護士工作的詳情，只知道跟着醫生照顧病人。在律敦治面試時，只需要見護士長修女。因為我那時還不是BTTA，只是BTA, The British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招聘沒那麼嚴格。[4]

律敦治的護士學校每年收生兩班，七月一班，十月一班，都是修女教導我們，沒有外來老師。我入讀十月那一班，頭三個月我們叫做 PTS，pre-training student（受訓前學生），是試用期，薪金很低，純粹在學校讀書，不會「出病房」。三個月後才會出病房工作，之後又回學校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又去病房工作，輪流更替。這課程為期兩年半到三年，視乎什麼時候入讀。當時每班有十多人，但不是所有人都完成課程，像我那一班只有

[4] 英國結核病和胸肺部疾病協會（The British Thoracic and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BTTA）曾經歷過幾個階段的演變和更名。1945 年，本身亦是由幾個相關組織於 1928 年合併成單一專業組織的「結核病協會」進行改革，更名為「英國結核病協會」（The British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BTA），新協會於 1968 年又與「結核病聯合委員會」合併，改稱「英國結核病和胸肺部疾病協會」（BTTA），其後再經歷變更，現稱為「英國胸肺疾病學會」（British Thoracic Society）。

七八個人畢業。因為那時是療養院時代，人不是很多，人事不複雜，大家住在宿舍，就像是一個家，日子過得很開心。修女很友善，事事親力親為，常常接觸病人與他們談話，所以她們很容易學懂廣東話。

高危工作的防護

Lisi：當時肺癆很厲害，家裡人「唔驚就假」！以前我剪短頭髮，下班洗頭沖涼後才回家或回自己的房間。修女們很注重我們的身體健康，宿舍提供的膳食很好，高蛋白質，營養充足；加上有舍監十點半就來拍門提醒我們關燈睡覺。舍監鎖門後要把宿舍鑰匙交回醫院，如果路過看見有人仍未關燈，會再拍門提醒。

Eileen：宿舍十點就關門，十點半就要關燈，早睡早起。當時年紀輕，還未結婚，便住宿舍，結婚後才外宿。住宿舍時，如果你第二天休假，前一個晚上就可以回家；如果是放假後上班，就要前一晚上十點前回宿舍。我是做寫字樓，上班是固定星期一至六。

Lisa：我們護士是輪更工作，一天早、午、晚三更。在上課期間，我們也是住在醫院宿舍，星期五晚可以回家，到了星期日晚上就要回宿舍。我回家前一定清潔梳洗，我妹妹說：「你連帶回來的一張紙也有『醫院味』。」以前年代的消毒藥水氣味濃烈，坐車時也曾有人問我是不是在醫院工作。我習慣了那氣味，但妹妹很敏感。

修女的嚴格要求

Teresa：修女的培訓很嚴格，但有規有矩。不准留指甲，頭髮長度也不能接觸衣領，裙的長度要遮蓋膝蓋。我們的培訓強調向南丁格爾學習，十分嚴謹。

圖：修女嚴格的要求訓練出專業的護士

Lisi：我們用布口罩要打結，經常會扯到頭髮，修女看見就會提醒我們把頭髮弄好。她們提醒我們注重外觀，讓我們覺得自己很專業。有一次，有導師經過病房，看見我靠在牆邊歇息。她走回頭跟我說：「Lisi，你不要 idling（閒散），你要隨時預備工作。」她是好意，也說得對，這樣的站姿確實沒有儀態。

以前我們很注重專業外觀，像穿戴耳環不能太大，戒指只能是結婚戒指，不戴手錶，只用陀錶，不留長指甲，因為我們要為病人做 bed treatment，即幫助病人轉身防止生褥瘡，以及為他們按摩使血液循環等。我們整理床單時要拉得很直，因為稍有曲摺，病人可能會紅腫、爛肉，所以我們很着重這些細節。如果有東西掉下，會令病人的皮膚受損。以前的護理相當好，很重視「落手落腳做」（親力親為）。

療養院工作點滴

圖：三層高的新翼有天橋與舊翼連接，早年是試新藥的病房，病人的精神一般比較好

Eileen：律敦治療養院前身是陸軍醫院，我入職時已經很舊了，沒有裝修。我記得很多人排隊打卡介苗，初期病床數目大約 200 張，傅麗儀療養院那邊大約有 100 張。那時還未有護士學校，三層高的新翼是後期才加建的。

Teresa：我入職時已有第二代新藥物。第一期的舊藥每天需要服食十六粒，很大粒的。如果不能一次服用那麼多，就早上服食八粒，晚上服食八粒，很辛苦的，還要打針。所以早期的病人不肯服藥，變得有抗藥性，要強迫他們服藥，直至痰涎病菌減少，情況穩定後才轉往傅麗儀療養院，再住一段時間，確保已經痊癒才能出院；而律敦治則繼續接收急症、新症。

Lisi：我們醫院接收的肺癆病人大多是低下階層，營養不好，又沒有胃口，比較瘦弱，所以打針時聽到「喀」一聲，即代表打到他的骨頭。對病人來說，吃這麼多藥是很辛苦的。後來轉了新藥，情況好了一點點。不過，就算打針也要打好幾個月。

我在門診部的年代，工作就好像對面堅尼地道灣仔胸肺科一樣，會有病人來打針吃藥，只是來律敦治打針的多是出了院的病人，方便我們跟進。當時也有香港大學學生來接種卡介苗，那時已是服務的尾聲了。門診部除了為病人打針派藥，還要處理街症，即接受新症和複診，安排照 X 光，當然不像現在的設施，可以立刻「沖晒」（菲林顯影）出來。初期大部分醫生是外籍人士，他們來香港是學習如何醫治肺癆病人。他們會來處理街症，然後去病房醫治病人。他們講英文，我們就用盡我們有限的英文為他們做翻譯，診症施葯。此外，病人出院後，門診部也會電話跟進他們的狀況。

門診部當時是在現今防癆會的大樓內，如果病人要抽血，需要走一條斜路去療養院那邊。正常人走這段路只是三數分鐘，但肺癆病人通常肺功能很差，走斜路會很辛苦，醫院就讓我們跟化驗室同事學習抽血，獲得證書後，我們就可以為門診病人抽血。門診部隔壁有一個小藥房，方便病人取藥。有一次有病人看門診後需要入院，我們致電醫院，要求安排院車接他入院，但剛好沒有車，門診醫生便用自己的車送病人入院。以前的設備惡劣，但有人情味，工作沒有那麼計較。

圖：門診部（黃線大樓）到療養院（橙線大樓）距離雖近，但需繞行走上斜坡，為肺癆病人來說非常艱難

Lisi: Sister Aidan[5] 負責門診部時，那個年代沒有嚴格規定只有醫生才能處方藥物，如果有病人來向她描述病情，修女會給予簡單的藥物。以前門診部護士要負責很多工作，例如我們要儲存所有 X 光片、門診部的病人排版，要做很多存檔工作。我們還要負責登記，找出病人排版，放在醫生枱面，「一腳踢」。

特別是越南船民來港那段時期[6]，很多船民有肺癆。肺癆病人要在醫院接受治療，直至康復才可出院，不像現在可以服藥，不用住院。在房病工作的時候，病人服藥後，我們會要求他們張開口，讓我們看看是否真的已經吞服。最厭惡的工作是每天要檢查病人痰液量。我們每天要蒐集病人吐出來的痰，檢查發炎程度，由兩個人一起做，一位負責檢查，一位負責記錄；不過現在的做法已截然不同了。還有一些失傳的做法，例如幫助病人躺在

[5] 萬美蘭修女（Sr. Aidan Myrane，又名 Sr. Ada Myrane），1941 年加入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1947 年發初願後接受護士培訓，1951 年派到律敦治療養院服務，但不久便染上惡疾，離港接受長時間治療，康復後於 1960 年再度回到律敦治，開始長達二十七年的服務，期間擔任病房修女及門診部主管。修會撤出律敦治後，她到仁愛傳教女修會的仁愛之家照顧老弱病患，直至 1999 年回愛爾蘭安度餘年，於 2012 年逝世。

[6] 香港越南船民問題，始於 1975 年首批船民隨貨輪到港，全數得到政府收容，自此不斷有船民湧入，港府至 1988 年設立「甄別政策」，分辨難民及船民身份。在香港主權回歸前，港府先後實施「自願遣返」及「強制遣返」政策，以解決船民問題。直至 2000 年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香港共接收超過二十萬名船民。

床上洗頭。有些病人長年臥床，以前沒有推車推病人到浴室，全靠人手搬抬，我們的腰骨承受不了，所以會幫病人在床上抹身、洗頭；我們將病床床褥拱起，讓病人頭向下，就可以洗頭了。

與修女平起平坐，但關係親切

Teresa：以前所有病床護理工作都是我們護士親手做的，「amah」（雜役，現稱醫護支援人員）只會負責廚房工作、清潔洗手間，不會處理病人。每天早上我們給病人送早餐後，要清潔病床和床頭櫃，然後幫病人洗澡，修女們也和我們護士一起做，沒有分別。

Lisi：我們會去其他醫院學習，我去的那間醫院，他們的階級分得「好緊要」。吃飯時，這張枱是醫生的，那一張是護理主任的，你不能坐；你只能跟學生一起坐。下午茶安排也是一樣。如果工作繁忙，你可能就沒有下午茶了。

Teresa：我們會為修女「改花名」（暱稱），例如 Sr Aquinas [7] 叫「大醫生」，Sr. Gabriel [8]，我們叫她「阿基」。

[7] 區貴雅修女（Sr. M. Aquinas Monahan，亦稱亞規納、區桂雅），高隆龐會派來的醫生修女之一，是律敦治療養院首任院長，亦可說是該院的靈魂人物。更多區修女的生平，請參閱本書其他章節。

[8] 紀寶儀修女（Sr. M. Gabriel O'Mahony），高隆龐會派來的另一位醫生修女，原為律敦治療養院副院長，與區貴雅修女合作無間，區修女逝世後，紀修女成為第二任院長。更多紀修女的生平，請參閱本書其他章節。

Teresa: Sr. Damien [9]，我們叫她做「婆仔」。我入職時她是護士長，但正在休長假，緣慳一面。後來是 Sr. Maureen Byrne [10]，起初是署任，後來正式做了護士長。至於 Sr. Ann Salmon [11]，我們叫她「美人」，因為她真的很漂亮。還有，我們叫 Sister Mary Martin「阿嫲」，因為她真是一個「婆仔」，年紀最長，性格內向，不善交際。我們把 Sister Fintan 叫作「賴得潔」 [12]。修女們都很友善，很少看見她們發脾氣。

我 1971 年畢業。第二年，負責消毒房和手術室的 Sr. Fintan 因為有同事準備升職要離開，問我要不要到她的部門工作。當時

[9] Sr. Damien Rooney（鄧敏修女），1940 年 19 歲加入高隆龐會，選擇成為護士幫助窮困家庭。她於 1926 年到漢陽，在一間有五十張病床的醫院門診部工作。她離開湖北抵達香港後，在律敦治療養院服務了二十七年，直至 1989 年到英國協助培育新修女。她於 2016 年在愛爾蘭逝世。

[10] 據修會網頁，Sr. Maureen Byrne 現亦稱 Sr. Immaculata，她未滿 17 歲便加入了高隆龐會，受護理學培訓後便到律敦治療養院工作，並擔任護理導師，工餘亦擔任聖母軍神師，至 1970 年代調派到倫敦服務，於 2019 年逝世。

[11] 沙娜雯修女，曾任律敦治療養院護士長，亦曾於同樣是高隆龐會管理的大口環兒童骨科醫院服務。

[12] Sr. M. Fintan Ryan（黎碧潔修女），早期稱為「賴修女」，因修會已有幾位「賴」姓修女，故改以「黎」為姓氏。黎修女加入修會後，接受護士及助產士資格的培訓，畢業時在受訓的醫院獲得「年度助產士」的殊榮。她於 1962 年起程前往東方，原本短暫停留香港，卻因拿不到前往緬甸的簽證，最後一直逗留在港，成為律敦治的病房修女，負責過兒童病房和手術室，之後到打鼓嶺聖若瑟診所工作，直至被調派到沙田威爾斯醫院從事牧靈工作。

我年輕，想多學習，便答應了。平日如果沒有手術，我們就在消毒房工作。有一次，她跑進消毒房喊“Edward，Edward”，因為不是叫我們，我們便繼續工作。她在房裡走了一圈，見沒有人理會她，回過頭來問我們：「為什麼你們沒有人理會我？沒有人問我，誰是 Edward？」原來她在找一位男工友，我們平常用中文名稱呼他，不知道他有英文名字，我們便回答說都不知道誰是 Edward。這時那位男工友才站出來說：「我在這裡」。很搞笑。修女不擺架子，沒有隔膜，和她們一起工作真的很開心。

Lisi：阿嫲，即 Sr. Martin，上課時很有威嚴，學生坐下後就不能走來走去，上課時外套也不能又穿又脫騷擾到別人。她上課和外出是兩副模樣，很不同的。我們做學生時，有外出郊遊的活動，但沒有人敢和她聊天，邀請她外出。華人導師羅姑娘看到，便要求我們每人輪流和 Sr. Martin 聊五分鐘，要求我們與她溝通。

Teresa：我們外出郊遊有一個共識。如果你邀請了一位修女，就不要再邀請第二位。讓修女外出時做主角，不要做配角，所以我們會分開邀請，不會同時有兩位修女，她們不喜歡的。

Lisi：我們畢業後，有同學和我請 Sr. Martin 外出吃飯。當時我已經在門診部服務，樓上就是修會會院，下班後便一起出發。因為看到她年紀大，我建議坐的士，但她很節儉，要我們到對面華仁書院外的車站坐巴士，但巴士上沒有空座位，看見她站着時搖搖晃晃。我們和她去了置地廣場一所餐廳，侍應已給我們茶水。

修女一看餐牌價格，覺得太貴，叫我們改去另一間。她好像一個慈祥的嫲嫲，但在學生時代就覺得她很有威嚴；其實修女們有她們溫馨的一面。

Eileen：曾經有一位修女 Sr. Francis Xavier Mapleback [13] 不想回愛爾蘭，想留在香港終老。我們稱她「貓王」。她原來是負責管理車衣房，因為年紀大退了休。我們那裡是山頭，有很多野貓，因為她很喜歡貓，退休後沒事做便經常去餵貓。但食物會招惹蟲鼠，醫院最怕有衛生的問題，一旦發現會被怪責。當時修會建議她回愛爾蘭，但她怎樣也不願回去。

Teresa：我入職時醫院有英文聖母軍，神師是Sr. Fintan，她很熱心招募人參加，就這樣我加入了聖母軍。她很關照我，可能因為當時聖母軍支團裡的人，多數是外面的人，沒有一個是護士，所以她招募我。然後我也邀請了一些師妹參加。Sr. Fintan 曾經在打鼓嶺診所服務，之後回來管理消毒房，也叫我到消毒房跟她工作。可以說，她是我的師傅。後期 Sr. Fintan 離開醫院，

[13] 麥修女（Sr. Francis Xavier Mapleback）1901 年出生於澳洲，是修會其中一位最早到中國的修女，曾在內地和菲律賓服務，最長時間是在律敦治療養院。當修會要老年的她回愛爾蘭總會時，她萬分不願意離開香港。1988 年 6 月，就在準備離開的最後幾星期，她突然猝死，天從人願，長眠於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

Sr. Greaney [14] 來了，她初期在嬰兒病房工作，我畢業前一個月曾經和她一起工作。後來她也做了聖母軍神師和護士長，所以我們一直有聯絡。這兩位可以算是我的上司。其他人說笑 Sr. Greaney 是我「契媽」。

圖：律敦治療養院建築群的主樓，照片所示正門進去是總務大樓，後方是 B 病房及 X 光室，左右兩邊是 A 房及 C 房，而上層前方是手術室及醫生休息室，後方是 E 房（BB 房）。圖中沒拍攝到的左翼及圖中右後方的右翼分別是 D 房及 F 房。此建築物已於 1992 年拆卸。

[14] Sr Mary Greaney（李潔靈修女）是修會撤出律敦治療養院之前，最後一任護士長。更多關於李修女的生平，請參看本書其他章節及第二部分她本人的回憶。

眾：Sr. Deegan [15] 負責 B, C 兩個病房，她很疼愛自己的職員，常常為自己的職員「出頭」。

Lisi：我比較熟悉的是 Sr. Deegan。以前我在 C 房工作時，她是我們病房主任。她真的很疼我們，對病人十分好，會自己「落手落腳」做。有一次，有一位轉院病人因為臥床很久，生了很多褥瘡，每次處理都要一個多小時。修女很細心教導我無菌消毒技巧，如何照顧病人，令你永遠記在心裡。她對病人很好，對職員也很好，還為我兒子起英文名，選了幾個英文名字讓我挑。

有一次，一位年長病人的手破損了，家人投訴姑娘弄傷了他。Sr. Deegan 回應說，手部產生的傷口，在多種情況下都可能發生，更慢慢逐一地分析。終於事件得到了結，家人亦接受了解釋。她真的很熟悉我們，信任我們。和她共事，我們很放心工作，因為大家彼此瞭解。

另一敬愛修女是 Sr. Greaney。當年我家庭發生大變動，她觀人於微，主動調派我到門診工作，不用輪更。我衷心感謝律敦治所有同事及上司，賜予我溫暖的大家庭。

[15] 狄麗謹修女（Sr. Rita Deegan）1935 年出生，1959 年加入高隆龐會後接受護士訓練，最初為高隆龐男修會和神學院提供醫護服務，其後才到香港（律敦治療養院）、巴基斯坦擔任護士，後期又接受牧靈輔導訓練，從事牧靈工作，直到 2002 年返回愛爾蘭總會，於 2018 年逝世。

兩位院長修女的深刻印象

Eileen：我做護士長的秘書，跟院長有很多溝通，因為護士長常常叫我為她們做事。Sr. Aquinas 和 Sr. Gabriel 對病人很友善。那些修女都很「叻」，很美麗。我們常常問她們：「修女，你這麼美麗為什麼會做修女？」，把修女氣壞。

Sr. Aquinas 對我最好。因為護士長辦公室就在院長室附近，有時候她會叫我過去幫忙。那時候逢星期三，她要往贊育醫院應診，醫治孕婦，下午三四點回來後，就叫我跟她一起看 X 光片。因為 Hong Kong Tramway（香港電車公司）有很多職員來照 X 光，也有很多銀行參加照肺保健服務，像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美國銀行等，[16] 所以有很多 X 光片要看，如果完成不了，醫生便不能給病人施藥，有時候看完底片已經六點了。護士長有時會抱怨我去了院長那邊工作，我也沒有辦法推卻。後來院長想調我去她的辦公室，但護士長說：「Eileen 有很多工作，不能調走。」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後，收到護士長 Sr. Ann Salmon 的電話，問我是否有空可回醫院幫忙，因為「大醫生」第二天要到外國

[16] 律敦治療養院及律敦治醫院的日常行政由防癆會（現稱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參與管理，直至 1991 年移交醫院管理局。據《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60 週年紀念特刊》（48 頁）記載，該會由 1957-1993 年為本地公司僱員提供定期照肺保健服務，在 1984 年高峰期共 96 間公司逾三萬人參加：<https://www.antitb.org.hk/attachment/pub/doc/14575940195THx9.pdf>。

教書，有些筆記要準備。回到醫院時，Sr. Gabriel 已經在門口等我，把資料放在我的辦公桌上。我一邊打字，她一邊查看有沒有錯，因為 Sr. Aquinas 第二天十點要上機。我因為怕黑才不做護士，完成筆記後都十點半，醫院很黑，我要修女送我到大門口。三個巨頭都在等我回來，我怎可能不幫她們？就算做到半夜十二點也要幫。

Teresa：Sr. Aquinas 是「大 Boss」（大老闆），她住在醫院。有時候在自己辦公室打開床舖睡覺，不用醫生當值。她沒有一張正式的床，是「朝行晚拆」。有時候晚上病房有些小事發生時，她不會叫當值的駐院實習醫生，而是自己處理。她真的「好好人」，很疼惜那些住院實習醫生。

Lisi：有一個晚上，她不想喚醒實習醫生，自己帶着我在病房為病人插喉。她這麼高級，當時我有點害怕。她真的很好，事事親力親為。

她的工作量很大。看微型 X 光底片是要技巧的，否則會看漏一些細節，但數量很多，她要看所有的底片，看看哪些人有問題，找他們回來複照或施葯。

Teresa：她是醫院的靈魂，對外的交際手腕很好，所以很多醫生都給她面子，免費來醫院為病人做手術和治病。Sr. Gabriel 是副院長，專長是書寫，區修女主力對外，當她離世後，紀修女一個人支撐，也很辛苦。那時候 Sr. Gabriel 很失落，很傷心。

眾：是的，她們在修院、醫院合作好幾十年。她跟大 Boss 工作，大 Boss 走後，沒有人可以幫助她。

Eileen：紀修女也很好，Sr. Aquinas 外出時，招聘文件需要簽名，我也是找她簽的。因為文件辦妥當後，應徵者才可以去照 X 光、打針，如果沒有人簽名，延遲了招聘，病房就沒人工作了。我們招聘時，一定要做身體檢查。如果他本身沒有病，若因為工作在醫院受到感染，醫院是要負責的。如果他隱瞞入職前已有病，就不能說是在醫院受感染，這是要保障醫院聲譽。

Teresa：紀修女很謹慎，她到大學授課前，會先找我們護士模擬聽課，這樣她正式上課時就比較流暢。

我記得有一次，大約是 1979 年，我開車送她往病房大樓，她跟我說：「Teresa，不如你來愛爾蘭做修女。」我回答說：「Sorry，Sister，如果你早點提出，我或者會考慮，但是我下個月要結婚了。」她有點失望。其實我也有點失望，如果她早點說，說不定我可能也會認真考慮。她們以前是比較內斂，很少講話，後來才開放一點。

Lisi：有一次 Sr. Gabriel 在宿舍遇上我，問我有沒有裙子，我愕然地答說「有」。她便告訴我某個晚上在大會堂有音樂團表演，要找人上台獻花。我與她再次接觸，是因為我爸爸進了聖保祿醫院。爸爸想要自殺，醫院要我和家人每晚看守着他，但我輪更工作不可能每晚陪着他。我向紀修女提及此事，她建議我們把爸爸

轉到律敦治，最後爸爸在律敦治新翼過身。律敦治療養院是很有人情味的，你向修女們提及的事，若她們能幫忙，一定會幫你。我爸爸死後，我想找回一個父親（天父），所以我去學道理，並在 1982 年領洗。

為護士爭取權益

Teresa：我們律敦治護士接受的是英式培訓，跟香港其他醫院的護士不同。資助醫院護士學校畢業的是 Enrolled Nurse（登記護士），在政府醫院受訓畢業的是 Registered Nurse（註冊護士）。後來修會計畫退出，而新加入修會的修女又不再修讀護理，多去讀教育，當修女考慮到律敦治轉型為政府的社區醫院時，因為我們律敦治的護士只修讀 thoracic（胸肺科），她們便為我們謀出路。

Lisi：我們是經香港防癆協會培訓的 BTTA，不屬於香港這機制，連登記護士也不算，所以我們是「少數民族」，很少人認識。

Teresa：普通科醫院護士是修讀普通科護士課程，之後再修讀專科，例如精神科、胸肺科，但我們一開始就讀專科醫護。其實我們接受的醫護培訓內容是一模一樣的，只不過我們是專科，實際上我們更為嚴謹。Sr. Aquinas「臨走」之前為我們做了很多安排，為我們爭取，所以政府同意我們到普通科醫院受訓三個月，學習普通科護士的工作，完成後讓我們成為登記護士。因為香港

政府原不承認我們這一批 BTTA 護士，修女安排我們轉做登記護士，這樣我們便可以繼續在任何醫院工作，按登記護士級別領取薪酬。那時候大約是 1984、1985 年。

修會撤出療養院、退出香港的服務

律敦治療養院由區貴雅和紀寶儀兩位醫生修女帶領眾人，在艱難的條件之下努力發展成為世界級的胸肺科專科醫院。隨著結核病在八十年代得到有效遏止，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亦計畫退出醫療服務。不過，每位修女都不捨得離去；而且不只她們因離別而傷心，所有職員都捨不得她們。修會在香港經過逾半個世紀的服務，隨著修女們的年紀漸老，最後更決定退出香港的牧民工作。修女們分批回到愛爾蘭總會，其中最早撤離的，就是在醫院工作的那一批。雖然有離別的傷感，受訪者在律敦治療養院服務的快樂時光，仍然津津樂道，難以忘懷。

圖：律敦治療養院的服務胸章

律敦治療養院（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管理時期）

院長

首任院長：Sr. M. Aquinas Monahan（區貴雅修女）

第二任院長：Sr. M. Gabriel O’Mahony（紀寶儀修女）

護士長

1. Sr. Catherine Laboure Murphy
   （加大利納．拉布萊．墨菲修女）
2. Sr. Martha Keenan（瑪莎．基南修女）
3. Sr. Frances Daly（also known as Sr. de Chantal）
   （芳濟．戴利修女，又稱迪尚塔爾．戴利修女）
4. Sr. M. Damien Rooney（鄧敏修女）
5. Sr. Maureen Byrne（莫琳．拜恩修女）
6. Sr. Ann Salmon（沙娜雯修女）
7. Sr. Maureen Herbert（also known as Sr. Mary Martin Herbert）
   （莫琳．赫伯特修女，又稱瑪利．馬丁．赫伯特修女）
8. Sr. Mary Greaney（李潔靈修女）

回憶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的兩位天使

受訪者：阮嘉毅醫生

訪問日期：2024 年 4 月 8 日

Sr. Aquinas（區貴雅修女）和 Sr. Gabriel（紀寶儀修女）在早期已加入醫生會，我們稱呼她們為天主教醫生協會的守護天使，因為她們為醫生會和醫療界作了很多貢獻，所以我們都很尊重她們。我在七十年代已認識兩位修女，因在香港大學時期，兩位修女也是我的老師，七十年代的醫科學生，是要往律敦治醫院接受培訓的。在那個時代，醫科學生和醫科教授是兩個不同的階層，有人說瑪麗醫院的醫科學生好像進了「木人巷」，學業繁重，實習要求嚴厲，地位卑微，連清潔工友也會欺負我們。律敦治醫院的修女為人和善又細心，當我們忙到沒時間進膳時，修女會提供食物款待我們，簡直被當作上賓招待，實在令我們感動。

在八十年代初，因為我做了醫生會理事會成員，經常要去律敦治醫院開會，區修女是主持人，所以與她熟稔。至於紀修女，因為她是胸肺科專家，我是兒科醫生，我會有一些兒科肺結核腦膜炎的病人送往律敦治醫院醫治，所以在醫學工作上互有聯繫，就更早與她認識了。

由於當時肺結核病肆虐，律敦治醫院是本港一所著名的防癆專科醫院。當時如果你問市民：「律敦治醫院是什麼地方？」普遍回答是：「打肺癆針的地方」，很多香港人以為區修女和紀修女只是在香港出名，殊不知道她們和律敦治醫院在國際上也享負盛名的。

那個年代，由於醫療及藥物發展沒有今天的先進，十個患肺結核病的病人進醫院，能救治痊癒的人不多。我朋友的父親當時患了嚴重的肺結核病進了律敦治醫院，他很幸運，被修女治好了，最後康復出院。由於當時香港患肺結核病的個案很多，所以律敦治醫院用科學方法做了很多科研，使外國人看見香港治療成功的例子。那時候肺結核病很是普遍，就算醫護人員也會患有此病。由於醫護人員很容易接觸到病菌，加上工作很繁重，休息不足等，以致抵抗力弱，就容易「中招」。那時醫生患有肺結核病，就不能入境到英國接受培訓，因為這是屬於公共醫療問題，會傳染別人。患病醫生需要留港打針或是服藥一年，痊癒之後才能去英國。

肺結核幹菌不只影響肺部，它可以由呼吸道進入，之後擴散到全身。如果擴散到腦部，就會出現腦膜炎；如果擴散到腎臟，就會出現腎炎；如果擴散到骨骼，就會出現骨炎，若果擴散到全身，很多器官也有影響。就兒童來說，有很多是結核性腦膜炎，原因是兒童易受傷害。當結核幹菌「上腦」，就會「住在」腦部，病人會突然昏迷，不省人事，需要入院。通常他們會發燒。入院後如果懷疑他們有腦膜炎，就做骨髓檢查，我們用特別的方法，很快就能診斷是否肺結核病。培植肺結核幹菌很難的，「種菌」也不是一兩天的事，需要較長時間。如果診斷結果是結核性腦膜炎，便一定送去律敦治醫院，因為他們最有經驗，可以集中醫治病人。結核性腦膜炎死亡率很高，生存下來的病人很多時候會變成弱智，或有很多後遺症，如果沒有卡介苗，死亡人數會更多。律敦治醫院是第一代接種卡介苗的地方，香港父母們知道肺結核病的死亡率很高，如果不接種卡介苗便能致命，於是很多家長都帶子女到律敦治醫院排隊打針的。

雖然區修女和紀修女在醫學界德高望重，但她們為人謙遜。舉一個例子：有一次紀修女參加了一個國際會議，有一位三十多歲從英國來的年輕專家，很不禮貌地公開挑戰紀修女的治療方法，但在那個強調尊師重道的時代，這種態度真是匪夷所思，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無理地批評一位七十多歲的專科權威，確使全場嘩然，沒有人敢發言，心中都覺得這位年輕專家「很離譜」。但是，紀修女很有耐性和有修養帶着微笑地回答：「是嗎？你是

這樣想？好的，大家再研究一下。」她一點也不動怒。我曾經看過一些脾氣不好的外國教授是會當眾罵其他人的。這事顯出了修女的寬宏大量，令人尊敬，在五十年前那個時代，更是很難得的。

天主教醫生協會的點滴

圖：區貴雅修女出席天主教醫生會活動

我和兩位修女在醫生會中的相處，實在有很多難忘回憶。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是 1953 年由龔樂年神父（Fr. Fergus Cronin, S.J., 1909-1990）創立，紀修女是該會的中堅分子。龔神父認識很多天主教名醫，並邀請他們參入醫生會，例如，方心讓醫生、蔡永業醫生、蔡永善醫生等。無論這些名醫如何忙碌，他們每年都踴躍參加醫生會的活動，像周年避靜，所以，每年的周年避靜是醫生會的一件盛事。

八十年代我做醫生會會長，因而認識這些前輩。區修女、紀修女和以上幾位醫生是同期的，加上他們都在瑪麗醫院工作，也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更會彼此互相轉介病人。所以他們在醫療工作方面有很多溝通。這些前輩醫生對修女很尊敬，若果修女提出要求，他們一定會幫忙，出錢出力，而且很低調地幫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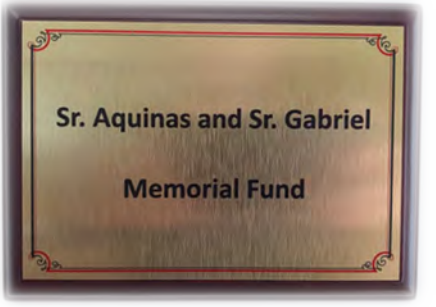
以修女名字命名的基金會

為紀念區貴雅及紀寶儀修女的貢獻，醫生會成立了一個生命倫理基金會，以她們的名字來命名，因它的目的與醫生會創辦的目的有關。醫生會創立的目的有兩項，我們首要的目的是維護香港天主教生命倫理，支持香港教區是我們的首要目的；第二是與同業之間的交流。香港天主教教區對生命倫理工作感到興趣，也覺得需要推行。當時教區秘書長建議成立一個「教區生命倫理小組」[1]，以面對記者及社會大眾有關生命倫理的查詢，結果他找了我做籌委會主席。當時我們也不大清楚怎樣進行，得到聖神帶領，我們找了天主教護士會和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一起合作，三方面開會討論如何推行生命倫理的工作。討論進行了兩、三年，寫了一份報告給教區，報告提及：首要成立教區生命倫理小組，主要是做制定政策方面的工作；第二是成立資源中心，主要是

[1] 教區生命倫理小組於 2005 年 6 月正式成立，而生命倫理資源中心則於 2011 年 11 月成立，隸屬於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學部，目前由倫理神學教授呂志文神父擔任中心主任。

對外的工作，例如製作單張、出版書籍和舉辦研討會等。今年（2024 年）已舉辦第十屆研討會了。

醫生會舉辦了一次「紀念區修女和紀修女命名」步行籌款，當時我們由神長帶領，從聖神修院出發，步行往南朗山善牧會瑪利灣學校一圈。那次步行籌款，籌得款項十多萬元，全數捐助「生命倫理資源中心」成立基金會。資源中心為了紀念區修女和紀修女，就做了一塊牌匾（上圖），把它掛在生命倫理資源中心內，以作紀念。基金會至今已成立超過十年了。



圖：生命倫理資料中心步行籌款者合照

與高隆會修女的聯繫

我和李潔靈修女（Sister Greaney）還有通過 WhatsApp 保持聯繫。她告訴我高隆龐修女會一百周年的慶祝會 [2] 她不會回港，只會有韓國修女代表前來。她們的修會在香港服務了八十年，她不回來，我覺得有點可惜。其實「高隆龐女修會歷史」這本書的出版，也是獲得修會總會長批准。因為最初紀修女是以英文編撰這本修會簡史，且是私人傳閱。但這只會讓少數有私人聯繫的人看到，流通量會很少。很多人，特別是中國人，沒機會看到。我覺得有點可惜，於是寫信給 Sister Lucia 蘇艷美修女，跟她們說為什麼不用中文來出版？後來討論後，她們同意把書翻譯成中文出版，得到天主教研究中心林榮鈞主任支持這出版計畫，就這樣成事了。

[2] 慶祝會於 2024 年 4 月 13 日在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

梁式芝書院天主教徒舊生的記憶點滴

編按：聖高隆龐女修會在香港曾營辦三所學校。位於九龍秀茂坪新開發徙置區的梁式芝書院，是修會在香港從醫療服務首次轉換服務方向，投身教育界。根據學校網頁的校史介紹，天主教會早於 1972 年獲政府撥出曉光街土地建校，原計畫命名為「秀茂茂坪天主教女子書院」，後得到慈善家梁銶琚先生及其兄弟捐建，故學校以其父梁式芝先生的名字命名。建築工程因政府撥款延遲批出，直至 1976 年才動工，學校於 1977 年須向另一學校借用地方上課，至 1978 年校舍才正式建成。有關高隆龐女修會的教育服務，參閱簡史第九章。

受訪者：勞敏詩

訪問日期：2024 年 9 月 4 日

我出生於天主教家庭，於 1982-1988 年在梁式芝書院就讀。學校開校時，很多人已知道它的存在，後來由胡振中主教正式祝聖。祝聖的盛況，教區周報《公教報》也有報導。

選擇在梁式芝書院就讀，是因為這所由外籍修女開辦的學校當時已是秀茂坪一帶較為優良的天主教中學，在官塘區頗為有名。再加上它是女子中學，離家裡很近，步行才二十分鐘左右，

我母親便請堂區神父幫忙寫信，獲取入讀資格，但我不清楚她找的是哪位神父。

圖：穿著校服的勞敏詩（右）與同學在課室合照

在我入讀之時，校內至少有五位修女在服務。校長是謝德華修女（Sister Ursula Scullane），其餘也是外國人，但全都會說中文。修女們教學時是採用英文；小息期間，則用廣東話跟學生溝通，而聊天的內容多是與學校相關的事。我在 1988 年畢業時，服務的修女人數與之前相若。

在天主教學校，宗教課是必然的課目。但每班教友人數不多，我記得我班的教友好像只有兩三個。所以修女們在課堂外會教授天主教道理予非教友同學。宗教課由教友老師或修女講授，其中 Sister Mary Anthony Ryan（衛愛蓮修女）任教非教友的宗教班。學校還開設慕道班給想認識天主教的學生。

修女的會院位於學校頂樓，因為是學校在山坡上，以前在一些大節目，修女會邀請一些學生到頂樓看煙花。頂樓設有小聖堂，平日早上七時許，堂區神父會前來為修女開彌撒。彌撒長約半小時，我們是八時才上課，所以也開放給學生，我也曾參與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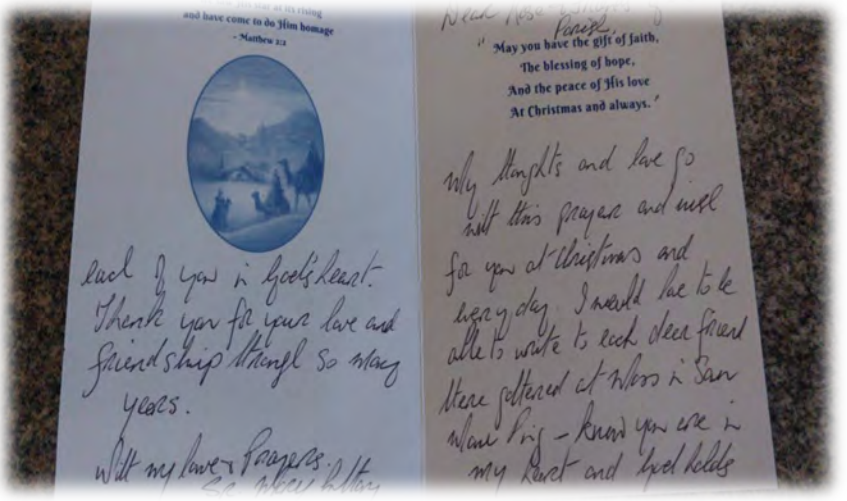
學校所屬的潔心堂堂區，以前是在秀茂坪天主教小學舉行彌撒，如果是大瞻禮就會在梁式芝禮堂佈置、排凳；這應該是教會向學校借用禮堂來進行復活節、聖誕節、新年等慶祝活動。

在眾修女中，謝校長比較嚴肅，哪怕是在聖堂遇到，我們也不太敢和她傾談。這可能是我們當時年紀小，覺得校長高高在上，所以怕她。其他修女都非常友善，有些會個別地教學生英文，像游德肋撒修女。讀書期間，我晚上會再回到學校由她單獨教我英文，每次半小時到一小時。她用的是課外教材，還會教我朗讀。我每星期只去一個晚上，她還有安排時間教導其他人（包括教友及非教友）。

因為我是教友，每周都參與潔心堂的彌撒，所以與修女們頗熟悉。她們除教學外，還關心堂區的長者，也在堂區做聖母軍的神師。例如，游德肋撒修女也是我參加聖母軍時的神師，她是中國人，經常與我們分享《聖經》及其弟弟在國內因信仰而坐牢的經驗。當聽到她的弟弟是神父，她自己是修女，一種神聖感覺便油然而生。游修女離開秀茂坪後，我們便沒有特別聯絡了，

但知道她住在沙田。後來她離開香港，我們有去送機。她好像是身體不舒服，才回去愛爾蘭。

至於衛愛蓮修女（見左圖），我覺得她是一位好漂亮的修女，好關心每一個人的需要。例如，堂區有一位失明的年輕女教友，衛修女每次見到她都會跟她打招呼和傾談，而那個女孩子也記得她的名字，彼此的感情很好。總之，修女很好，很照顧教友。



圖：勞敏詩與朋友在衛愛蓮修女離港後，仍保持書信往來

身為梁式芝書院的學生，我很感恩，因為在學時期學習了修女們無私的愛及服務，現在我繼續學習她們的服務精神，工餘會探訪青年懲教所及無家者。

圖：高隆龐女修會撤出香港前，勞敏詩（左）在潔心堂的歡送會中與修女合照

圖：潔心堂教友在歡送高隆龐修女的活動中，送上心意卡

高隆龐女修會生死教育的夥伴

編按：與高隆龐會修女熟稔的謝建泉醫生，現年 79 歲，在伊利沙伯醫院臨床腫瘤科任職三十年，2000 年退休。他是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 1983-1984 年的主席，也是生死教育學會創會會長，現任香港紓緩醫學學會榮譽顧問。

受訪者：謝建泉醫生

訪問日期：2024.07.24

我在香港華仁書院讀書，因為父親破產去世，家裡很窮，耶穌會巴烈德神父 [1] 是校長，知道我的情況，為我提供書簿和飲食費用，有恩於我。因此，我和耶穌會神父相熟。後來我進大學時，

[1] 巴烈德神父（Fr. Cyril Barrett, SJ，1917-1989）又名巴達德，耶穌會士，1951 年到港，1954 年擔任香港華仁書院副校長，1956 年升任校長，直至 1962 年調任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舍監，於 1969 年重返華仁，翌任重當校長，至 1982 年退休。

巴神父是利瑪竇宿舍舍監，天主教醫生協會的會址就在利瑪竇宿舍，神師素來是耶穌會神父，那時候的神師是龔樂年神父[2]。我1969年大學畢業，一畢業就參加了天主教醫生協會，因為當時他們說：「我們全都是私家醫生，正好你是公立醫院醫生，你來參加和『幫手』。」當時醫生會的成員全部都是私家醫生，都是出名的醫生；現在剛剛相反，大部分是公立醫院醫生。那時候在協會見到 Sr. Aquinas（區貴雅修女）和 Sr. Gabriel（紀寶儀修女），人們稱呼她們為醫生會的守護天使。修女在醫生會與神師一起照顧大家的靈性需要，開會時會積極發言，每次 retreat（退省）她們都很投入分享。

讀醫科時，我們很喜歡去律敦治醫院上課，因為有「靚粥」[3]食，修女們會請學生食靚粥，所以學生很喜歡去律敦治上課。以前一班大約幾十人，我們的班級擴大了，有差不多一百人，但不是所有人一起去上課。當時的制度是十幾個學生為一組，這一組往律敦治醫院上課，另一組學習其他，輪流去。我們往律敦治醫院聽紀修女、區修女的課，真的是一流。她們講課

[2] 龔樂年神父（Fr. Fergus Cronin, SJ，1909-1990），1926年加入耶穌會，1934 年到港後在華南總修院及華仁書院任教，又曾在香港大學教擔任邏輯學講師（1946-966）及利瑪竇宿舍舍監（1947-1955）、公教進行社社長，以至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龔神父於 1990 年在港逝世。

[3] 意指煮得很美味的粥。

清清楚楚，特別是紀修女很人性化，也很「鬼馬」，區修女比較嚴肅。還有靚粥食，很好味。

我們去律敦治醫院不是實習，是去「聽書」，去親身體驗。當時舊醫院的舊式「騎樓」很大，主要做胸肺科，最出名是醫治肺癆。平時我們在瑪麗醫院醫學院上課，要學習胸肺科和肺癆病一定要去律敦治醫院聽課，如果要學驗屍就去其他地方，不同的小組輪流去不同的地方學習。我不記起是哪一年去律敦治醫院上課、第一次見修女，不過當時她們是老師還不是朋友，覺得老師很人性化、很可愛。兩位修女都「有料」。

我認識的、仍然在世的，只剩 Sr. Greaney（李潔靈修女）了。那個年代她是護士長，區修女和紀修女是院長。紀修女是返回愛爾蘭退休後過身，區修女則是在香港過身。Sr. Greaney 後來也回去愛爾蘭；幾年後，聖高隆龐女修會也正式退出香港，聖高隆龐傳教會的神父則留在香港。[4] 另外是 Sr. Fintan（黎碧潔修女），但我記不清楚黎修女負責什麼。如果這四位修女見到我，她們是可以叫出我的名字的，因為大家都是朋友。

不過，區修女和紀修女曾經是我的老師，所以開始時，彼此的關係沒有那麼親密。過了很久，我仍然覺得她們是我的老師。直到八十年代，大家開始成立「善終服務會」時才真正算是

[4]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於 2015 年 12 月結束在香港的服務；相反，聖高隆龐傳教會（男修會）則於 2008 年將位於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總部遷到香港。

朋友。你查香港善終服務會早期資料，在 1986 年就是紀修女、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起成立的。就是在那時候，大家成為朋友。她們為了服務而學習中文。她們的中文很難聽明白的，到現在也是那麼蹩腳。與病人溝通都是用這些差勁的廣東話，但病人很喜歡。外國人講廣東話，同時用身體接觸去鼓勵病人，病人覺得很親切，很開心。Sr. Greaney 是一個很好的護士、很好的護士長，把律敦治醫院的護士培育得很好。

高隆龐修女參與善終服務始末

香港善終服務會現在改稱為善寧會。最早期在香港推行善終服務（現稱舒緩治療）的是聖母醫院，大約是在七十年代末，主要是祈愛蘭修女 [5] 和何桂萍修女 [6] 負責，她們二人是在加拿大取經。全世界最早推行善終服務是英國，其次是加拿大和澳洲。她們取經回到香港後，覺得善終服務是好的，就在聖母醫院推行。初期推行時，因為沒有什麼宣傳，所以沒有什麼人知道。後來到了八十年代初，無綫電視台訪問一位臨終病人，那位病人清楚告訴大家，聖母醫院的善終服務對他幫助很大。這個節目令香港人

[5] 祈愛蘭修女（Sr. Kenny Helen Marie, MM，1932-2020），1949 年加入美國瑪利諾女修會，1955 年宣發永願，於 1958-1963，1970-1983，1988-2012 年間在香港服務，擁有護士專業的她，1958 年在觀塘的教會診所服務，1961 年調派往修會開辦的聖母醫院從事護理工作；1970 年第二度來港出任護理總監，1988 年再度來港後，在聖母醫院引入善終服務。2020 年在美國逝世。

[6] 何桂萍修女乃方濟各瑪利亞傳教女修會的修女。

知道了善終服務，也吸引了凱瑟克基金領導人的注意。我估計是基金會聯絡了瑪利諾會修女和 Lucy Chung（鍾淑子），由於善終服務做得最好的是英國，當時在英國請了一位善終服務院院長來做講座，那時是 1984 年。

邀請了講者後，凱瑟克基金覺得要有政府的人牽頭，於是他們接觸了香港防癌會，防癌會何鴻超教授是世界非常有名醫治癌症的教授。當時主治癌症的醫生沒有太大興趣，我提出我有興趣。為什麼我有興趣呢？我 1969 年畢業，1974 年去英國考取專科資格。最初幾年，我充滿熱誠做醫生醫治病人，但是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病人死亡，令我有點灰心，也令我覺得自己有問題。後來，我去了英國最出名醫治癌症的皇家馬斯登醫院（The Royal Marsden Hospital），醫治癌症的結果還是一樣，我便醒覺到癌症病人死亡不是醫生的問題，並且學習了一件事，就是醫療的極限。痊癒的病人很開心地回來多謝我，未能痊癒的病人不會抱怨你。那時候的病人不會怨醫生，只會多謝醫生，不會投訴。

我自己一直想應該怎樣做得更好，初時感到很不開心。到了 1980 年代，南朗醫院是香港防癌會負責運作，因為住院的病人全部是末期病人，沒有幾個醫生願意去巡房。我願意去，每星期一次。我當時已是 senior medical officer（高級醫生），職責上每星期要巡房兩天，但我還會在周末星期六去南朗醫院。我由畢業直到 1984 年仍沒當上顧問醫生，屬於最長時期未升任顧問醫生

的其中一人，因為那個年代沒有腫瘤科醫生會到外面掛牌行醫，沒有生意的，和現在的情況很不同；他們大都會做到退休。我不介意未有升做顧問醫生，反正在政府機構工作不會餓死的，而我又很喜歡巡房與病人接觸。當何鴻超教授問我是否願意去參加善終服務講座，我看了資料後便答應了，還主持了全港第一次關於善終服務的公開論壇。

凱瑟克基金很了不起，請了不同的人來參加。不同的醫院有不同的代表，包括律敦治醫院紀修女。修女不是來講書，而是座上客。我記得由聖母醫院做 sharing（分享），有醫生講的、護士講的，由鍾淑子主講，也有社會工作者講的，十分動聽。因著這個論壇，我認識了香港一群對善終服務有興趣的朋友。

論壇完畢後，凱瑟克基金聯絡了這些人，再找一些有興趣推行善終服務的人。因為天主教醫生協會的緣故，我之前已認識了紀修女。後來又認識了耶穌會劉勝義神父 [7] 和香港循道衞理李鼎新牧師。凱瑟克基金和我們開了一次會，認為香港需要推行善終服務，並承諾贊助我們。香港以前很多人吸烟和服食鴉片，除了肺癌，肺氣腫病人死亡率也很高。紀修女提到律敦治醫院很多

[7] 劉勝義神父（Fr. John Russell, SJ，1926-2023），出生於愛爾蘭，1943 年加入耶穌會，1957 年晉鐸，1962 年在羅馬宣發永願，1951 年來港，直至 2023 年逝世，期間這位教會法專家擔任過不同職務，尤其在教區法庭的長期服務。

肺癌病人和嚴重肺氣腫病人都是末期的，所以她們有興趣推行。聖母醫院當然參加，我代表了防癌會也表示有興趣參加。到了1986年我們成立了香港善終服務會，推動善終服務。第一間推行的醫院是聖母醫院，第二間就是律敦治醫院。

我願意參加善終會是因為伊利沙伯醫院很多末期病人，而紀修女是在律敦治醫院嘛。紀修女又邀請鍾淑子去善終會幫手，做全職員工，其後更加入律敦治成為護士長，所以我和紀修女幾個人就變得很「老友」。高隆龐會修女那本簡史提及的兩位護士鍾淑子和 Clare Lai（黎秀瞻）還在香港，她們和善終服務有關。那本書最後提及其他活動，也有提及我和這兩位護士。

起初紀修女不肯擔任主席一職。不是因為太忙。紀修女說：「我是修女，做主席不太好，因為這樣令善終服務會太過於宗教性，Vincent（謝建泉醫生）不如你做主席。」我回應說自己沒有江湖地位。江湖地位是要累積的。紀修女江湖地位就真的很高，是世界級的。紀修女和區修女她們是全世界醫治 TB（tuberculosis，結核病）最出名的醫生。自 1986 年後，有十間機構成立推行善終服務，令我們感到很開心。

與其他病科不同，公立醫院的臨床腫瘤科醫生不會調動的，因為癌症病人跟醫生一輩子。做了三十年，看到一些小朋友痊癒，長大後結婚，回來請我參加婚宴，所以把病人治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善終服務也令我很開心，因為對那一半到三分之二

未能治好的病人來說，善終服務可以幫助他們在有限的日子過得有姿彩。痊癒的病人會寫「情信」多謝你，那些未能治癒的病人而你能幫助他們過得有姿彩、舒舒服服，他們的信更長，更多人簽名，更感激你。所以我做了善終服務後，覺得做這一科很有意義，做到退休。

李潔靈修女和紀修女都有參加善終服務會。紀修女做了很多年主席，做得非常恰當，後來才退出。李修女則是委員，也做了很多年。我真的不記得怎樣認識李修女。她是護士長，那時候去律敦治醫院應該見到她，她有份招呼我們。她很健談，笑容很燦爛。真的和她「老友」是在八十年代，應該是推行善終服務的時候，因為真的推動善終服務的是護士。所以我每次提到善終服務團隊，護士都是排首位，護士最重要。

高隆龐會的修女對香港的第一樣貢獻，是令律敦治醫院成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胸肺科醫院，醫治肺癆病。第二樣貢獻是，Sr. Aquinas 和 Sr. Gabriel 兩位修女曾在香港大學教書，對很多醫科學生影響很大，是身教，最起碼，紀修女影響了我。第三樣是善終服務會，在她的帶領下穩定地為市民服務，也令善終服務會上了軌道。她有江湖地位，一呼百應。其他的我不太清楚，只知道高隆龐女修會亦曾辦學校。

修道生活，我尊重的一種生活模式

受訪者：趙若萍女士

訪問日期：2024 年 5 月 7 日

我在坪洲出生和長大，全家是教友。我最初是加入嘉諾撒仁愛女修會，1991 年入會的時候都已經 36 歲了。我父親早逝，母親含辛茹苦地把我們幾兄弟姊妹養大。當她知道我去要修道時，哭得很厲害。她說做修女很苦，要跪在地上洗地。這是因為她年輕時從廈門來香港前，見過那裡修女的生活。我轉會的時候，她已沒有說什麼，因為她知道我的心意已決，而且那時候她已經開始有老人癡呆症。

至於我出會，是因為神師的意見認為我不適合嘉諾撒會，應該去尋找其他比較開放的外國修會。那時，我媽媽已從坪洲遷到

柴灣新翠花園，是海星堂的教友。高隆龐會的白秋霞修女[1]和樂易安修女[2]是那裡的牧職修女。我出會後便與兩位修女接觸。她們鼓勵我，同時也觀察我。最後我便加入了高隆龐會。

進了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後，我先去菲律賓接受初學，因為我在之前的修會已經有初學的經驗，所以只需兩年多的時間，便回來香港發初願。然後，修會派我去赤柱聖亞納堂做牧民工作，一年後到愛爾蘭總會，後來因故離開了修會。

我出會的時候，母親已進了老人院，回港後沒有地方住，便暫居於修女會在石澳的靜修舍，期間聽到高隆龐會神父要把總部搬來香港。[3]高隆龐會的神父平常有事情也會找高隆龐會的修女幫忙。我仍是高隆龐會修女時，在愛爾蘭也去過神父們在都柏林

[1] 白秋霞修女（Sr. Patricia Byrne），1966 年加入高隆龐會，完成初學後進修教育課程，於 1976 年派遣到香港，在梁式芝書院任教七年，以及在柴灣海星堂和石澳靜修舍從事牧靈工作，在香港共服務二十八年。

[2] 樂易安修女（Sr. Isobel Loughrey），1973 年到港從事教育，其後投身堂區及醫院牧靈工作，包括探訪監獄、精神病患者及照顧菲律賓教友團體，共計在香港服務四十二年。2015 年修會結束在香港服務，她與白秋霞修女、衛愛蓮修女是最後一批離開香港的高隆龐會修女。

[3] 聖高隆龐傳教會（男修會）總會原位於愛爾蘭都柏林，因新加入修會的傳教士、修生及教友傳教士主要來自亞太及南美地區，經修會全體大會決議，於 2008 年遷往交通及通訊較為便利的香港。

的母院，與他們有接觸，亦曾經與 Fr. Tommy Murphy[4] 和其他神父修女行過聖博德山朝聖地。我用電郵與他們聯絡。他們那時已經準備來香港。Fr. Tommy 當時是總會長，我估計他對我的印象還好，知道我出了會，便聘請我為他們工作，一直做到現在退休。我在修道前是做行政經理，所以可以幫神父們獨立處理好總會的事情，像所有的文書工作、船運文件、聯絡物業管理處。

我出會時已經差不多 50 歲，年紀大了，沒再想加入其他修會了。現在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在修道聖召的路上，我已盡了力。天主賜了恩寵給我。做回普通教友也可以貢獻教會，任何一方面都可以。而且我覺得天主沒有遺棄我，在我最需要的時候，我找到一份這麼好的工作，即高隆龐會神父那裡的工作，與高隆龐會仍有某種的聯繫。工作上，神父們也很信任我。真的感謝天主。

高隆龐會修女那時還在香港服務，我仍有跟她們聯絡。Sr. Patricia 白修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I am grateful to have you. You are forever a Columban people.”高隆龐會有一個叫「高隆龐之友」的第三會教友組織。我沒有參與他們的會議，但每次有活動，他們都會邀請我參加。我真的覺得很感恩。

[4] Fr. Tommy Murphy（陳發義神父）1949 年出生於愛爾蘭，1974 年晉鐸，他曾在香港、內地、台灣、韓國、愛爾蘭履行牧職。陳神父於 2006-2012 年擔任修會總會長，其時修會決定將總會遷到香港。2024 年逝世前擔任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助理司鐸一職。

在我修道期間，高隆龐會的華人修女不多，其中游德肋撒修女真的很好很謙遜。她是從大陸來的，當時年紀比我們大很多。她有個神父弟弟，我曾到過他們在南城的家鄉探訪。

我不太瞭解修女會早年在大口環和律敦治那些地方的醫療工作，始終我當時住在坪洲離島。我也沒有見過 Sr. Aquinas [5]，但有聽說過她，因為未進修會之前，修女們介紹了一點歷史，知道她是胸肺科醫生。

至於其他個別修女，我的暖水壺是 Sr. Barbara [6] 走之前送給我的，我現在仍用著。我剛剛進修院時，蘇梨韻修女是最厲害、最有權威的一位修女，她是胡振中樞機的秘書。而印象最深刻的修女，可以說是白修女和樂修女，認識她們時，她們已經是在做牧民工作，她們在堂區對青年很好。

在愛爾蘭總會的時候，有些修女是曾經在香港服務但已離開很久了，她們有時會在母會分享以前在香港的工作經驗。我最記得紀寶儀修女 [7]。我曾與她一起吃早餐，她只加四五粒提子乾

[5] 區貴雅修女（Sr. M. Aquinas Monahan）。更多她的生平事蹟，請參閱本書其他章節。

[6] 蘇梨韻修女（Sr. Barbara O'Sullivan）1927 年出生於愛爾蘭，1945 年入會，1952 年到香港，翌年在港發永願。蘇修女曾於律敦治療養院及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擔任護士，其後調任為胡振中樞機秘書，長達 22 年。

[7] 紀寶儀修女（Sr. M. Gabriel O'Mahony）。更多她的生平事蹟，見本書其他章節。

在麥片上。我好奇問：「修女，為甚麼放那麼少？」她說：“Good enough. It’s sweet. Do not take too many. Few will be good enough for a day.”（夠了。那是甜的。不要吃太多。一天幾粒已經很夠。）當時她年紀已大了，住在母會，但我知道她很有名氣。我現在都還記得她。所以現在每天早上，我吃麥片的時候，也只是放幾粒提子乾。

加入修會帶給我一個怎樣的成長？可以說，它讓我知道神父修女可以全心全意地去做牧民工作。不像耶穌的年代既要傳教，也要謀生。因為修會有了規模以後，有其他人可以照顧你的起居飲食，甚至床鋪、會衣也幫你整理和清洗。這讓你可以全心全意去做牧民工作。我覺得這是教會發展的進步。祇要你全心全意去做牧民工作，天主會照顧一切。如果你真心真意修道，沒想要結婚，不過俗世生活去跳舞飲酒，我覺得修道生活是很好的，是我尊重的一種生活。

除了加入修道的兩個女修會，我一生中也與其他幾個修會有不同形式的交集。小時候在坪洲生活，主持主日彌撒的神父是從長洲過來的宗座外方傳教會士，像陸之樂神父 [8]。如果他們太忙沒時間，便會委托大嶼山神樂院的熙篤會士幫忙，就這樣我們

[8] 陸之樂神父（Fr. Nicola Ruggiero, PIME）生於 1925 年，1949 年晉鐸，兩年後來港，1953-1964 年在長洲堂區服務，其後擔任其他堂區和修會的職務，直至 1990 年離港，2012 年在意利利去世。

很幸運地有江克滿神父[9]、莊宗澤神父[10]或甚至是趙本篤神父[11]來為我們開彌撒。我妹妹更得到江克滿教她彈琴，為聖堂當司琴。另一個修會，就是高隆龐傳教會（即男修會），雖然離開了高隆龐女修會，卻能以我的行政專長，為同一神恩的傳教會服務直至退休，我很感謝天主。

[9] 江克滿神父（又名江恩澄），1937 年出生於香港，1961 年加入嚴規熙篤會，1969 年宣發永願，1973 年晉鐸，2022 年逝世。江神父曾擔任修會院牧，生前創作多首聖樂，包括廣為教友熟悉的《主慈頌》。

[10] 莊宗澤神父與江克滿神父一樣，是少數香港出生的熙篤會士。兩人是校友，江神父作曲的《主慈頌》是由莊神父填詞。莊神父原本加入教區修院修道，第一次接觸苦修院後便念念不忘，最後轉入熙篤會，於 1996 年發永願。

[11] 趙本篤神父，1918 年於河北正定出生，1940 年入會，1949 年離開大陸到港，2024 年慶祝晉鐸七十五周年。

區貴雅修女念茲在茲的香港戒毒會

編按：自結核病在香港受到控制後，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便開始探索新的服務領域，其中區貴雅修女（Sr. M. Aquinas Monahan）特別關心社會上的吸毒問題。由於早年參與香港戒毒會的前輩大多已離世或失去聯繫，未能進行口述歷史採訪，本文主要介紹該會與區修女的關係，以及如何傳承她的關愛精神。

香港戒毒會供稿

圖：上水坑頭「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現址

區貴雅修女自 1979 年加入香港戒毒會執行委員會，擔任義務秘書；自 1980 年 12 月起，擔任香港戒毒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直至其於 1985 年離世。為紀念區修女多年來為戒毒康復工作之

無私領導及獻身精神，香港戒毒會於 1986 年 1 月，際「婦女康復中心」康復組從灣仔遷往沙田新翠邨，中心之名稱改為「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以作紀念。康復中心於 1997 年由新翠邨遷至上水金錢村，其後再於 2000 年由金錢村遷至上水坑頭面積更大、環境更佳的現址。

圖：愛爾蘭駐港總領事高德朗先生（左）出席 Sister Aquinas Raise Me Up 活動，由香港戒毒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周偉淦先生，JP（右）致送紀念座。左後方為區貴雅修女遺照

香港戒毒會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於 2019 年 11 月舉行“Sister Aquinas Raise Me Up — Memorial Programme of Sister Mary Aquinas”活動目的是為紀念我們親愛的區貴雅修女誕生一百周年。我們深感榮幸邀請到愛爾蘭駐港總領事高德朗先生（Mr. David Costello）撥冗出席並在致辭中鼓勵一眾學員，同時也得到聖高隆龐傳教會陳發義神父（Tommy Murphy, MSS，1949-2023）抽空光臨是次深具意義的紀念活動。活動中，學員們向區修女的

遺像獻花，並獻唱“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一曲，以感謝她過往對戒毒康復人士的關注及對戒毒康復服務的貢獻，亦同時答謝康復中心的照顧及給予改變和成長的機會。

李潔靈修女昔日曾與區貴雅修女在香港服務多年。李修女於電郵中憶述區修女臨離世前對香港戒毒會的關心，提及當時有立法會議員到醫院探望身體已很虛弱的區貴雅修女，在離開前，該議員詢問區修女，是否有甚麼可以在個人層面上幫助她的？李潔靈修女描述，區貴雅修女當時的回應是非常令人意想不到及感動的：

“Please keep an eye on SARDA for me.”

（請幫我關注香港戒毒會）

當時在場的人，包括李潔靈修女及議員都深受感動，這是區貴雅修女對香港戒毒會的愛的最佳見證！

香港戒毒會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

香港戒毒會的婦女康復中心在易名前，早於 1968 年開始提供服務，專為年輕濫藥女性（包括非華裔婦女）提供自願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中心以年輕濫藥女性的需要出發，強調正面群體、友輩的支持及影響，並著重提高自我認識、責任感、情緒處理及解決問題能力。

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左圖為沙田新翠邨舊址）透過舉辦多元化課程，幫助學員接觸內心世界，學習成長，如靜觀、戲劇班；透過學習音樂和藝術活動，如豎琴、木箱鼓、和諧粉彩、花藝設計等，建立自信，舒緩壓力及情緒；此外，亦推動學員積極參加運動項目，如空手道、Zumba 健身舞、劍球、匹克球等，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開展無毒新篇章。配合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課程，康復中心在教育課程內容上也包括通識、科技與生活及視覺藝術等科目，讓學員們有多元的學習機會。

此外，關注到濫藥女性懷孕的獨特需要，康復中心為正在懷孕或育有嬰幼兒的濫藥婦女設有「『非常照顧．非常媽媽』——懷孕女性住院戒毒康復計劃」（「非常媽媽」計劃），提供跨專業合作的戒毒服務，以照顧胎兒的成長及她們的身心健康，協助受毒品問題困擾的準媽媽及新任媽媽重過無毒生活、學習當稱職的母親，並預防跨代吸毒。「非常媽媽」計劃服務內容包括 24 小時醫療照顧、臨床心理學家及社工提供個人及小組輔導服務、陪月員提供

產前產後陪診及身體調理服務，計劃亦有為家人提供支援，以協助她們準備迎接及照顧新生命。

香港戒毒會 <www.sarda.org.hk>

附錄一

《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23，頁 185-200。

第三章第 11 節——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

源於愛爾蘭的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SSC）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踏上華人土地，於 1926 年 11 月 15 日首批六位修女抵達湖北漢陽，成立她們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服務點，與早已在當地扎根的聖高隆龐傳教會（Missionary Society of St. Columban, SSC）並肩服務。這兩個修會之所以會通力合作，是因為 1917 年創立的聖高隆龐傳教會（原稱梅努斯對華傳教會 Maynooth Mission to China）同樣來自愛爾蘭，是一個為了到中國傳教而成立的男修會。教宗庇護十一世把漢陽宗座監牧區交託給聖高隆龐男修會牧養，並任命其聯合創辦人高爾文神父（Fr. Edward Galvin，1882-1956）為宗座監牧。但高爾文主教發現男性傳教士很難打入華人婦女圈，認為如果有女性協助，牧民工作會來得容易，而有了婦女信徒，就會有孩子受洗，這樣的家庭模式，最終亦會對男性產生影響而入教。1917 年，男修會的另一創辦人若望．布洛威克神父（Fr. John Blowick，1888-1972）提及極需要女性合作者為在中國新開始的傳教事業中一起工作，終於在 1920 年成立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

以「從事任何有助於在中國傳播福音使徒工作」為己任。1924年9月29日，首批修女發願，這個年輕的女性修道團體正式成為一個公開的傳教修會，這個日子也視為該會的成立日，明年（2024）將迎來一百周年。[1]

11.1 有助在中國傳播福音的使徒工作

聖高隆龐女修會的神恩是按時代的需要作服務，而那個時候民眾很需要醫療，孩子需要教育。抵達中國的聖高隆龐會修女首先在衡陽落腳，開始成立施藥所和傳教點。在三十年代時局混亂的中日戰爭中，有很多軍民受傷，修女們忙於照護傷患，只要是病的、受傷的都會救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女修會面對難以傳教的境況，有先見之明的總會長博德．莫洛尼姆姆（Mother M. Patrick Moloney）派遣年輕修女接受更多的教育，為將來傳教作準備。在戰事結束時，修女們已獲取了教師、護士、醫生等不同的專業技能，並且準備好再向遠東出發。1946年，聖高隆龐女修會召開了戰後的第一次全體大會，由瑪利．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Mother Mary Vianney Shackelton）當選新任總會長。她與其前任一樣，極力爭取時間，在翌年便進行戰後的首次外訪，到中國和菲律賓視察

[1]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Our Founding History, <https://www.columbansisters.org/from-the-beginning/>

修會在當地的團體。在探訪期間，沙克爾頓姆姆已感覺到外國人遲早要離開中國，只是時間的問題。她於 1947 年底抵達香港，開始思考聖神會讓在中國的修女做什麼？就在此際，時任耶穌會香港區省會長蔡伯德神父致電給她，迫切地想與姆姆見面。原來這位愛爾蘭籍神父受託於醫務衛生署署長的請求，尋找合適的醫護人員管理本地一所專治肺癆的療養院。對於突如其來的邀約，沙克爾頓姆姆認為是天主的意思，因為這工作除了解決修會正面對的財務困境，讓她們能自給自足，修女們學成的醫護專業也正好派上用場。不過，她後期才透露，自己曾為這個決定有許多個晚上輾轉反側難以成眠，深怕年輕修女在工作中染上當時在港非常猖獗的肺癆病。[2]

11.2 初抵香江

1948年抵港，準備投入律敦治療養院服務的第一批成員，是從衡陽退守的兩位護士修女，其中曾致美修女（Sr. Mary Dolorosa Ryan）在入會之前已是藥劑師，在上海和衡陽服務十六年，後來在律敦治療養院擔任藥劑師。[3] 曾致美修女還記得

[2] Sr. M. Gabriel O'Mahony, *A Time of Transition: Columban Sisters in Hong Kong* (Wicklow: The Columban Sisters, 2005), p.9.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only, use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Columban Sisters.

[3] "Chinese Convert-Nurse Joins Missionary Sisters," *Trove*, March 19, 1953: <https://trove.nla.gov.au/newspaper/article/175358918>

1948 年初那灰濛濛的一天，她和加大利肋．拉布萊修女（Sr. Catherine Laboure）前往這座位於繁華灣仔區的廢棄皇家海軍醫院時，陰暗的走廊和病房，尤其是日本人在二次大戰期間佔領該建築時所建造的奇特水泥浴室，令她感到不知所措。然而，拉布萊修女似乎一丁點兒沮喪也沒有，並有滿腦子想法，總看到可能性。任何聽到她讚嘆這座老建築的人，都不會猜到海軍是為了更好的地點而放棄它。[4]

之後，其他批次的修女陸續到來，她們部分是從內地遷移至此，有些則是從愛爾蘭前來，後者包括先後擔任律敦治療養院院長的區貴雅（Sr. Mary Aquinas Monahan，1919-1985）[5]和紀寶儀（Sr. Gabriel O'Mahony，1921-2006）兩位醫生修女，以及另外幾位護士修女。

11.3 深井的「陸洲」診所

1949 年 1 月 18 日，就在這批修女抵埗的第二天，修會應律敦治先生（Mr 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1880-1960）的請求，接手在深井的醫局，這亦是她們在港主理的第一間診所。律敦治與聖高隆龐女修會，外界耳熟能詳的，可能是由修女們

[4] Edward Fischer, *Maybe a Second Spring: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ary of St. Columban in China* (New York: Cross Road, 1983), p.176.

[5] 區貴雅修女又稱亞規納、區桂蘭。其在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的墓碑，刻上的名字為區貴雅，故以此名為準。

主理、由律敦治捐助興建的律敦治療養院。不過，在療養院於 1949 年 2 月 24 日正式啟用前，律敦治亦向修女們提出，希望她們能為原由他投資創辦的啤酒廠 [6] 的員工和附近居民提供醫療服務。若知道這位印度拜火教徒與高隆龐女修會的私人交情，這樣的請求實不足為奇。雙方除了經常有非正式的接觸，律敦治家族每年聖誕節也會探訪修女管理的律敦治療養院及為男性肺病康復者而設的傅麗儀療養院。他們為病人準備的幾百份聖誕禮物更不是隨意購買，而是貼心地先行問過每位病人想要什麼。 [7]

深井醫局，又稱作律敦治醫局（Ruttonjee Dispensary），位於十三咪，1932年由律敦治向政府建議並出資興建，建成後交由醫務衛生署管理，於 1934 年 1 月正式啟用，屬於香港啤酒廠建築群的一部分。 [8] 故此在 1933 年啤酒廠開幕時，律敦治在致謝詞中，感謝「醫務衛生署署長為深井及周邊鄉村設立醫局，

[6] 香港啤酒廠於 1948 年由菲律賓生力集團收購。

[7] Edward Fischer, *Maybe a Second Spring*, p.194; and "Mission Comes Full Circle," *Misyon Online*, January-February 2016, <https://www.misyononline.com/jan-feb2016/mission-comes-full-circle>

[8] Appendix M. Medical and Sanitary,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3*, p.M106; Appendix M. Medical and Sanitary,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2*, p.M104l; "Hong Kong's Own Be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July 29, 1933;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10.

以及在抗瘧疾措施方面所給予的善意合作」。[9] 其時有兩名有護士資格的助產士及一位幫工常駐醫局。新界西區的華人醫官每周三次乘坐流動診療車前往醫局診症；1934 及 1935 年分別診治一千五百四十九人及一千六百三十一個新症病人。[10]

戰後，政府決定於 1949 年 1 月將醫局交還律敦治[11]，而他則請來聖高隆龐修女幫忙，由伯爾納德．康諾利修女（Sr. M. Bernadette Connolly，1907-2009）及加辣．法倫修女（Sr. M Clare Farren，?-2011）兩位護士修女負責。終年一百零二歲的康諾利修女曾在中國、菲律賓及美國服務。她一百歲壽辰時得到愛爾蘭總統的關注，她亦熱切地等待總統寄給她的二千歐元支票賀禮，「確保自己一領到支票便從速（把錢）匯到中國」。[12] 法倫修女起初在衡陽醫院服務，1939 年被修會派遣到菲律賓，於 1948 年 4 月到港。她原於緬甸服務，其後調派至香港，包括在律敦治療養院服務，五年後到美國為聖高隆龐男修會擔任醫護

---

[9] "New Brewery Opens: Hundreds Attend 'At Home' When First Brew is Sampl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Aug 17, 1933;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11.

[10] Appendix M. Medical and Sanitary,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5*, p.M105.

[11]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the 31st March, 1950,* (nk: Government Printers, 1950), p.44.

[12] "Sr Mary Bernadette Connolly," Columban Sisters website: <https://www.columbansisters.org/?s=bernadette+connolly>

工作，再轉往韓國擔任聖高隆龐醫院院長。[13] 據知修女們在深井診所的時間不是很長，可找到的歷史資料非常有限，但這個遠離繁囂市區的近海處所卻曾是修女們假日的一個「陸洲」[14]。

除此之外，在律敦治療養院服務的修女也常會在工餘時間，匆忙吃過一些點心，便開著由美國天主教徒捐贈的流動醫療車，到一些偏遠的施藥所為沒有感染肺病的人士打預防針。[15]

11.4 修女進駐打鼓嶺

聖高隆龐女修會管理的第二間診所，是在更為偏僻的打鼓嶺。其時已是 1966 年。[16]

打鼓嶺是與深圳僅一河之隔的邊境地區，部分屬於禁區。隨著香園圍口岸 2020 年 8 月開通，邊境禁區用地才大為縮減。但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局為控制邊境人口以達至緩衝邊境

[13] "Funeral Mass Homily for Sisters Clare Farren RIP," Columban Sisters website: <https://www.columbansisters.org/funeral-mass-homily-for-sister-clare-farren-rip/>

[14] O'Mahony, *A Time of Transition*, p.10.

[15] Edward Fischer, *Maybe a Second Spring*, p.189.

[16] 對於診所成立的年份，不同資料有不同說法，從 1965-1967 都有，1965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已刊登診所資料，但據 *A Time of Transition* 一書，修會是於 1966 正式委派三位修女到打鼓嶺，而粉嶺聖若瑟堂 1978 年的《銀禧特刊》，亦指是 1966 年。1965 年可能是本小節後面提到，在建築期間以流動醫療車方式每周服務一天，故在此以 1966 年為正式成立的依據。

事件、方便管理、監視滲透及非法活動等效果，沙頭角至蓮麻坑一帶一律禁止建屋，使該處發展停滯不前。[17] 在這個公共設施缺乏的邊陲地帶，當時每天上午只得一班公共汽車從坪輋開往粉嶺，故壯年男子大多到了俗稱「紅毛」的英國、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或到香港市區打工賺錢，村裡剩下老弱婦孺。

新界區的醫療設施，據《工商日報》1959 年 5 月對粉嶺醫院 [18] 啟用時的報道，新界除了「元朗有一所私立醫院外，其他地區並未有醫院設備，鄉民有病者，唯有來港就醫而已」。從報道用上「來港」二字，可知新界與四十公里外的市區是一個遙遠的概念。而且，這座新醫院只有五十張病床，門診名額只得二百，根本不足以應付粉嶺兩萬居民的需要。[19] 至於公營診所，則有位於上水古洞路的何東夫人醫局。

粉嶺時任堂區主任賴法禹神父（Fr Ambrogio Poletti, PIME，1905-1973）探訪打鼓嶺發現該處什麼設施也沒有，婦女們要揹著小孩在田裡工作，或讓他們在村裡四處走，沒有機會讀書。即使懷孕婦女仍需要落田。村民一旦生病，交通不便使得

[17] 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50。

[18] 粉嶺醫院原稱真愛醫院，由基督教信義會 1960 年開始營辦，1973 年由政府接辦，九十年代併入醫管局。醫管局於 2001 年把粉嶺醫院的住院病人全部轉移到北區醫院，並將之從《醫管局條例》的公立醫院名單中剔除。

[19] 鄧明輝：〈粉嶺聖若瑟堂——歲月留聲六十載〉，收於《聖若瑟堂——粉嶺 60 周年紀念特刊》（香港：粉嶺聖若瑟堂，2014），頁 71-79。

情況頗為狼狽及危急。[20] 賴神父有見及此，希望在打鼓嶺取得一幅土地開辦診所，特別是產婦一旦作動，往返上水既沒有車也路途遙遠，於是向教區提出為當地農民提供醫療服務。政府起初只想撥地設立小型急救站，但在賴神父極力爭取之下，最終成功開辦一間大一點連同留產設施的診所。[21]

11.4.1 賴法禹何許人也？

這位宗座外方傳教會士，在意大利獲神學博士學位後，於1930 來華，先在廣東省內當時仍屬於香港代牧區的範圍工作，1949年轉派到新界，牧養沙田、大埔、粉嶺區的教友。他初到粉嶺的時候，教友只有二三十人，沒有教堂，要借用教友的地方舉行禮儀。這使他意識到要興建教堂、學校、醫療等設施。這些福利設施，使他深受新界鄉民的愛戴。其時，教會劃分的「粉嶺區」，範圍包括上水、粉嶺、沙頭角和打鼓嶺四地，是最接近邊境的區域，賴神父一旦收到警方通知，不論早晚，他都會趕往羅湖橋頭，迎接從大陸被驅逐出境的傳教士，包括過關時衣衫襤褸被誤當乞丐的白英奇主教，故此賴神父有中港邊境上的「看門人」（China’s Doorman）之稱。此外，賴神父與鄉紳關係

[20] 鄧明輝：〈粉嶺聖若瑟堂——歲月留聲六十載〉，頁 71-79。

[21] “Sisters Build Clinic on China Bord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良好，與邊防軍警又有密切關係，獲准管有槍枝，使他在華人中有「新界之王」的綽號。[22]

11.4.2 診所的建造及起始

對於賴神父的要求，教區提議他到力理得神父那裡申請，由負責社會服務的力神父尋找資金。與此同時，賴神父到了灣仔接洽聖高隆龐會的修女，提出派遣起碼一個三人的小團體，這樣便開始了聖高隆龐會修女在打鼓嶺的服務。

此一項目由天主教福利會出資建造，包括有留產所的診所、幼稚園和員工宿舍。建築物樓高兩層，地面樓層是診所，另有床位可為十六名產婦提供住宿；一樓是修女和老師住宿的房間和廚房等設施，毗鄰是幼稚園。診所每天的開放時間與幼稚園相約，由於修女們要遵守教規，星期日早上需參與彌撒，只有星期日休息。

在建築期間，修女們便已爭取時間開展工作，每周六從律敦治療養院派出醫護人員，通常是一位醫生和一位護士，乘坐天主教福利會的流動醫療車到打鼓嶺為村民看診。[23] 診所建成後，由有醫護背景的修女負責，幾乎是二十四小時候命。另外有一個

[22]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的傳教歷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頁 62-63。

[23] O'Mahony, *A Time of Transition*, 37.

修女負責開車，遇到緊急情況就開車送病人到上水醫局，第三位則負責管理帳目。

本身對聖若瑟特別偏愛的賴神父認為這項社會服務要採用聖人的名字，因此把診所命名為「天主教福利會聖若瑟診所」（Caritas Saint Joseph's Clinic）[24]，於 1966 年正式開辦，位於坪輋非禁區的範圍，提供施藥所及普通科的服務，運作資金由明愛負責，並給予修女們微薄的薪水。

11.5 打鼓嶺的修女團體

曾經在打鼓嶺服務的修女，包括有原為律敦治療養院秘書的麥德明修女（Sr. Philippe McDermott, 1923-1985）。這位愛爾蘭籍修女於 1945 年入會，1956 年來港，1966 年調任打鼓嶺，直到 1970 年回國。她於八十年代初再度回港，其時已診斷患上癌症，仍如常服務，直至 1985 年在港逝世。[25]

---

[24] 診所的名稱在教會資料裡一直不統一，「天主教福利會聖若瑟診所」一名出自《香港天主教手冊 1965》，1967 年的《手冊》則稱為：「聖若瑟兒童福利暨婦女留產醫院」，1973 年的《手冊》稱為天主教福利會聖若瑟診所。雖然曾稱作醫院，但從修會的歷史資料、建築物的規模格局及受訪者口述歷史，均視之為診所。

[25]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麥德明修女，
<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P-McDermott.htm>

一位六十年代末在幼稚園工作的退休教師說：「打鼓嶺對外交通非常不便，遇着要生產的婦女有時候來不及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醫院。Mother Philippe 曾經送一位作動的婦女到醫院，但在途中已經生了下來。我後來回去探訪的時候見過那女孩，她也會提起：『我是在 Mother Philippe 的車上出生的。』」[26] 她們口中的菲利伯姆姆，即麥德明修女，村民都愛稱她作 Mother（姆姆）。

該退休教師指出，診所的修女當時「幾乎是二十四小時 on call（當值）」。「禁區內當時只有私家車和警車行走，Mother Philippe 有一輛私家車，如果遇到緊急情況，她會開車送病人到公立醫局。如果有一些情況非常緊急，做助產士的 Sister Tierney 亦會接生。但後期政府醫療政策改變，要有醫生在場才可以接生，1969 年便關閉產房。雖然產房關了，但仍放著數張產床。」

與麥修女同期的有易瑪利修女（Sr. Mary Attracta Egan，1902-1989）。這位護士修女 1966 年已到打鼓嶺，一直在這個團體至 1986 年退休回國。另外是上面提到有助產士資格的瑪加利大．蒂爾尼修女，隨著醫務條例改變，留產所不能沒有醫生，她便於 1968 年離開。接替其位置的是白碧哲修女（Sr. Brigid Kingston，1938-2022），但只留了兩年便回到律敦治。

[26] 這位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的受訪者為當時幼稚園的其中一位老師，訪問日期：2022 年 7 月 18 日。

其後是護士出身的瓦萊麗．海特頓修女（Sr. Valery Hetherton，1934-2019）於 1970-1974 年擔任會院院長，與她同期的則是負責會計的高隆龐．甘迺迪修女（Sr. Columban Kennedy，1899-1985）。到了 1974 年，白修女再度回來擔任會院院長，兩年後交棒具有護士及助產士資格的黎碧潔修女（Sr. Mary Fintan Ryan，1936-2013）。黎修女原本是要到緬甸一間診所服務，她到港等待簽證不果，於 1965 年正式奉派到律敦治療養院工作，1976 年調往打鼓嶺會院服務直至 1982 年。與她同期的是鄧敏修女（Sr. Damien Rooney，1921-2016）。

除了在診所，黎修女每月都進入禁區的村落，為行動不便者免費治療，特別是婦女在田間工作有不同程度的腳患，她都為他們包紮和護理。[27] 據她在返回愛爾蘭之前的訪問中憶述，打鼓嶺那裡「大多數人都是農民。我們被整齊的田野包圍著，要在狹窄的路上騎單車出行」。她又說：這些農民「大多是老人或年輕人，中年人在海外工作，把錢寄回給他們的家人」。[28]

黎修女曾憶述自己與村民所建立的緊密關係：「享用他們以勞力種來的鮮果，他們簡樸、勤奮、友善的態度教人難忘。當時他們的小朋友，在日間會來到我們的托兒所，不少村民亦會

[27] 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頁 293。

[28] “She lived a fortunate life,” *Sunday Examiner,* Sept 15, 2013.

到我們的診所求診，而我們也會上門幫助那些行動不便的長者，協助他們料理和包紮傷口」。[29]

現年八十歲的何維珍修女（Sr. Nora Mary O’Driscoll），是於 1960 年加入聖高隆龐會。她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護士，1972年從愛爾蘭來港後，便被派到打鼓嶺來。因為要修讀語言課程，她第一年只有在周末才回打鼓嶺，直至 1973 年才正式開始在診所工作。她於 1978 年離開時，已是診所比較後期的日子，賴法禹神父過了幾年便去世了。

在何修女的記憶中，打鼓嶺診所每天早上有很多鄉民從田野間步行前來，有著各種問題。「如果很嚴重，我們會轉介到上水，那裡有政府診所，有固定醫生當值。如果是我們可處理的，都會處理。不過上水的政府醫生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四也會到我們的診所來。」[30]

據天主教福利會的報告，政府醫生會每周兩次從上水到打鼓嶺診所看診，星期六就有律敦治的醫生負責，診所每月平均有六百人次的病人。[31] 其時，共有十八位聖高隆龐會修女在律敦治

[29] 粉嶺聖若瑟堂《慶祝建堂五十周年特刊》（香港：粉嶺聖若瑟堂，2004），頁 21-22。

[30] 何維珍修女（Sr. Nora Mary O’Driscoll）以英語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的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11 月 9 日。

[31]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72-73 年度年報書》（香港：香港天主教福利會，1973），頁 92。

醫院工作，兩位是醫生，其餘是註冊護士、助產士、X 光放射技師、營養師等；而在修會的團體中，她們有一位是美籍、一位是澳洲籍、兩位華人，其餘是愛爾蘭籍。

「我們在律敦治醫院的醫生星期六會前來，換言之，我們一周有三天有醫生。其他時間，若是傷風咳嗽，敷藥，打針等，就由我們來處理。到了後期，我們與上水（政府診所）合作。我們和上水有很多接觸。我們覺得有問題時，會把病人開車送去上水。」他們使用的車輛都是來自明愛或由其他醫院捐贈的。

至於收費，何修女說：「大概是兩元。如果他們沒有錢，也就讓他們走。沒問題的。」兩元診金在七十年代初到底是便宜還是貴？或許可與當時的學費比較。退休教師說：「『細蚊仔』讀書要付費。很早期五元，很便宜，明愛只是象徵式收費。那時未有社會福利署的資助，明愛的飯餐就給一大塊魚乾，又有一些菜。後來有了政府的資助，就要計營養，幾多安士的肉，幾多安士的菜。」

11.6 衛生教育和診所的小病人

雖說星期天是修女的休息日，但若村民有緊診，她們還是會安排人手。最主要是初期有產科，生孩子不能等，有這緊急需要；偶爾在晚上村民也會來按門鈴向修女求助。直至後期只有日診，公共交通又有所改善，才沒有這麼緊張。何維珍修女解釋，

那是因為「我們整個星期都住在那裡。我們住樓上，所有房間現在都是護老院……我們通常會盡量在傍晚五點左右關門，偶爾會有人之後才來，這可能是我們可以處理或我們無法處理的事。但我認為人們知道如果發生一些重大事故，他們是要去更遠的地方求助，我們也會叫他們趕快去醫院」。

診症之外，修女們有時候會為幼稚園家長聚會，策劃一些講座來教育家長公共衛生。退休教師說：「他們是赤腳落田。修女會提醒家長泥裡面有蟲，是有毒的或者是有細菌，提議他們穿上水靴，教他們防備，以及赤腳落田可能有的後果。」又或者指導家長教導小孩如廁衛生。「小孩子的婆婆、嫲嫲，叫做『姐婆』，不是太明白這道理，所以我們都希望是小孩的媽媽出席講座，在周末請家長來上課，教一些衛生知識。」

診所也有很多「小病人」。退休教師說：「我們會帶幼稚園的小朋友到空地玩耍，有時會遇到一些意外。花床是石造的，小朋友有可能會撞傷。操場是『石屎地』（水泥地），小朋友踩單車，不時會翻車，跌倒在地上流血，我們老師就要抱他們去診所。診所就是這樣照顧我們幼兒園的小朋友，很方便，不用去醫院，也不需要付錢。」

她又說：「村民踩單車很厲害的，那些女人載著三個小孩踩一輛單車，前後三個。如果懷有身孕，肚子裡還有一個，就是『四條命仔』。」退休老師說，那些媽媽都是這樣載她們的小孩

來幼稚園，到了便先把兩個孩子送進去，第三個孩子就坐在單車上等，然後由媽媽載他回家。「所以很多時小朋友的腳是被單車輪子弄傷，便去診所敷藥。」

11.7 名醫拔刀相助

雖然打鼓嶺位處偏僻的邊境地區，但卻有不少名醫拔刀相助，在假日前來義務看診，而村民也很接受西醫治療。首先是世界知名的區貴雅和紀寶儀兩位修女。區修女的名氣有多大？有一次郵局派送一封寄給她的信，信封的地址只寫上 Sister Aquinas, China 也能收妥無誤，可想而知。兩位修女會輪流在星期六前來看一些比較複雜的病症。區貴雅修女出生於愛爾蘭，1939年加入修會，之後修讀醫科，1947年畢業時，是都柏林大學首四名獲醫生資格的修女之一，是教廷於 1936 年取消不准修女成為醫生或助產士的禁令之後，標誌性別平等的重要一步。她以三十歲之齡成為律敦治療養院的院長，任職更長達三十六年。她為香港抵抗肺癆傳染貢獻巨大，在死後仍會有當年被她治癒的市民到其墓前拜祭。[32] 紀寶儀修女亦是香港治療肺癆的先鋒人物，與區修女一樣曾在香港大學醫學院任教，亦是照顧臨終者的「善寧會」創會主席。紀修女曾於 1955 年協助港大骨外科教授侯信醫生（Dr. Hodgson）推行「前路清創及融合術」來治療脊柱結核，這治療

[32] Mark O'Neill, "Healing Hong Kong," *Ariana* #03, Sept 1, 2019, pp.136-140.

獲西方稱譽為「香港手術」。[33] 其他友好的義務醫生，還包括曾任醫務衛生署署長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蔡永業醫生（1921-2001）。

當遇上複雜的病症，這些醫生會轉介病人到市區的醫院。據悉，大口環的骨科醫生偶然也會到打鼓嶺看症。小孩子若需要複診，就由父母帶他們去市區。退休教師說：「我記得有一個需要住院。小朋友的媽媽在托兒所做煮食的工作，她的女兒在家中發生意外，影響了骨骼，接着便去了大口環骨科醫院，複診的時候也需要回到大口環。」

11.8 在打鼓嶺的生活

1964年，警務處處長根據公安條例開始簽發通行證（俗稱禁區紙）給予任何進入或離開禁區的人士。港英政府修訂邊境禁區令之時，香港與內地在沙頭角和打鼓嶺禁區之間有一小部分的田野，中間有一條河。出入禁區要出示證件。那時候，修女亦申請了禁區紙，方便進去禁區探訪。

據受訪者憶述，早期只有修女們有車，村裡還沒有「村車」。鄉民只能走路或騎單車到診所和托兒所。後來有人經營一輛小客車為托兒所接送孩子。生活現代化後，才有巴士和小巴的出現，甚至有市區巴士開到打鼓嶺、粉嶺等不同地方。據《入境

[33] 〈公立醫院有幾趣〉，《協力》。2020年12月，頁2。

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一書，禁區交通主要依靠巴士，1967年暴動期間，因村民連同紅衛兵在禁區內發生滋擾事件，以致巴士停運數年未恢復，導致非正規的「村車」（又稱街車）出現，由較富裕的村民出資將密斗貨車改裝載客，車費幾毛錢。[34] 退休老師說：「這些村車像貨車一樣，車斗內兩邊搭了長木板，人們就坐在木板上，並不像現在巴士那些座位。這些村車比菲律賓的Jeepy長一些，每邊都可以坐十個，很多時都會滿座。」

「村車」的運行方便了打鼓嶺的村民到上水、粉嶺購物。不過，即使在今天，由打鼓嶺驅車到粉嶺市中心也要十五分鐘車程。當年的偏僻可想而知。雖然打鼓嶺遠離修女會港島律敦治的主要會院，但這新環境沒有讓早期的修女感覺陌生，因為聖高隆龐會的神父、喇沙會在上水的修士，以及附近一些英籍居民有時會前來探訪。

至於她們住宿的地方，除了主樓，門前的田地有個小花園。花園後面是一座小樓房和一個塘池，晚上有青蛙發出很大的聲音。何維珍修女和在那裡住宿的退休教師均表示：「牠們發出很多『音樂噪音』，就像管弦樂團。如果你習慣了，那是個好地方，否則會覺得太吵了。」

[34] 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頁194。

11.8.1 村民 vs 不速之客

外籍修女也會接觸本地人，和他們打成一片。除了每天看症，亦會主動探訪他們，遇到有人未前來取藥，就順便給他們帶去，送上問候。反過來，村民又會將自己種植的新鮮菜蔬給修女帶回去享用。退休老師指出：「若湊巧家長本人或者是媳婦、女兒生了小孩，她們就會盛一碗薑醋給客人吃。後期來服務的 Sr. Valery 很喜歡吃村民的薑醋蛋和豬腳，吃得很滋味。」

現時身處愛爾蘭的何維珍修女更在越洋視頻訪問中，重複了四次「非常好」來形容村民與她的關係。「他們都非常友善，非常熱情。彼此的關係完全沒有問題。病人都是附近的農民。他們過去常常出門去診所。」

由此可見，村民很接受修女們，看到修女很照顧他們，大家的關係很要好。這些外籍修女會學習他們的方言，即圍頭話、客家話。雖然未必完全懂得講，但只要慢慢地也能聽得懂村民說什麼。何修女表示：「基本的東西，我都能理解。我記不起有遇過大問題。如果是大問題，我會打電話給幼兒園的人，請他們過來翻譯一下。有時你可以看到是什麼問題。」

打鼓嶺離邊界非常近，只是一河之隔。診所的樓房後面有一座小山，在那裡服務過的易瑪利修女由於當時仍未能再進入大陸境內，會帶一些客人到那裡的山頂遙看到大陸。

何修女說：「從診所出來，沿著馬路走很短的一段路，就有通往大陸和香港之間的『無人區』入口。所以，那時候，我們會見到很多人剛從大陸非法出來。他們只要越過邊界，便離開到大陸。」因為靠近禁區，在打鼓嶺的修女，只要看到地上有破爛的衣履，便知道有偷渡者曾出現。不過，何修女表示：「他們突然出現，但沒有惡意的。他們會告訴你他們的故事，不是馬上，會到了某個時候才告訴你。這時候可看出他們是否信任你。」

11.8.2 非口頭的傳教

不同時期的修女都沒有很有目的地向村民或求醫者傳教道理道。黎碧潔修女說：「服務時我們不會傳教，只會陪伴病人，讓他們感覺到我們的臨在。」她在《公教報》的訪問中說，一位患肺癆的長者曾問她為何會離開自己家鄉來服務他們。當他知道是為了耶穌的緣故，便要求她多講關於耶穌的事跡，最後更領洗入教。「他讓我明白，語言在彼此的相處中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對病人的尊重及臨在。」[35]

何修女同樣表示「完全不會」向村民傳教。她說：「你知道我之前還有其他前人……我起不記他們（村民）有直接問過我關於教會的任何問題，但會問我『你來自哪個國家？』，其餘的，

[35] 〈傳教修女黎碧潔：「我帶著病人送我的祝福回家鄉」〉，《公教報》，2011 年 12 月 23 日。

他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可能他們已知道比我先來的修女的身份。」

「他們則談論他們的孩子和生活等等。我自己早年就是一個來自農業社會的愛爾蘭年輕人。我經常認為，某些事情是一樣的，會與我在愛爾蘭時的情況相似，只是語言不同。這經歷給我的思考是，我們談論家庭、孩子和所遇到的問題，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常想到，大家都會有同樣的故事，只是不同的語言。」

11.9 診所的逐步結束

隨著時代演變，打鼓嶺的醫療服務首先取消了留產所。據《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8-69 年度年報書》指出，產科服務是於1969年初取消，而普通診所仍然十分繁忙，但福利會希望將餘下來的地方，用於加強扶幼工作方面，認為該區未及托兒所年齡的兒童特別需要日間照料。[36] 何維珍修女解釋，取消留產所的有關決定「主要是沒有醫生，你需要醫生負責產科」。然而，賴法禹神父對這事卻大為傷感，不能接受此一決定。

關閉了地面樓層的產房後，原來的大房間仍有兩三張產床。聖高隆龐會的柯德華神父（Fr. Ned Kelly）周末會到打鼓嶺為修女開彌撒，若需要留宿，因為一樓是修女的宿舍，他便睡在原來

[36]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8-69 年度年報書》（香港：香港天主教福利會，1969），頁 2。

的產房。何修女說：「實際上它變成了睡房，很大的睡房。如果有神父留宿，他就會留在那裡。不過只是幾次。」原來的診所、留產所後來成為了老師的飯堂和老師做教材的地方；全部的修女離開後，如今連同一樓宿舍，已改變用途成為明愛馮黃鳳亭安老院。

不過，即使到了七十年代，正如天主教福利會的年報顯示，打鼓嶺醫療設施缺乏，並未改善。據 1976 年《第二十二屆新界鄉議局各委員會工作報告書》就指出：「當時該區目前並無醫療機構，過去曾設有婦科診所，而現已結束，鄉民有病須往上水馬會醫局求診。」[37] 鄉議局對醫療服務的調查亦顯示，粉嶺等區的醫院仍未設有急症室。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部前部長陳秀嫻指出，診所最多可以容納十六名產婦，但一般只有數個婦女在該處生育。她說：「村裡的婦女喜歡在那裡生產，之後就回家。那個時代非常流行助產士，我記得最初的聖高隆龐會修女都是助產士出身，所以她們可以協助生產。其中有一位是年紀老邁很喜歡說笑的易瑪利修女。我雖然是 1969 年開始在明愛工作，但我當年常常去探望她們。我們以診所的地方去會見『有問題』的家庭。那時候不可能一個星期六天都有員工前往新界，唯有當修女看到很貧困的家庭，很需要他人幫忙的，就會把所有個案安排在同一天，社工就會去看

[37] 新界鄉議局：《第二十二屆新界鄉議局各委員會工作報告書》（香港：新界鄉議局編印，1976）。

個案。」由於鄉民忙著耕種，社工有時候甚至要到農地裡見村民。「我記得派過一個社工去打鼓嶺，他說每次從打鼓嶺探訪回來都很疲倦，我問為什麼。他回答說他見的婦女一邊在田裡工作，一面和他講自己的情況。他覺得如果站在田畿和她們講話，好像顯得高高在上，所以會坐或蹲在田畿。我覺得這位同事很偉大。那個時代做這些工作很有趣和具挑戰性。」[38]

11.10 不捨和延續

即使何維珍修女已離開打鼓嶺，甚至離開香港，她認為打鼓嶺那種地方真的需要有醫生和診所，並相信這亦是診所早年被大家廣為接納的原因。

到了八十年代，原在律敦治療養院當護士的麥潔妮修女（Sr Maureen McGinley），1981-1984 年在打鼓嶺服務，及後開始大埔瞭望台照顧末期愛滋病患。大埔瞭望台於 1996 年租給愛滋寧養服務協會，翌年開始服務，後來因與公立醫院服務重疊，得不到資助而於 2000 年結束。[39]

最後一批在打鼓嶺的修女有魯尼修女，白修女及新加入的游德肋撒修女。在大陸出生的游修女加入修會後，長期在美國從事教育工作，1974 年來港後，在打鼓嶺為小朋友開英語補習班，

[38] 陳秀嫻博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2022 年 12 月 8 日。

[39] 陳天權：〈大埔瞭望台俯瞰吐露港〉，《香港商報》，2021 年 3 月 17 日。

又為本地工人和農民開辦英語學習小組。[40] 此時修女的服務也開始轉變，推出 Meal from wheels 家居送飯服務。

由於時移勢易，明愛經過評估後，認為區內的診所及醫院數目已增多，應改為更切合當地需要的安老院。1986 年，隨著三位修女遷離，打鼓嶺診所正式結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過去。

與此同時，修會於七十年代開始投入教育事業，至八十年代更為積極，但好幾位修女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專長，仍置身於醫療相關的服務，包括協助明愛醫院成為政府資助醫院，參與醫院牧靈和臨終寧養的工作、對吸毒者及愛滋病患的關顧。隨著本地修女老化，聖高隆龐女修會於 2016 年從香港撤出，回到愛爾蘭，真真正正的與香港市民道別。

不過，她們都沒有忘記與香港市民建立的情誼，正如黎修女在 2011 年離港前，回顧自己在香港的醫療服務表示：「這為我並不是一份工作，我很享受，每位曾遇上的人都是我生命中的祝福。」[41]，又或是何維珍修女重複四次的「非常好」。

**編按：原著中將受訪者何維珍修女誤寫為賀修女，本中心謹此致歉。而 Fr. Ned Kelly 則以其中文名柯德華取代原有音譯。*

[40]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游德肋撒修女安息〉，《公教報》，2006 年 9 月 3 日。

[41] 〈傳教修女黎碧潔：「我帶著病人送我的祝福回家鄉」〉。

附錄二

華人護士皈依者加入傳教女修會，很高興來到愛爾蘭

編按：高隆龐傳教女修會的華人修女並不多，其中有一本傳記小書《初蕾》是關於游德肋撒修女。至於不少醫生和醫科學生稱讚廚藝了得的陳玉如修女，她曾於 1953 年接受訪問，講及自己的身世及經歷，刊登於澳洲墨爾本總教區的 The Advocate 周刊上。[1] The Advocate 乃 1868 年於澳洲墨爾本創辦的一份周報，1919 年被天主教墨爾本總教區收購，繼續以周報形式出版，直至 1990 年。現撮譯為中文，讓讀者對她有更多的了解。

記者：伯多祿．基爾羅伊（都柏林，1953 年 3 月 3 日）

陳玉如，一位 31 歲的華人護士，14 歲時失去了父親，母親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去世。1942 年，陳玉如已經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護士，她從被日本佔領的香港逃難到中國大陸，1945 年日佔結束時回港，發現母親已經在幾個月前去世了。

[1] Peter Kilroy, "Chinese Converted-Nurse Joins Missionary Sisters, Delight to be in Ireland," *The Advocate*, March 19, 1953, p.17. Trove: Newspaper and Gazettes/ Melbourne, Vic, 1868-1954: <https://trove.nla.gov.au/newspaper/article/175358918>.

在繼續護士工作的同時，她為弟弟和妹妹建立了一個新家。然後，有一天，她去找一位神父說：「我想領洗為天主教徒。」那是在 1946 年，英文名字稱為「芬妮」（Fanny）的陳玉如，便成為了天主教徒。

她現於愛爾蘭，本周將在克萊爾郡卡希拉孔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的母院成為備修生。

約在一年前，陳玉如表達了加入修會的願望，並被高隆龐會修女所吸引，因為她們在香港為病人服務，負責管理前身是海軍醫院的律敦治療養院。她與香港的修女取得了聯繫——她們大約有 18 人，全都是愛爾蘭人；其中一位是曾致美修女（Sr. Dolorosa Ryan），是修會唯一的化學家。

曾致美修女在中國度過了十六年後，去年（1952 年）6 月回國參加總會的大會。經過一個月的海上旅程後，在倫敦與陳玉如見面，陪同她前往愛爾蘭。

來自異教家庭

陳玉如是家中第一位皈依天主教的成員。她父親出生於華南新山，母親出生於新加坡，兩人都是異教徒，在香港結婚。她的弟弟仍在學道理。她妹妹已結婚。陳玉如早年就經常參與彌撒和天主教禮儀。她就讀於香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辦的學校，並在那裡學習天主教教義。她本來更早成為天主教徒，只是擔心在世的

父母不同意。陳玉如曾在香港瑪麗醫院接受培訓，日佔期間，在內地設立的多家美國醫院工作過。正是在那段時間，她的母親去世了。

陳玉如說：「在佔領期間她常常很擔心，生活過得很糟糕。」佔領後，她回到香港完成助產士培訓。其中一位護士聽說她想成為天主教徒，便把她介紹給聖德肋撒堂的意大利籍神父顏思回（Fr. Andrew Granelli）。她接受顏神父的指導，並由他引領入教。她其後與一位天主教醫生和他的醫生妻子一起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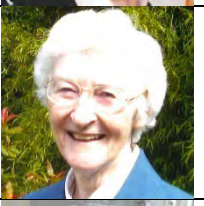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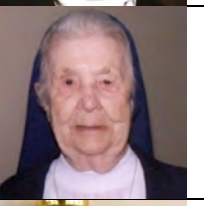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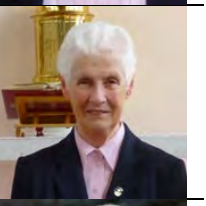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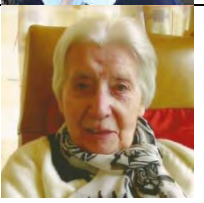
她說：「我很高興來到愛爾蘭。我不覺得天氣很冷。」陳修女希望發願後，能夠回到中國或遠東其他地方做護士修女。

陳玉如在聖高隆龐女修會都柏林的宿舍結識了另外兩位華人修女，她們於 1949 年來到愛爾蘭，正在該處讀書。其中游德肋撒修女是第一個加入高隆龐女修會的華人，而陳玉如則是第一個皈依後加入修會的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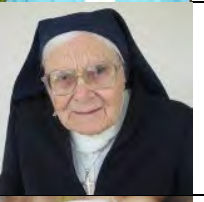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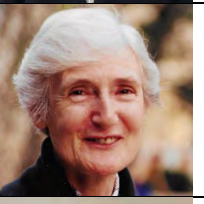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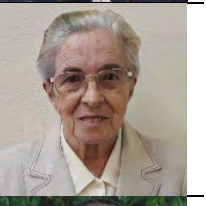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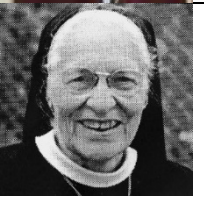
附錄三

在香港服務的修女名單（按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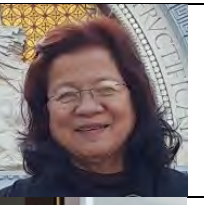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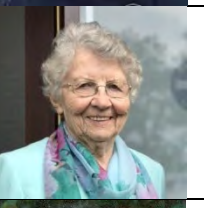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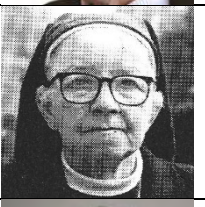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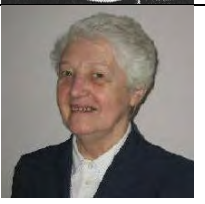
B-D

Sister M. Benedicta Berkery 伯爾納德・貝爾克里修女		Sister Mary Thomas Chan 陳玉如修女	
Sister Maureen Byrne 莫琳・拜恩修女		Sister Bernadette Connolly 伯爾納德・康諾利修女	
Sister Patricia Byrne 白秋霞修女		Sister Sheila Crowe 高詩蘭修女	
Sister M. Justin Cassidy 賈斯汀・卡西迪修女		Sister Frances Daly（芳濟・戴利修女）亦稱 Sister de Chantal Daly（迪尚塔爾・戴利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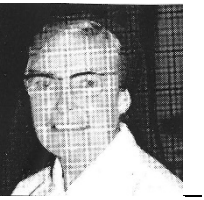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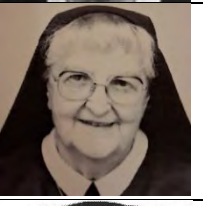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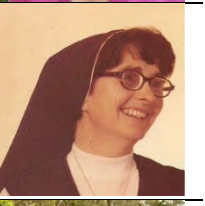
D-G

Sister Rita Deegan 狄麗瑾修女		Sister M. Clare Farren 加辣・法倫修女	
Sister M. Cecilia Delany 則濟利亞・德萊尼修女		Sister Ann Gray 紀愛恩修女	
Sister Moira Dowling 莫伊拉・道林修女		Sister Maureen Grant 莫琳・格蘭特修女	
Sister Mary Duane 杜瑪利修女		Sister Mary Greaney 李潔靈修女	
Sister Mary Attracta Egan 易瑪利修女		Sister Eva Gertrude Grimley 伊娃・格特魯德・格里姆利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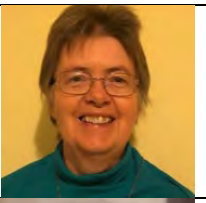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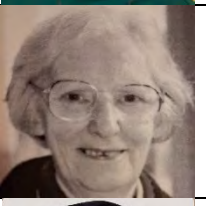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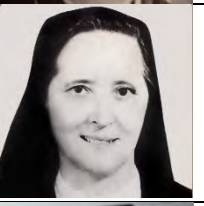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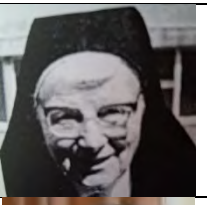
H-L

Sister Maureen Herbert（Sr. Mary Martin Herbert） 莫琳・赫伯特修女（亦稱瑪利・馬丁修女）		Sister Inez Lee 李淑倩修女	
Sister M. Valery Hetherton 瓦萊麗・海特頓修女		Sister Grace de Leon 杜修女	
Sister Martha Keenan 瑪莎・基南修女		Sister Catherine Lillis 加大利納・莉莉絲修女	
Sister M. Columban Kennedy 高隆龐・甘迺迪修女		Sister Lucina Lillis 羅志娜修女	
Sister Brigid Kingston 白碧哲修女		Sister Isobel Loughrey 樂易安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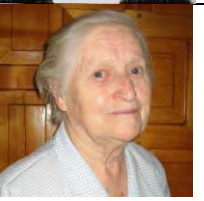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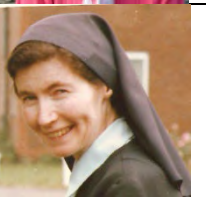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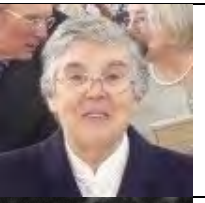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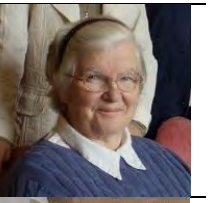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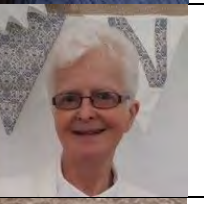
L-M

Sister Divina Lua 賴秀玉修女		Sister M. Philippe McDermott 麥德明修女	
Sister M Stephen Mannion 史蒂芬・曼尼恩姆姆		Sister Mary Eucharia McElligott 奧沙里亞・麥克利戈特	
Sister Frances Xavier Mapleback 麥修女		Sister Maureen McGinley 麥潔妮修女	
Sister Margaret Mary Meany 瑪加利大・瑪利・米尼修女		Sister Francis Borgia McMahon 芳濟・博吉亞・麥馬洪修女	
Sister M. Basil McBrearty 麥巴西修女		Sister Rosarii McTigue 羅莎莉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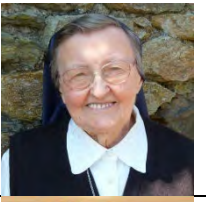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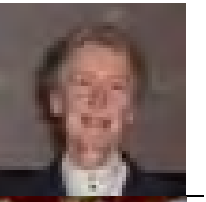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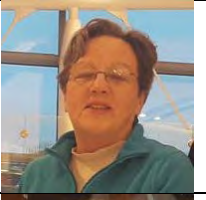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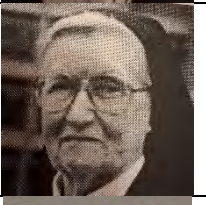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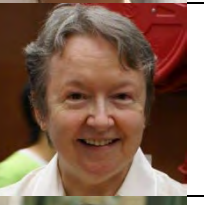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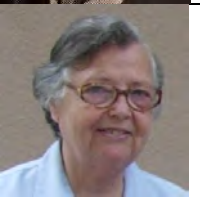
M-O

Sister Angela Meagher 安吉拉・馬爾修女		Sister Catherine Laboure Murphy 加大利納・拉布萊・墨菲修女	
Sister Kate Midgley 林靖純修女		Sister M. Mercedes Murphy 韓莫惠修女	
Sister Una Moane（亦稱 Winifred Moane） 毛修女		Sister Aidan Myrane（亦稱 Ada Myrane） 萬美蘭修女	
Sister M. Aquinas Monahan 區貴雅修女（亦稱亞規納、區桂雅）		Sister Margaret O'Brien 潘秀珠修女	
Sister Mary Moroney 瑪利・莫羅尼修女		Sister Joan O'Connor 王修女	
Sister Mary Mortell 馬修女		Sister Mary Anastasia O'Connor 瑪利・阿納斯塔西亞・奧康奈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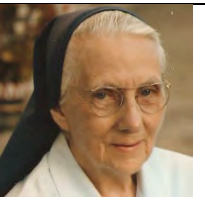
O-R

Sister M. Benignus O'Connor 貝尼努斯・奧康納修女		Sister Barbara O'Sullivan 蘇梨韻修女	
Sister Joan O'Donovan 貞德・奧多諾萬修女		Sister Mary Margaret O'Sullivan（亦稱 Sister Margaret Leonie O'Sullivan） 修理雲修女	
Sister Nora Mary O'Driscoll 何維珍修女		Sister Patricia Quigley 雷修女	
Sister M. Gabriel O'Mahony 紀寶儀修女		Sister Nuala Raleigh 胡雅麗修女	
Sister Abbie O'Sullivan 艾比・奧沙利文修女		Sister Roberta Remillard 嚴美納修女	

R-S

Sister M. Damien Rooney 鄧敏修女		Sister M. Victoire Ryan 維克多・瑞安修女	
Sister Anne Ryan 賴詠恩修女		Sister Tomasa Saberon 蘇碧玲修女	
Sister Mary Anthony Ryan 衛愛蓮修女 （曾稱韋修女）		Sister Ann Salmon 沙娜雯修女	
Sister Antonina Ryan ‘Nora’ 衛安妮修女		Sister Gloria Santos 郭麗嘉修女	
Sister Dolorosa Ryan 曾致美修女		Sister Ursula Scullane 謝德華修女	
Sister M. Fintan Ryan 黎碧潔修女 （曾稱賴修女）		Sister M. Gemma Shelley 瑪利・傑瑪・雪萊修女	

S-Y

Sister Sylvia Sherwood 施穎雅修女		Sister Margaret Thierney 瑪加利大・蒂爾尼修女	
Sister Lucia So 蘇艷美修女		Sister Redempta Twomey 雷德姆塔・圖梅修女	
Sister Criostin Sinnott 克里斯汀・辛諾特修女		Sister Celina Yoon 尹貞愛修女	
Sister Gerard Sloane 杰拉德・斯隆修女		Sister M. Teresita Yu 游德肋撒修女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主編

林榮鈞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學術顧問團

古偉瀛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夏其龍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譚永亮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勞伯壎教授（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Prof. Philip CHMIELEWSKI,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Prof. Leo D. LEFEBURE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Peter C. PHAN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Nicolas STANDAERT,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Prof. Gerard Kevin WHELAN, SJ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General Editors of the Series

Dr. LAM, Anselm Wing Kw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dvisory Committee

Prof. CHMIELEWSKI, Philip,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Dr. HA, Louis E. Kelo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KU, Weiy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 LEFEBURE, Leo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LO, William, S.J.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 Philosophy)

Prof. PHAN, Peter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STANDAERT, Nicolas,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Dr. TAVEIRNE, Patrick, CIC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WHELAN, Gerard Kevin, SJ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史料及工具系列【15】

《雪泥鴻爪：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在香港之歷史》

編輯：　張小蘭
翻譯：　廖綺華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　（852）3943 4277
傳真：　（852）3942 0995
網址：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　catholic@cuhk.edu.hk
承印：　嘉昱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天虹大廈七樓）
版次：　2025 年 1 月初版
ISBN：　978-988-79921-5-8

Tracing the Steps of 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in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ditor: Lucia Cheung
Translator: Eva Liu
Publishe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2 0995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Cheer Shine Enterprise Co. Ltd (7/F, No. 26-28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January 2025
ISBN: 978-988-79921-5-8

All Rights Reserved © 2025 by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